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Outcries of the Newly-relocated Village  
Heritage Movement and Village Politics

# 喧嚣的新村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龚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喧嚣的新村

本书以一个坐落于福建省武夷山境内的“新村”为蓝本，讲述其面临遗产保护运动时的境遇、反应，以及村落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在世界性“遗产运动”产生发展的场域中，新村亲历“申遗运动”、村落拆迁，武夷山地方文化遭遇世界遗产保护运动；村人亲历山林“确权”事件、“外嫁女”事件，刻画遗产政治与村落权力关系变迁。作者试图观照以下三个问题：其一，全球性遗产运动进入中国的路径与影响问题；其二，遗产运动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问题；其三，遗产运动对乡村社会尤其是村落政治的影响问题，譬如地方文化的“消解”、重构或发明，地方社会对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反应等，进而探讨遗产保护、管理与发展等时代主题。

ISBN 978-7-301-22422-4



9 787301 224229 >

定价：28.00元



**Outcries of the Newly-relocated Village**

Heritage Movement and Village Politics

# 喧嚣的新村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龚 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喧嚣的新村: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龚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2422-9

I. ①喧… II. ①龚… III. ①文化遗产-申报-影响-乡村-社会生活-研究 IV. ①G04 ②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7206 号

**书 名:** 喧嚣的新村: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

**著作责任者:** 龚 坚 著

**责任编辑:** 董郑芳 倪宇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2422-9/Q·013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mailto: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2.5 印张 185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田野归去来——人类学实证研究丛书

彭兆荣 主编



# 田野归去来

(丛书总序)

彭兆荣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商标”。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田野,便根除了人类学这一学科。人类学对这一商标的确认曾经历过一个历史性认知过程,不管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所开创的田野范式是否构成对“太师椅式”问学方式的“范式转型”,人类学界对于这些学理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很充分,此处不予赘述。

“田野”首先是一个异地地理空间和人文空间的完整实体,民族志者只有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由母体养育所形成的文化惯习场域,才谈得上对“异文化”的观察、认识和研究。“归去来”不啻为形象描述;它已非陶公《归去来兮辞》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独善其身式的隐居,而是人类学学科的公共规约。

“田野归去来”表现为一个身体践行的组合行为,其目的和目标具体而切实,它不是乡村旅游,也不是生态旅游,而是人类学者通过最为简单的“归去来”方式,一方面参与观察对象的文化全景,另一方面“朝圣”般地奉行学科旨意,“炼狱”般地进行身体考验和心灵拷问,最终通过“主位—客位”的双重考试。

田野作业同时也是民族志所通行的“质性研究”的简编版本。费孝通先生以“解剖麻雀”予以概括,生动而贴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长时间深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小社会、小族群,本质上与研究复杂社会、复杂人群有共通之处,仿佛细胞之于身体机能。



人类学“小社会”的实地研究决定了其“在日常中发现异常和非常，在平凡中体会不凡和非凡”的特点，这使得人类学者不仅能体验到“地方性知识”中的“地方感”，习得田野作业的技巧和技能，获得对“异文化”的认知，也体现了人类学整体研究的旨意。因此，“现场”成为一个关键词，它是“田野”的根据地。

“现场”表现为特殊的结构场域，包含历史、传统、文化、生态、民俗等“历时—共时”全景，是特殊人群、族群生活的场所；遂为民族志者最基本的“工作作坊”。甚至人类学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一“现场”性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建构工作。所以，“我者的现场”与“他者的现场”语义叠加，色泽交映。

于是，“实证”便成为一个有限性概念，它关乎用“客观”的手段和技术寻找所谓的“原真性”。而二者皆由人完成。天下之事皆为“事实”，观察到的、感受到的、体验到的主体是人，因此对“事实”作判断必然言人人殊。对于任何人文学科来说，“实证”的最大公约数是学者们对“真实性”判断所呈现的启示录。

藉此又将当今民族志范式的转型和实验民族志带回到民族志是“科学的”还是“艺术的”原生性层面，也带出了“实证”之重在于获取可资验证的“事实”，还是“事实之后”的阐释诸热话题；逻辑性的，人作为实证工作的主体和介体，即“身体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研究视域。“每个人都是典型”，是谓也。

回眸“本土”实景，人类学“舶来”中国已近百年，中国的人类学者一直在这一学科的历史“引渡”中苦苦求索“中国化”的生长机理。然而，这一外来“物种”在中国“百年孤独”的际遇，致使其直至今日仍给人以在“西装”和“长衫”的组合中未及“美美与共”之境，尽管其中不乏偶尔精彩的亮相。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研究需重“三线组合工程”，即人类学知识谱系与国际人类学同步伸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特色之机理和进行扎实的田野个案研究。人类学界有“大/小人类学(家)”之说，“大”者，侧重建构“文化语法”，“小”者专事民族志的精致案例。彼“大/小”非此“大/小”，没有高下类分。

窃以为，中国人类学在当下的研究要注重全球化视野中地方、族群与民族国家互动所生成的新的文化质丛(英文为 cultural complex，意思是文化元素的集结和组合)、新的文化样态以及跨文化对话与理

解。毕竟,传统“不变的社区”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也越来越难以存续。如何在多维视角中保持民族志范式和法典,各种实证、实验和实践已属必然态势。

本丛书即是“田野归去来”的果实,呈现出人类学研究在面对当代社会文化事象时所激发出新的阐释力、理解力和方法论。全面贯彻以上“三实”(实证、实验、实践)的原则,既遵循传统民族志范式的基本义理,又兼顾现代快速变迁的社会所生成的新景观,以中国的文化“语法”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工作。

本丛书分为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人类学与乡土仪式”、“人类学物质研究”以及“人类学、遗产与旅游”,从三个研究视域出发,管窥人类学特色,展示国内一批年轻学者立足人类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最努力,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发展趋势。

本丛书所有作品的作者都是本人近十年来带出来的博士(博士后),但我不敢“专美”,因为那都是他们辛勤劳作的结果。作品以实证为据探讨人类学学理、学问和学术。丛书部分体现了本人的学科理念、学术专长和教学风格,更是作者们个性化的呈现。其中有些弟子受到过人类学大师的指点。他们是正在成长的一代。

任何实验和实践都包含摸索的意义,无论成功与否,都将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可以在人类学学科之内,也可以在诸学科交叉领域,还会对那些未入行的蓄势待发者产生影响;这种启发包含着激发新一代对“小地方,大事务”乡土社会的关注,并产生对人类学图景的憧憬和“入行”的热情。

任何事业都是代际性的,因此,顺利的时代交接是保证一个学科事业永续发展的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对这一代“导师”教学效果的测试,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学科在特定、特殊历史时期发展的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教学之于特定时期教育体制的历史反映。我们没有理由和能力超越历史。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多元、多样、多彩,成形于“多元一体”的自在与自觉;成就于“自我的他性”的实在与实体。“田野归去来”丛书正是对这一集中国知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为一体的探索和思考、实验和实践的集体献演。让我们为之喝彩吧!



# 目 录

## 绪 论 / 1

- 第一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相关问题 / 2
- 第二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 8
- 第三节 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意义 / 12

## 第一章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 15

- 第一节 遗产与遗产运动回顾 / 15
  - 一、国际视野中的遗产概念 / 15
  - 二、中国的遗产概念及演变 / 21
- 第二节 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 / 25
  - 一、国内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 / 25
  - 二、国外遗产研究回顾与展望 / 35
- 第三节 遗产运动对村落政治的影响研究 / 48
  - 一、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 48
  - 二、“遗产运动”场域中的村落政治及变迁研究 / 52

## 第二章 新村田野图景 / 54

- 第一节 武夷山的人文地理 / 54
- 第二节 新村的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 59
  - 一、新村的界说 / 59
  - 二、新村的经济背景 / 62
  - 三、新村的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 66



### 小 结 武夷山遗产的传承主体 / 71

## 第三章 “世遗”情境中的遗产申报与村落拆迁 / 73

### 第一节 “申遗”现象与新村的拆迁 / 74

### 第二节 “暗流”涌动：“挖路”事件分析 / 86

#### 一、“挖路”：一纸“政府令”激起千层浪 / 87

#### 二、事件背后的“洪流” / 93

### 小 结 遗产主体的边缘化与权力的隐喻 / 95

## 第四章 遗产的归属与地方的声音 / 98

### 第一节 山林“确权”的由来 / 99

### 第二节 “三访”——“世遗”语境中的诉愿机制 / 103

#### 一、“三访”始末 / 104

#### 二、转机：“面呈领导” / 110

### 第三节 新村群体性上访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 115

#### 一、官方的“摆平术”及其效力 / 117

#### 二、“上访”场景中的地方精英 / 120

### 第四节 传统“斗茶赛”的接续与重构 / 125

### 小 结 遗产权属的变更与地方民众的回应 / 132

## 第五章 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重构 / 135

### 第一节 “世遗”补偿款引发的村落纠纷：“外嫁女”事件 / 136

#### 一、事件原委 / 136

#### 二、到市里“讨说法去” / 140

#### 三、出乎意料的结果 / 141

#### 四、影响 / 142

### 第二节 村民选举中的权力展演 / 142

#### 一、2006 年的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村委选举的“台前幕后” / 143

#### 二、2009 年的村民选举：地方精英的“隐性”力量 / 146

### 小 结 世界遗产的后续影响：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与疏离 / 151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 153

第一节 缩放式回顾新村的“世遗”经历及变迁 / 155

第二节 地方民众的回应与“文化自觉” / 158

第三节 遗产运动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 161

第四节 进一步讨论“家园遗产”的理想与人类遗产的实践 / 166

## 附 录 / 171

## 参考文献 / 183

## 后 记 / 191

## 图表目录

### 图

- 图 2.1 武夷山世界遗产申报区域(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 57
- 图 2.2 新村位置示意图(Google 卫星地图) / 60
- 图 3.1 “申遗”拆迁现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 81
- 图 3.2 通往景区的“茶路” / 91
- 图 4.1 福建省崇安县土地房屋所有证(1952 年) / 102

### 表

- 表 1.1 2000—2011 年期间以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概况 / 27
- 表 1.2 《国际遗产研究期刊》创刊以来研究主题及其变化 / 36
- 表 2.1 新村 1958—2008 年间户数与人口数量的初步统计 / 61
- 表 2.2 新村干部的分工与岗位职责 / 69
- 表 3.1 村民外迁意愿调查分析表 / 84
- 表 3.2 对景区封闭管理的看法 / 90
- 表 5.1 是否关注村务 / 151
- 表 6.1 新村的“世遗”经历 / 155

## 绪 论

本书是一部有关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主要讲述坐落于福建省武夷山境内的新村<sup>①</sup>在面临遗产保护运动时的境遇、反应,以及村落权力结构的变迁与重构。全书以世界性遗产运动的产生发展为场域,深入分析武夷山地方文化与世界遗产(“世遗”)保护、遗产政治与村落权力关系变迁等问题,探讨遗产保护运动中新村村民的行为方式与应对手段,以回应人类遗产保护的时代主题。

武夷山位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北段,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山大川之一。它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朱子理学发端于此,儒、释、道汇集于此,为武夷山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唐宋时,“武夷茶”声名鹊起,至元朝时被封为“贡茶”,与之相关的制茶、品茶、祭祀茶神的习俗源远流长。随着茶市贸易的兴起,武夷山文化也声名远扬。近代以降,因自然生态的完整性,武夷山曾先后被辟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的世界自然保护区。1999年,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与闽越王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四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可以说,武夷山文化已经历从地方文化到“国家遗产”再至“世界遗产”的过程。因此,武夷山及其地方文化无论在遗产研究上,还是在武夷山民众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代以降,数量众多的村民曾广泛分布在武夷山内,并先后历经“战争洗礼”、“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

---

<sup>①</sup> 依据研究惯例,“新村”是笔者田野调查点村落的化名,同样,书中出现的人名均是化名。



放”，等等，早已与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融为一体。而且，这些村民以山为家、以茶为生，构成了武夷山茶文化的重要载体，武夷山宗教文化的实践主体，以及武夷山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他们是武夷山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应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申遗”）的需要，武夷山景区内的村民们纷纷外迁，被统一安置于景区外的两个小区。在本书中，安置区被称为“新村”，因为，它在空间构成、生存方式、人际关系、权力结构等等方面已经发生新的，并与遗产紧密相连的变化。此外，“新村”还指代遗产保护运动中遭遇拆迁、重新安置的所有村落。因为遗产申报与管理、景区改造等都涉及遗产地内的民众，那么为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诸多问题，遗产地的民众外迁成为当下最普遍的做法。因此，“新村”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

武夷山“新村”因申报世界遗产由迁而建，在这一过程中其身份由“主”而“客”的改变以及有关遗产权属的变化引发了村民与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村民内部关系的疏离、村落政治的变迁，遗产保护与村民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日趋彰显，于是随之带来新村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较量、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民众文化保护意识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以福建省武夷山新村的遗产化遭遇为中心，通过对武夷山“申遗运动”的实证研究，力图呈现新村村民如何面对村落拆迁、遗产权属的变更，以及做出的各种回应，试图解答如下问题：其一，全球性“遗产运动”进入中国的路径与影响问题；其二，遗产运动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关系问题；其三，遗产运动对乡村社会尤其是村落政治的影响问题，譬如地方文化的“消解”、重构或发明，地方社会对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回应，进而探讨遗产保护、管理与发展等问题。

## 第一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相关问题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及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类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同时也把人们引入对工业化和现代性的反思中。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与环境变迁中，新旧事物更替迅速，“传统”的世界行将消逝，由此社会运动和环境运动层出不穷，“怀旧”情结也在此过程中

被催生出来,西方强权国家开始对自然和文化体系因遭到毁灭性破坏而不可恢复感到遗憾。此外,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语言种类的严重“缩水”,群众旅游的冲击,地方文化的悄然消逝等都使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不仅仅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更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组成的网络。而人类遗产恰恰是这一网络中的节点。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抢救濒临消逝的传统、保护多元的文化样态成为一种共识。

在上述人文思潮的影响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下的遗产保护迅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起来,同时也把“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等概念推向世界各国和地区。此外,由于遗产与现代旅游的不谋而合,遗产旅游迅速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马车”,还成为弘扬地方文化、实现全球性诉求的途径。因此,在“合力”的推动下,许多国家与地方社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遗产申报运动”。至2012年,我国共有41项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居世界前列,其中包括26处世界文化遗产、8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和3处世界文化景观。

毋庸置疑,我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投入颇多,如财政扶持、政策优惠、立法保护等等。地方政府更是不惜斥巨资对遗产地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建设,聘请专家进行规划与整修,并加强对遗产区域内及其周边民众的管理,从而试图打造出集人文景观与自然美景于一体的“世外桃源”。按照常理,世界遗产区域内及其周边民众应当以其家园感到自豪和骄傲,并在这里安居乐业。但情况果真如此吗?举例来讲,安徽的宏村古村落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村民们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宏村人不仅没有享受到作为主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且为争得这份权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宏村人看来,他们拥有古民居的房产权,那么他们理应是古民居的所有者。不过,宏村古村落的旅游经营权却几易其主,由县旅游局转包给镇政府,而镇政府又以招商引资的名义转让给北京中坤集团。显然,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保护遗产与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发生分离,由此造成村民与地方政府以及遗产管理方之间关系的破裂。之后,宏村人以收回旅游经营权和保护财产权为由把地方政府与遗产管理方告上了法庭。其结果是,黟县司法局、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黄山市高级人民法院都以证据不确切为由驳回了村民的申诉。由此宏村人深感“世遗”身

份所带来的生活不便,感到生存空间日渐变窄。<sup>①</sup>那么,宏村的例子是不是表明其他世界遗产地村落有共同遭遇?宏村人的遭遇说明了什么?这给社会带来了哪些思考?

近年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的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矛盾冲突,如“黄牌警告事件”、“观光电梯事件”等都曾引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通过武陵源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种种背离,有学者指出,“资源的处置权的非排他性以及外界制度性的监督缺位”是导致世界遗产地政府治理失灵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资源非排他性处置权”造成了遗产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社区居民的冲突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遗产武陵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造成威胁。换言之,“世界遗产”的名号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武陵源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以后,通过宣传促销、招商引资、加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等,其旅游得到进一步发展,地方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社会的“躁动”与分裂,譬如村民的贫富差距增大,社会冲突加剧,“2000年武陵源景区实行大拆迁后,社区居民的冲突更是频繁”<sup>②</sup>。此外,由于大部分遗产地既没有土地权,也没有山林权,只具有名义上的规划面积,因此这些规划区域“始终存在着占用农民集体土地与农民对土地占用补偿和必须利用土地诉求的对立和矛盾”<sup>③</sup>。而且,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与措施造成了地方社会尤其是遗产区域内的村民生产生活上的不便,并进一步引发民众与政府、遗产管理方的紧张关系。从而,遗产保护与地方民众生存发展的矛盾以及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也日益显现。<sup>④</sup>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武夷山着手准备申报世界遗产,当地政府和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投入巨额资金、建

① 张华乔:《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乡村的抗争》,《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3期。

②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152页。

③ 张晔、钱莹红:《自然文化遗产对当地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旅游学刊》2006年第2期。

④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7页。





立各级整治建设“指挥部”、拆迁村落、补偿村民等。1999年武夷山“申遗”成功后，他们在遗产保护方面也开展了诸多工作，如创建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局，下设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和文物宗教股，以及三个保护管理中队；聘请专家对遗产区域进行规划，进行分级保护；投资4.8亿元，进行世界遗产保护一期、二期工程，搬迁685户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产地和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整治；对景区实行智能化管理，以实现遗产区域的封闭管理等（详见附录1）。<sup>①</sup>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遗产管理方对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可谓“竭尽全力”。然而，武夷山遗产区域内及周边的村民并不太认可他们的工作。“因为这次申报‘世遗’搬迁，景区管委会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困难，加重了我们农户的负担，广大村民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针对世遗拆迁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做出尽快解决。”在新村村民看来，他们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和田地面积约占景区的80%，而且“武夷山至今有这样完好无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都是我们新村人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成果”。<sup>②</sup>所以他们认为，他们不能只有维护的义务，而无受益的权利。于是，新村人为了世遗拆迁补偿、山林“确权”、分享遗产旅游带来的收益等曾多次拦截票口、集体上访，给地方政府和景区管委会施加压力。他们之间的博弈与紧张关系引起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之后，基于遗产管理方与村民之间多年的协商、沟通，村民终于获得了相应的补偿，封闭管理也被延期。而事情并未由此完结，“世遗”遗留问题、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等仍继续影响着村落社会，并在村落政治中不断显现，如地方精英与村委会的紧张、村民关系的疏离、村落纠纷的发生、村民保护遗产意识的转变等。

不难发现，带着“夺目光环”的世界遗产地并非“世外桃源”，遗产保护甚至还出乎意料地造成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遗产地民众与政府以及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社会内部之间的紧张与疏离等。总而言之，世界遗产的到来已经把地方社会纳入全球性的遗产运动中，在此场景中，地方社会与遗产本身及遗产管理方的

①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说明》（内部资料），2005年11月15日，笔者田野资料。

② 《写给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内部资料），2005年，笔者田野资料。



关系面临全新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冲击。值得追问的是，当下世界遗产的保护实践为什么会引起地方社会的诸多反应？地方民众的回应说明了什么？在全球性遗产运动的特定场域中，国家、遗产与地方社会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又要通过何种方式来破解？

以上问题的凸显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纷纷采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对地方社会与村落文化进行研究（详见第一章）。不过，这方面的研究对全球性的遗产运动及其影响的关注仍然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遗产保护运动虽方兴未艾，但在中国社会，其影响与冲击较为有限。进入21世纪以来，遗产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日渐显现，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我国的遗产保护越来越与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地球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遗产的“地方性”，实际上，它却使地方文化、自然生态、乡土社会等面临种种变迁甚或重构。可以说，即便是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村落社会也难以避免地受到了遗产运动的影响和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取向的村落社会研究同样不能缺失遗产运动的视角。本书正是在此层面上去探讨遗产运动背景下的国家与村落社会互动的研究。

本书基于新村的个案研究，试图探讨遗产运动的内在逻辑与“权力”样态对民族国家、地方社会的影响。首先，从当今的遗产运动来看，世界遗产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表征，也不只是一张烫金的“名片”和一辆拉动地方经济的“马车”，更是一种反映民族自豪感、国家力量、国际影响力的政治隐喻，世界遗产越来越成为“国家遗产”<sup>①</sup>的代名词。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名义之下，“国家遗产”已经具有特定权力和政治共同体的内涵。遗产与权力的这种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其一，世界遗产及全球性的遗产体系体现了明显的西方价值与“文化霸权”，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世界遗产的概念、分类原则、申报遗产的标准以及遗产保护的模式等方面。其二，在世界遗

<sup>①</sup> 彭兆荣：《以民族 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产的体系中遗产地社会往往被异化为相对于西方自我的“他者”，而“他者”的所指也正如萨义德(E. Said)在《东方学》<sup>①</sup>中所界定的“东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依附于西方，需要西方去指导、去言说的“异域”。在此情境中，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价值与标准也是依附于西方世界，体现出欧洲的价值取向与“权力”话语，与此同时，遗产地社会更是常常面临“失语”的情状。其三，延伸至地方社会的内部，具有强烈政治表征与权力隐喻的遗产运动及世界遗产使地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发生巨大变迁，村落社会的整体拆迁、生活空间的受限、遗产权属的变更等还导致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家园感、“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的缺失，文化生态链的断裂，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等，从而引发遗产与地方文化持有者之间的现实联系与情感纽带的断裂，地方社会的稳定由此受到威胁，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强调的是，遗产权力不仅指来自联合国的规章、政策等话语权力，而且，由于国家是遴选、申报、评估遗产的主体，因此遗产权力也带有“横暴”的特征，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的。

其次，从全球性的遗产运动来看，它是一个“自上而下”与“由下往上”的双向流动的过程。一方面，现代技术与工业主义使遗产的全球化得以实现，并以此构建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形式确认遗产的普同化价值、全球均质化的保护模式，以期建构一个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全球性结构相一致的遗产体系。毋庸置疑，这一过程既暗含了“西方”世界的价值取向，也忽视或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态，因而也是遗产领域中最受诟病的话题之一。另一方面，遗产都要落脚于某一特定地方，从“地方”的视角来看，地方社会通过输出其文化的差异性来获取“资本”，以在全球性的遗产“场域”中定位自身，与此同时，地方社会的文化生态、社会结构等也会在此过程中受到影响和冲击。进一步而言，地方遗产的全球化过程可能导致遗产主体的“异化”、遗产地民众与地方政府及遗产管理方关系的紧张、民众生存与遗产保护的矛盾、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冲突以及遗产的归属问题、遗产的“消费”与产业化问题等。一言以蔽之，遗

①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产运动的双向流动既使地方超越特定地理空间而具有了“非地方性”、“全球/地方感”<sup>①</sup>，同时也使国家力量、意识形态等得以进入地方社会，并对地方社会产生影响。

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开篇以遗产地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为引子，对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的意义等进行阐述（绪论），在此基础上，简略回顾人类学取向的国内外遗产研究与村落政治研究，指出当前的遗产研究不乏文本解读、理论阐释，但对遗产运动与地方社会的关注较少；另指出人类学的村落政治研究同样不能缺失遗产运动的视角（第一章）。接着，本书从新村的人文地理、经济背景与社会结构等层面，阐释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新村以及新村的村民已经成为武夷山遗产不可或缺的传承主体（第二章）。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武夷山的“申遗运动”，使新村村民面临家园搬迁、村落空间的改变、生产生活的“设限”、“世遗”拆迁等等问题，终于在“一纸‘有关景区施行封闭式管理的’政府令”的激发下，引起村民“挖路”、“拦票”等群体性事件（第三章），其后更是引发村民前后数年的“上访”（第四章）。遗产运动的“后遗症”持续“发酵”，新村内部的村民纠纷、补偿款分配、村民选举等纠纷性事件频出，反映“世遗申报”遗留问题、遗产管理的理念、模式仍在继续影响村落治理的权力格局、村民的认知观念以及遗产地的社会稳定（第五章）。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后回应了人类遗产保护的时代主题，指出遗产保护应立足于遗产主体的文化自觉，并在地方社会、遗产机构与国家等“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 第二节 世界遗产地村落的民族志调查

在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世界遗产保护局的帮助下，我得以顺利进入武夷山和新村。2007年11月，我参与了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调查与监测实践活动，对景区的管理机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以及古村落、文化遗址的保护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解。此后，我以研究学者的身份多次进入田野点——武夷山及新村，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世界遗产保护局

<sup>①</sup>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工作人员与新村村民都给予我莫大的支持。

2008年4月我又参加了“海峡西岸文化生态与遗产保护研究”课题组在武夷山的文化遗产调查活动。在武夷山景区管委会的帮助下,我收集到很多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涉及武夷山的申遗历程、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情况,以及景区管委会与景区周边村民之间的互动情况等,不仅有文字资料,还包括照片、影像材料。此外,我还对景区管委会的几位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访谈,对他(她)们的遗产理念与保护观念做进一步的了解。通过这次的短期田野,我的研究主题逐渐明朗,从宏观的世界遗产政治学的批判视角,逐渐落脚于武夷山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遗产旅游的开发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以及遗产与国家、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关村落社会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主要内容,而遗产也是与某一特定的群体及其地方紧密相关的,那么从遗产地村落社会的变迁来审视遗产运动在我国的实践将是一个不错的尝试。2008年9月,我选定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新村为田野调查点,随即正式进入新村,租住在村民家。我的房东姓黄,与其女儿、女婿一家住一栋四层高的楼房。在进入新村之前,我早就听说,新村是武夷山出了名的“富裕村”,村内家家都有小洋楼,家家都有茶山、茶厂,而村民们的富足生活又与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1998年底,新村因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进行整体搬迁,大部分村民住进了政府统一安置的小区。从地理位置与交通来看,新村的新址位于主入口附近,生活更加便利,小孩上学也更方便。总之,在包括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武夷山周边村镇的民众等“他者”看来,新村村民的幸福生活是世界遗产所赐。那么,立足于新村村民的视角来看,世界遗产是怎样的?世界遗产给他们带来了哪些改变?他们与遗产又有着何种关联和互动?

从进入新村的第一天开始,我一直惊讶于村民的直率与坦诚,他们向我讲述了有关村民与遗产管理方、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村落内部以及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等。当晚,他们还主动邀我一起去看望一位刚从省城医院回村的张姓村民。就这样,在其后半年的田野调查中,围绕着新村的外嫁女与村民代表之间的打架冲突事件到确权、上访、挖路、封闭式管理、申报世界遗产与拆迁等等,我收集到大量



的口述、文献、档案与影像材料。此外，我将每日的田野过程、调查内容、调查方式以及心得体会等逐一记录在田野日记中，以期查落补缺和加深理解。

2009年2月开始，在继续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我还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田野作业。设计问卷的目的在于从面上去了解新村村民的基本状况和“世遗”带来的改变。基于此，调查问卷（详见附录2）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部分：村民的基本情况与生活现状，前者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人口来源、历史背景等方面；后者涵盖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以来村民的经济状况、生活变化以及村民对世界遗产的态度等方面。问卷调查主要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于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让其自己填写，遇到不理解的地方为其做出解释；对于不具备填写能力的村民，由笔者逐题询问并根据其回答代为填写。样本的抽取原则基于新村人口比例、男女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学历背景等方面，以家户为单位，一共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70份。通过对问卷进行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统计分析，所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的定性分析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和补充。

电话访谈也是我在本研究中常用的方法。由于与调查对象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而在我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的几位主要报道人以及其他新村村民会经常与我电话联系。内容主要包括他们的生产生活近况，譬如景区招工、村民选举的前期活动，以及他们想争取遗产权益的进一步的想法。此外，我也借助电话追踪访谈了一些当时不明或不够清楚的事件原委。

本研究是个案研究，采取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从研究方法来看，一方面我力图从“主位”(emic)<sup>①</sup>的调查立场出发，立足于对情境与群体的主位理解<sup>②</sup>，侧重于地方性的“细叙叙

---

① 一般认为，人类学者应采取“主位”的田野调查方法，即调查者应以被调查者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分类和解释为调查立场，而不能以调查者所惯用的立场和方法，即“客位”的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被调查者。参见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第二版），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② 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费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事”<sup>①</sup>，在对新村村落拆迁、村民上访、要求“确权”、村民选举等事件进行细致描述的基础上，力图呈现新村社会的政治变迁与全球性的遗产体系、遗产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遗产政策等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本研究结合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知识和相关理论，秉承遗产政治学的批判视角对遗产运动所挟裹的政治表征与权力话语及其影响下的地方社会展开论述。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包括文献资料、口述资料、调查问卷与影像资料等几大类别。文献资料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官方的地方志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一部分来自武夷山市档案局的村落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人口资料、通知公告，武夷镇档案室的历史资料、批复文件、通知材料，新村村委会的档案室资料，包括统计数据、会议记录等，以及武夷山景区管委会档案室的各种公证书、汇报材料、调查问卷、工作日志等；还有一部分来自民间的契约文书、私人记录、申诉材料、合同文本等。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研读，我大致了解到武夷山文化与新村的历史关联、武夷山“申遗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遗产权属变更、遗产旅游发展带给地方社会的“持续性”影响。

口述资料包括个人访谈和集体访谈两类，前者主要是我对村民、景区管委会成员的单个人的访谈，多在受访者家中、办公室等地进行；后者指不限地点的多人会谈。无文字的口述资料是对文献资料的有效补充，更具有灵活性和鲜活感。访谈多半是开放式聊天，部分是半结构式访谈。这一部分资料使我基本掌握到新村与遗产管理方、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并总结出新村前后多次群体性事件的原委与影响。

调查问卷与影像资料是本研究的另一类资料来源。在问卷的抽样过程中我注意到年龄、性别、职业等因素，以家户为单位，完成近百份的问卷，约占新村总人口的10%，并运用专业数据处理软件SPSS对录入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另外，影像资料主要包括遗产申报、村落拆迁与村民上访等的照片。

<sup>①</sup> 尤林：《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



### 第三节 主要关注点与研究意义

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全书的主要内容、研究主旨、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第一、二章)为研究回顾与田野点介绍，其中第一章介绍了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与村落政治研究的现状和进展。通过文献综述，本章着重阐述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对于遗产运动背景中的村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关注，同时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村落政治的变迁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遗产运动的影响，而遗产运动及其挟裹的权力、政治等因素是导致村落政治变迁的主要动因。第二章为新村历史与现状的介绍，重点阐述了武夷山的历史文化、新村与武夷山的内在关联、新村的的社会结构、经济背景与政治组织情况，由此阐明新村村民与武夷山遗产之间的情感的和现实的关联，为“世遗”拆迁后新村的变迁作铺垫。

第三部分(第三、四、五章)为本书的主体，着重讲述“申遗运动”的开展、村落拆迁的前后过程，以及遗产权属变更的始末和影响。其中第三章阐述“世遗”情境中的遗产申报与村落拆迁。讲述的是面对世界遗产及其挟裹的权力影响，新村村民搬离故土的过程及缘由，以及搬迁以后因景区封闭式管理等原因而引发的“挖路”、“拦票”等事件。这一章以事件发生发展的进程和遗产管理方的政策、措施分别作为分析的时间和空间主轴，采用时序性的叙事逻辑和事件—过程分析的策略，对“挖路”、“拦票”等事件进行阐释。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新村的“世遗”拆迁显然不同于其他意义上的村落拆迁或城市拆迁，两者有一定的共同点，如均涉及征地、补偿等问题，但新村的“世遗”拆迁更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或“根”意识等密切相关。此外，武夷山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离不开遗产地民众的支持，而地方民众面对日益“苛刻”的遗产管理方，开始从道义或理性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回应，发出“地方的声音”(local voice)<sup>①</sup>。

<sup>①</sup> E. Chambers, "Thailand's Tourism Paradox: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as Factors in Tourism", in Mary Huffor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98.





第四章首先讲述的是山林确权的由来与村民群体性上访的始末,通过对上访事件的详细描述,展现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村两委干部以及地方民众等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并说明遗产权属的变更是引发遗产地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动因,从这方面来看,对遗产归属权的诉求与捍卫是新村村民发出来的一种声音;其次,本章对新村的“斗茶赛”进行描述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新村村民试图运用武夷山的历史文化传统、世界遗产的“符号”与权力等进行“传统”的接续或发明,并在此过程中对他们的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以及与武夷山的历史联系等进行重构。这种“传统”的接续与发明表明了新村村民“表述”世界遗产的另一种声音。

第五章聚焦于村落内部,对新村内部的人际关系、补偿款分配、村民选举等事件进行详细描述,以期说明世界遗产的遗留问题及遗产管理的理念、模式等仍在继续影响村落治理的权力格局、村民的认知观念、价值理念以及遗产地社会的稳定等。

第四部分(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结和讨论,是基于田野民族志之后的分析和提炼。第六章在简略回顾新村的“世遗”经历及变迁的基础上指出,现代遗产及遗产运动是多方力量“合谋”的结果,是影响地方社会与国家互动的重要因素;同时,遗产保护应立足于遗产主体的“文化自觉”<sup>①</sup>,并在地方社会、遗产机构与国家等“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当代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从遥远的“异邦”<sup>②</sup>转向现实世界,并开始了一种“新的田野实践”<sup>③</sup>,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也逐渐由关注“异文化”、“亚文化”的民族社会转为重视本土社会,从这方面来看,武夷山世界遗产及其影响下的地方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都将成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志调查的新内容,而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也将为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深入的田野调查与学理思考。就此而论,本书旨在通过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对世界遗产与地方社会的关联提供理论依

① “文化自觉”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提出的。

②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③ 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据,并在此层面对遗产学的相关理论进行验证或说明。

从现实层面来讲,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逐渐兴起。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众多国家参与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公约》)得以通过,1985年我国成为其缔约国之一。自此,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逐年增多,有关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议题也随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武夷山是我国的“名山大川”之一,经过数年的备战,于1999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继泰山、黄山、峨眉山之后的又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近年来,武夷山遗产保护与地方民众生存发展的矛盾逐渐凸显,其涉及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本书将为此类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而且,本书对地方社会与遗产保护的关注还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时代主题。

# 第一章 遗产运动与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 第一节 遗产与遗产运动回顾

### 一、国际视野中的遗产概念

一般认为,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与人类的关系密切而久远。但作为特定“话语”(discourse)的遗产则出现得相当晚近。而且,在不同时空背景下“遗产”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明显区别。就词源来看,“遗产”(heritage)一词出自拉丁语,其英文语义最初是指“父亲留下的财产”<sup>①</sup>,或指“个人对于已故祖先的继承”<sup>②</sup>。这里,遗产侧重于指一种继承关系。法语中的“遗产”(patrimoine),意为“从父母那里遗留下的财物”<sup>③</sup>,而其中“patri”特指“父系”、“家长”的意思,强调遗产继承中的世系原则<sup>④</sup>。中文的“遗产”一词最初指祖辈留下的物质财产,如《后汉书》卷二十七载有:“(郭)丹出典州郡,人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遗产”含义可理解为“亡者留下的财产”,强调其客观存在。

---

① 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J. E. Tunbridge,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 1.

③ D. Lowenthal, *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 4.

④ 彭兆荣:《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需强调的是,不同语境中的“遗产”含义虽各有侧重,但最初都限于家、家族或继嗣群之内的继承与遗留,是一个“私有性”(private)的概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和象征符号日益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话语相联系。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众多历史建筑、艺术品等面临被破坏、摧毁,与此同时,革命新政权亟须通过“国家遗产”来重新整合民族认同和建构新的国家认同。所以,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法国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建筑委员会”,并在1830年创设历史建筑总督察一职,对历史建筑进行登记、纪录、保护和修缮。1913年法国政府颁布《保护历史古迹法》,对历史古迹、建筑进行立法保护。自此,“国家遗产”的理念及保护模式逐渐成形。毫无疑问,“国家遗产”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历史。它有时是民主的符号,有时是让国民想象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具体形象,有时则是整合民族的工具。这些都是法国历史发展时期朝代更替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sup>①</sup>

至20世纪中叶,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都先后经历了工业化、现代化改革,许多的传统文化、民俗都在此过程中消失或演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保持着、活跃着极为丰富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以当时西方流行的文化进化论观点来解释,那些欧美国家之外的地区是没有历史和文化的,是落后、愚昧的,是需要进化的蛮荒之地。因此,当时欧美各国所保护的對象以历史建筑、艺术品、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那些口头表达艺术、民俗文化等暂未引起普遍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以后,标榜“科学”与“理性”的现代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连绵不断的战争对自然生态、人类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工业化和现代文明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改造对传统建筑及其赖以生存的空间造成了冲击,使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决心更加坚定。之后,一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由34国考古学家共同参与的抢救埃及努比亚遗址的文化保护运动,更是为人类遗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保护模式。

<sup>①</sup> 李存霞,《遗产:源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8页。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牵头通过了《公约》,并设立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和世界遗产基金会(World Heritage Fund)对各缔约国的遗产保护进行监督指导。该公约对“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了权威性的解释如下:

**第1条 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

文物(monument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壁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groups of buildings):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sites):从历史、审美、民族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第2条 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自然遗产”:**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

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

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sup>①</sup>

从前述遗产的发生发展来看,遗产的概念经历了由“私有性”向“公共性”(public)的转变。与遗产的原初含义相比,《公约》中的遗产指的是“世界遗产”,从横向看,涵盖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大类别;就纵向看,可依次区分为世界的、国家的乃至社区的遗产。总体来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遗产概念、分类与立法等方面对人类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缔约国在同一个框架原则和各种公约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工作非常有效。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公约》中的遗产概念只

<sup>①</sup>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 <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定义了范围而没有界定属性<sup>①</sup>，从而颠倒了种属关系，因此其含义存在不周延性，是不恰切和不全面的。另外，《公约》中提及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integrity)原则分别单向对应于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而这一关系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风景名胜区的实际工作中显现出局限性<sup>②</sup>。而且，在遗产概念的引入和使用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制定相关遗产保护法规和法令方面走在欠发达国家前面，在遗产分类和保护中起到了借鉴、先导甚至主导作用。然而，其中的弊病和缺失还有待不同国家的实践来回答。由此，需特别强调的是，世界遗产概念的产生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西方国家“角力”的结果，那么，以世界遗产为核心概念所建构的全球性的遗产体系显然难以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的色彩，其相关的遗产分类、申报标准、保护模式乃至立法等也就难以具有普适性。

不难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架构的世界遗产概念体系中，无形文化显然未被引起重视。回溯历史，“无形文化财”一词最早出现于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其旨在保护那些正在流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不过，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十分有限，因而“无形文化财”的理念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过多关注。之后，伴随着国际“原住民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在1973年玻利维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提议之后，引发了国际社会一场大讨论：是否有必要将民俗或者说传统的大众文化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遗产体系中来？<sup>③</sup>

这场大讨论持续了十余年，经历了数百场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直至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在第25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俗的建议案》，对“民俗”(folklore)(或传统的和大众的文化)的概念、范畴及保护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界定。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把民俗文化纳入保护范畴，并提出以博物馆式的方法来

① 蔡靖泉：《“文化遗产”析义》，《中华文化遗产》2007年第2期。

② 张成渝：《〈世界遗产公约〉中两个重要概念的解析与引申》，《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李春霞：《遗产：源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保护民俗。这种保护方式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对民俗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将固化的民俗器物、民俗记录等有形遗产置于博物馆内保存的做法是有缺憾的。但是,该建议案已经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架构的遗产体系,所以说其意义仍是极为深远的。

当国际社会仍在对民俗文化的内涵及保护方式进行继续讨论之时,日本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后已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从理念、行政到法律的较完整的文化财产保护体系(“人间国宝”保护体系);另外,随着日本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其开始积极推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无形文化财”理念才逐渐为国际社会所重视和接受。

深受日本“文化财”理念影响的韩国也在1993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间珍宝体系”(System of Living Human Treasures),倡导各成员国官方认可表达无形文化遗产过程中杰出艺术和技能的持有者。基于上述各方力量的推动,199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人类口头与无形遗产代表作条例》。至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进一步通过《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自此,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体系得以构建起来,并进而拓展了1972年公约所构建的人类遗产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的中文文本中,“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被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是“无形文化遗产”。不过当前学者普遍认为,这两个词语的概念基本相同,可互相替换使用。<sup>①</sup>

纵观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发展,它们不仅仅涉及文化遗产的分类,而且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生发展联系紧密。如果将它们置于世界关系的场景中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文化遗产的内涵由物质类的扩展为非物质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更是经历“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人类口头和无形遗产—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变,这至少说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在早期的遗产体系中,“西方”一直

①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处于主导地位,它们以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为取向来界定遗产、识别遗产和阐释遗产。其二,伴随世界一体化、“文化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一个全盘西化然后又开始寻求本民族传统的过程。<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遗产尤其是那些无形的民族民间文化,逐渐成为民族认同、国家建构中的符号象征,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其三,文化遗产内涵的不断丰富、人类遗产体系的不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变。总体而言,从历史的维度来审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演变及内涵变迁,有助于我们对“遗产”概念的全面把握,进而对当今遗产保护模式、遗产运动等进行反思。

总体来看,世界性的遗产保护运动方兴未艾,保护对象逐渐多元,逐渐从单一要素遗产向同时注重多重集成遗产,从对有形的、可触摸的、物质形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发展到对无形的、不可触摸的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历史环境(historic environment)等的保护。与此同时,遗产保护的内容逐渐拓展与深化,如对“工业遗产”(industrial heritage)、“农业遗产”(agricultural heritage)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所有领域的保护,使传统的注重保护“静态遗产”(static heritage)向同时注重“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保护的方向发展。<sup>②</sup>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保护运动至少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从遗产概念的演变来看,“遗产”已经由最初的私有性概念演变为公共性概念,由个人的、家族的或继嗣群的遗产扩展为民族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遗产,而且现行遗产在置于全球性遗产体系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政治象征与符号。换言之,遗产的传统性、地方性已经被置于全球性的世界遗产体系与国家遗产体系的双重视野之中,那么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将有赖于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其二,在现代语境中,遗产保护不仅重视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也关注自然遗产、生态环境,并把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考虑,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其三,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在提升人们

①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

② 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的保护意识的同时,也附丽了许多“他者”的因素或价值,比如强势话语的影响、权力政治的滥觞、商业行为的泛滥等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遗产”的产业化与商品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等,而且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凸显又对遗产地的文化生态、自然环境与遗产之间的内在纽带造成冲击,使遗产赖以生存的“地方”及其文化空间等发生“异化”。

## 二、中国的遗产概念及演变

在中国,遗产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从“古玩”到“文物”至(文化)遗产的三个阶段。我国有关历史遗物的保护最初始于收藏行为。那些被收藏的历史遗物、礼器(青铜器)往往被视为“宝物”、“古玩”,成为收藏者身份、权力的象征。至宋代,开始出现对古玩进行分类、考证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被称为“金石研究”。随着金石研究的发展,“传拓”文字与绘制图形等方法的应用,原来的奇珍异宝、古玩逐渐演变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清代的“金石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一门以传世的或少量出土商周以来有铭文的铜器(金)和秦汉以来的石刻文字(石)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文字考证,希望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学问<sup>①</sup>。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思想传入我国,从而促进了“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的转变,也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发掘与断代方法使“文物”的概念及研究受到人们的重视。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如1921年中外学者对河南省浞县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1927年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1928—1937年间河南省安阳殷墟的发掘。随着文物考古及研究的发展,博物馆基于对文物的展示、陈列和保存的功能而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部分。20世纪30年代,以梁思成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着手对我国历史建筑进行考察、记录、研究与保护。

20世纪上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兴起,激发

<sup>①</sup>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尤其是历史建筑、文物等的保护意识。解放初期，随着社会建设的开始，文物普查也随之展开。1956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第一次文物普查，颁布了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保护工作基本停滞，诸多文物、古迹遭到毁坏。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发布，标志着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开始进入法制化的轨道。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成为法律规定的文物价值。但此时，我国对文物保护的范畴、原则、管理程序等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相关的研究不够深入、系统。

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的概念及保护理念随之传入我国，并带来几方面的影响：其一，“遗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国传统的“文物”概念，并使文物本身及其历史信息受到整体关注。其二，世界遗产的保护理念、保护原则、保护体系对我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意味着承认和接受以世界遗产为中心的，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自然与资源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文化财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保护思想与实践为基础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由此，我国本土的“文物”概念及保护理念逐渐被纳入世界遗产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世界遗产的“话语”表述与权威逐渐成为影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因子。此后，我国开始了世界遗产的申报活动。1987年，北京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第二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对我国的世界遗产进行了考察，并指出我国文化遗产在概念体系、研究深度和管理水平上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引发了国人的思考，激发了学界对文化遗产的关注与研究。这一时期的遗产研究主要是对国外遗产保护经验和保护理念的引介。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化事业与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的联系日益紧密，“申遗”与遗产保护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热门词汇。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00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5)先后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界定,其中引用最多且最为权威的解释为: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sup>①</sup>

2011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一步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如下:

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sup>②</sup>

显然,上述遗产概念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不同历史时

---

①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189](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189), 2005年12月22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268](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268), 2011年2月25日。



期的价值体系与认知理念,或者说,遗产已经烙下某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认知。譬如当今流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既用以指“传统文化”、“活化石”,也可能被误读为“落后文化”、“旧的传统”、“保守势力”、“封建迷信”等,这些精华与所谓的“糟粕”之分、价值高低之分,恰恰说明了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重视其特殊的语境。<sup>①</sup>然而,在不同的场景和语境中,无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总是成为被言说、被表述和被解释的对象,“拆哪”(CHINA)即是当下遗产保护与管理实践中最集中的体现。所以,既要重视遗产的特定场景和语境,也需探索适合本土实际的遗产保护理论。

应该说,遗产概念的演变是伴随着全球性遗产运动的发生发展而进行的。需强调的是,遗产运动的发生发展同样反映在各国申报遗产与保护遗产的态度和举措上。具体到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等6处遗产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并于198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遗产申报工作由此拉开序幕。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向国际社会宣传了中国的灿烂文化,启动了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实际性合作。随着中国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地位的提高,我国申报遗产的热情日益高涨,地方政府开始了竞争性申报。从1992年开始,地方政府“世遗”申报的压力增大,如申报成本越来越高,不过,“申遗在许多地方成了一项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政治任务”。20世纪末,世界遗产的申报在“为国争光”(江泽民语)的号召下变为一项政治任务,从而也激发了全国“申遗”的热情。全国性的遗产申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遗产保护,更被视为拉动地方经济与旅游发展的主要动力。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公众舆论对世界遗产的监督力度的加大,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冲突事件逐渐显现。典型的冲突事件如“水洗三孔”事件(2000年)、张家界百龙电梯事件(2002年)、黄山修建水库事件(2002年)等,此外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及地方民众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如丽江的“空壳化”现象、宏村人集体状告地方政府的“民告官”事件、武陵源区社区民众的冲突事件、武夷山新村人的群体性上访

<sup>①</sup>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事件等等。这说明遗产的申报并未能达到保护遗产的初衷,遗产申报与遗产保护反而常常被误解成一则悖论。但是,事实上“申遗”本身就是一种保护遗产的行为。近年来中国的遗产申报工作表明,遗产申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对遗产地进行重新梳理与整治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强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过程。<sup>①</sup>不过,从一些世界遗产地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过程对遗产地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景点的发明与新建就是对遗产真实性的破坏。此外,一方面,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主要由政府完成,地方政府更成为“申遗”的主体。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往往把“申遗”视为一个发展地方经济的契机和一项政府业绩。简单而言,在政治诉求、经济效益与旅游发展等方面的推动下,遗产申报日益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申报运动”。不过,一些遗产地重申报而轻保护,从而给世界遗产以及地方社会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申遗”更是变成了城市与景区改造运动;<sup>②</sup>与此同时,遗产保护也大都成了基于扩大地方知名度、打造旅游产品、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的功利行为,实际上,我们的“文化自觉”还没有真正实现。<sup>③</sup>

概言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遗产申报运动与保护运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在民族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地方政府的执行下愈演愈烈,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遗产运动。这场集聚全球化、现代性、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权力政治等特征的遗产运动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日渐显现,看来,即便是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村落社会也无法选择地被纳入其中了。

## 第二节 人类学取向的遗产研究

### 一、国内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sup>④</sup>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保护运动至少给当今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语言种类的严重“缩水”、

①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第42页。

② 同上文,第31页。

③ 田青:《我们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吗——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中国文化报》2010年2月22日,第3版。

④ 龚坚:《当前人类学视野中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地方文化的日渐消逝，人们对待“文化全球化”的态度日趋理性，保护多元文化成为一种共识，以目前的观念来讲，多元文化的外显形式就是那些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二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遗产保护（如内容、模式等）也面临“标准化”或者“单一化”的情状，在整体上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模式。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内遗产保护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悖论，如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文化生态区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演变的悖论、解构式的保护与文化整体观的悖论、传承人的保护与生存适应问题、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标准化”保护与凸显地方特色的悖论等。<sup>①</sup> 这些问题说明，国内关于遗产的研究仍不够深入、系统，因而通过对国内遗产的研究现状及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以遗产的地方性与主体性为理论基点，探寻文化遗产在当今遗产运动下的价值及存续的道路将是今后研究的新动向。

#### （一）国内遗产研究现状

自 1985 年至 1999 年，以“遗产保护”为主题词在我国最大的学术平台“中国期刊网”上搜索，结果显示关于遗产保护的各类文章仅 279 篇，其主题涉及对国外遗产保护经验和观念的引介，以及国内学者对新的遗产概念、文物建筑、城市历史街区、景区管理、博物馆与旅游等的阐述。进入 21 世纪的头十年（2000—2009 年）来，“中国期刊网”上关于遗产保护的各类文章的总数达 16853 篇，不同学科从各自的学科角度对“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及其他遗产类型的保护与利用进行研究，其研究主题涉及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原则与立法、文化遗产与生态博物馆、遗产与旅游管理等。在 2010 年至 2011 年期间，以“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各类文章数量剧增，达到 10604 篇。近 12 年来，相关的博士论文共有 161 篇，见表 1.1。以上数据足以说明遗产保护及遗产理论研究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其研究主题与学科视角日渐丰富与多元。尽管人类学、民族学已经成为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视角，但近年来博士论文的数量还相当有限。总体而言，早期对遗产的分析侧重于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原则等，近年来越来越

<sup>①</sup> 刘魁立、施爱东：《刘魁立先生访谈录》，《民俗研究》2007 年第 2 期。

越关注遗产的保护、利用及产业化开发,并开始对遗产保护实践进行学理上的探讨与反思。

表 1.1 2000—2011 年期间以遗产保护为主题的博士论文概况

年份(年)	博士论文数量(篇)	研究主题	相关学科
2002	1	城市文化	城市规划与设计
2003	2	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建筑保护	民族学、建筑历史与理论
2004	2	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生态、城市历史建成环境	城市规划与设计
2005	4	自然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城市遗产	矿产普查与勘探、民族学与社会学、建筑历史
2006	11	文化景观、建筑遗产、城市遗产、生态博物馆、遗产保护法、数字化保护	城市规划与设计、建筑历史及理论、经济学
2007	22	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城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建筑历史及理论、人类学、世界史、人文地理、舞蹈学
2008	27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民族生态博物馆、古村镇历史文化遗产、遗产旅游、文献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体育等	城市规划与设计、历史学、文物学、旅游管理、档案学、人文地理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数字化艺术与设计等
2009	21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研究、民族文化遗产、建筑遗产、工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遗产旅游等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民族学、历史学、旅游管理、国际法、建筑设计及修复工程等
2010	31	遗产保护与利用、民间艺术、大遗址保护与发展、传统工艺产业开发等	历史学、文艺学、考古学、艺术学、舞蹈学、农业等
2011	38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女书文化、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奥运遗产、农村文化建设、古建园林、建筑维护与维修技术等	档案学、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人类学、民族学、建筑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人文地理学、地质学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期刊网上提供的文章整理而成。



## （二）三种研究范式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遗产研究的主题集中于遗产价值的认识、遗产地资源利用、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等方面，其中多以管理学、旅游规划等视角探讨政府治理或管理下的遗产保护及其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而对遗产运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影响探究较少。新近出版的“人类与遗产丛书”（彭兆荣主编）则从遗产保护运动的缘起与“游戏”规则说起，对遗产的学理、逻辑和谱系进行解析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本土经验与实践，对遗产保护的本土化展开论述。这代表了当前人类学视野中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

### 1. 文本解读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面临重大挑战，一是田野工作的客观性受到质疑；二是民族志的书写遭遇重大的“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sup>①</sup>一方面，伴随反思、解构与批评的学术思潮，两本著作的问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sup>②</sup>和《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sup>③</sup>将人类学对自身学科的反思与批评实践推向高潮，它们主张以文化批评的态度来看待社会与文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民族志田野调查中的多元声音以及文本表述的客观性，同时指出“地方性描述”应置于全球的场景之中；另一方面，克利福德·格尔兹等人认为民族志田野调查应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sup>④</sup>出发，采取“深描”的方法，将民族志的书写视为一种“理解他人的理解”。与此同时，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也强调将民族志“文本”（text）置于特定的场域（context）进行阐发，对文本背后的符号（symbol）、话语（discourse）及意义等进行解读和“知识考古”<sup>⑤</sup>。

①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② 同上。

③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④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 页。

⑤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218 页。



在遗产学领域,部分学者沿此思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等文本来解读和梳理“人类遗产体系”及其保护运动的源起和“游戏规则”。自2005年开始,介绍国外遗产保护经验、遗产概念、遗产价值等方面的著作纷纷问世。如《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sup>①</sup>从文化遗产保护史、组织建构、法律建设以及成功经验等多个角度对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相关国际组织近百年来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进行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sup>②</sup>从基础理论和保护实践两个方面阐述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措施。类似的研究成果还包括《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概论》<sup>③</sup>、《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sup>④</sup>、《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概论》<sup>⑤</sup>等。纵观此类著作,其研究仍是以介绍和阐述遗产的发展过程、价值体系、组织结构、保护原则等为主,而对于文本(text)背后的“话语”和表述关注不够。

如果说前述作品回答了“遗产是什么”,那么《遗产:源起与规则》一书则向我们解答了“遗产是怎么来的”。该书整合和爬梳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遗产相关的四份国际文书以及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各项遗产保护实践,试图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套日趋完善的人类遗产体系进行反思和“知识考古”。<sup>⑥</sup>按照作者的观点,遗产的发生发展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欧洲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等密切相关,而且从遗产保护的初期开始“遗产”就成了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因素;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架构的人类遗产体系及所制定的遗产规则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西方国家“角力”的结果。在作者的阐述中,遗产的权属已经在全球性的遗产体系中发生改变,遗产的归属主体被表述为两个层面,即全人类共有(理念上而非法律所有权的共有)、所在缔约国所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以上学者的尝试说明我国遗产研究已趋于成熟与理性,不过他们所代表的研究尚缺乏主体

① 顾军、施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②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③ 孙克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概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 向云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 李春霞:《遗产:源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意识,缺乏中国的本土经验。

## 2. 理论阐释与反思

伴随遗产保护理念的传播以及世界一体化的加速,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矛盾日渐显现。一方面,全球性的遗产保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保护意识,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如地方文化主体的集体出走,传统文化的重构、再造等;另一方面,由于现代遗产具有特定的话语权力,政府、专家等外部力量居于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由此造成遗产保护的“他者化”现象明显,地方社会往往处于“失语”的情形。正是在此背景下,张松、崔延虎和彭兆荣等学者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当下的遗产保护、遗产运动等进行了反思与论述。张松在阐释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基础上,指出地方性保护与公众意识对世界遗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sup>①</sup>崔延虎就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背景、认识视角与方法视角,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重视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尤其是文化载体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认知体系,并针对用“己文化”误读“他文化”及“文化制造”的现象,提出广泛吸纳遗产直接持有者和传承者参与项目保护等建议。<sup>②</sup>

解读和爬梳国际性的相关文本对于遗产概念及遗产保护理念的推广是积极有效的,而从学理上对遗产的发生发展、逻辑和谐系进行阐释和反思,将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理解遗产保护的主体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相关的学术论著较少,而其中又以《遗产:反思与阐释》一书最具代表性和反思性。在作者看来,当下的遗产运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进行的,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主导,由地方政府实施的,挟裹了话语权力、政治权威、行政力量等在内的政治运动。而作为遗产的直接创造者、传承者却常常处于“失语”的情状中,这对于遗产保护来说无疑是值得警醒的。<sup>③</sup>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家园遗产”,强调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与人文生态的和谐共处。

具体而言,该书对西方遗产理论进行了引介与阐释。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遗产研究的理论取向不一,主要涉及遗产的共谋理论、遗

① 张松:《世界遗产保护的理论问题研究》,《建筑师》2000年第6期。

② 崔延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③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0页。

产的产生动机(动机说)、遗产的延续性(延续说),遗产的“资本”形态(资本说),以及遗产与认同的互证关系。<sup>①</sup>在作者看来,上述理论取向显现出一个共相,即遗产的发生发展与(后)现代语境中的资本、权力、政治以及认同等方面紧密相关。也就是说,遗产的发生发展有其潜藏的逻辑和特定的场域,因此遗产概念的全球化和遗产保护的全球模式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人类遗产的归属问题是遗产研究中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遗产运动已经使遗产的内涵与外延发生显著变化,从这种变化来看,今天的遗产已经被打上强烈的现代烙印,是一个时代的话题,也是一个具有鲜明话语特征的产物。从这层意思来看,遗产首先是以物的形态展示在众人面前。其次,由于遗产融入了“主观的、描述的和解释的经验”<sup>②</sup>,那么遗产的存续就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权力与政治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方面,“民族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可的唯一的合法申报主体,是遗产的根本性的表述主体。而“国家遗产”的产生比“国家”和“遗产”的历史晚近得多,属于现代国家的历史范畴和特殊的表述范式<sup>③</sup>。因此,“民族—国家”名义下的“国家遗产”已经具有政治共同体的符号内涵。也正是因为其权力与政治的彰显,时下的遗产运动也具有明显的政治表象。

另一方面,就遗产的归属主体而言,遗产的归属主体在现代社会发生了转变,由个人的、家族的、地缘性人群共同体的扩大为“民族—国家”的,更引申为全人类的。这是因为遗产在权力、政治、话语等因素的影响下已经成为被言说、被表述的对象,其价值也因此被附加了大量的其他形态。<sup>④</sup>所以遗产的本体性表述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另有部分论文对遗产的主体性与归属性以及保护原则进行了论述与反思。林姝婧对后现代语境中的遗产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

① Peter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p. 6.

② A. Synnestovedt, “Who Wants to Visi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A. Russell, ed.,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Heritage*, New York: Springer, 2006, pp. 334-335.

③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④ 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深入探讨,指出大规模的群众旅游对遗产造成的最大冲击在于:遗产的归属发生“隐形变更”,使遗产的主体与游客的关系发生“倒置”。换言之,遗产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或“出让”,游客成为遗产和遗产地的“主人”,并由此新建景点,或“发明传统”,抑或“制造遗产”等<sup>①</sup>。吕俊彪在对当前“行政权力主导下”的遗产保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还俗于民”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和文化主体弱化问题的必然选择。<sup>②</sup>在作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亟须重视地方民众的文化参与和自觉意识。

### 3. 经验研究

以上两种路径都是对遗产及其保护理念和保护运动进行的思考和探究,纵观其研究,他们大多缺乏活生生的具体个案和本土经验,对地方社会与文化主体——人的关注还不够。而《遗产:实践与经验》则正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该书以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本土经验,对全球化和世界遗产运动背景中的遗产保护进行探讨。换言之,作者是以中国经验与本土实践,力图说明国外的遗产保护理论和模式如“生态博物馆”并不一定适合中国本土文化“生态”,而且这些来自外部的话语、权力正在重新建构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化和民间社会。<sup>③</sup>

其次,《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也是一本以地方社会与文化保护为主题的人类学民族志。在作者的阐述中,“围龙屋”这一古建筑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文化遗产,而更是客家族群应对现代化、城市化而进行的“文化抗争”的资源与符号,“护祠运动”则是地方社会进行文化重组与再造的象征化“表述”。<sup>④</sup>

此外,论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sup>⑤</sup>则强调了科学普查和田野考察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另有部分

① 林姬婧:《论遗产与旅游》,《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 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去主体化倾向及原因分析》,《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③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④ 周建新:《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⑤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论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某些具体事项进行了论述。如巴莫曲布莫运用“五个在场”理论对彝族毕摩演述史诗进行了论述。<sup>①</sup>郝苏民以“花儿”体民歌为个案,探讨了口头传统的文化变迁、文化植被等与保护的关系。<sup>②</sup>彭兆荣基于对原始艺术概念的反思,对少数民族、“原住民”社会的传统文化及其艺术种类和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及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保护和传承“第四世界”的艺术与发展地方经济时,应当警惕传统的“两个中心”悖论的影响:一是世界范围内的“欧洲中心”,二是中华民族“华夏中心”的历史观。<sup>③</sup>大卫·吉诺特(David Gileault)以伍家沟歌师为例,说明中央政府对地方口传艺术的保护经验是失败的,并认为国家的保护措施,比如为歌师们修建故事堂或歌谣堂,仅仅只是把歌师的歌唱当成了一种表演行为,把村庄的历史当成一种展示,而没有关注到地方文化传统的内在连续性与关联性及其地方文化持有者的社会结构。<sup>④</sup>

近些年来,我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以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遗产管理与地方民众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针对这些问题的显现,不同领域的学者从自身学科背景出发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开发与管理进行了论述。正如杨效忠和路林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研究述评》一文中所归纳的:世界遗产地研究的初级阶段(1985—1990年)主要是以地理学、建筑学、考古学、美学等学科为主,侧重于世界遗产地旅游资源的评价研究;进入9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1991—2000年),则加入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在运用实证分析、统计、构造模型等方法的基础上,对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进行了研究;21世纪初,遗产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学科特色,这一时期管理学、法学、营销学等学科引领潮流,在实证研究与理性分析的基础上

① 巴莫曲布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② 郝苏民:《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③ 彭兆荣:《“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④ 大卫·吉诺特:《历史与他者结构——以中国鄂西伍家沟歌师为例》,《中国人类学评论》2007年第4期。



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经营管理进行了探讨。<sup>①</sup>由此观之,近年来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等问题逐渐从“边缘”走向“热点”。

另外,向岚麟通过对1985年至2006年以来我国相关的13种期刊及其与世界遗产相关的文献进行的综述,指出22年间我国的世界遗产地研究历经了四个阶段,即1985—1991年、1992—1996年、1997—2001年、2002—2006年,其研究主题也经历了由遗产本体的研究到遗产活动的研究,再到遗产话语的研究及其他相关研究的渐次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遗产地经营管理、环境监测、遗产保护技术、遗产学科教育是今后遗产研究的重点。<sup>②</sup>

### (三) 研究趋势与新动向

纵观国内关于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遗产的研究从早期对遗产价值、遗产保护原则的解读,发展到当下对遗产运动及其挟裹的权力话语的反思;从对“自上而下”的遗产管理实践的论述发展为当前对遗产地社会及文化主体的整体性研究;研究方法由“客位”的“他者”建构转变为“主位”的调查立场。而当前研究多数以遗产与旅游、管理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而较少对地方社会的变迁以及遗产与地方、国家的互动关系进行论述。就研究视角而言,当前研究大都囿于现行遗产管理实践模式以及“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模式,其研究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某种程度上看来,它们似乎显得过于软弱。

总之,以上三种研究路径——文本解读、理论阐释与反思以及经验研究至少对当前的遗产研究有如下启示:

其一,要特别关注遗产研究背后所潜藏的西方话语及内在逻辑。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遗产保护非常重要。遗产保护与研究有其发生发展的特定场景和语境,特别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倡导而起的全球性的遗产运动更是如此,如遗产的概念、遗产的申报标准、遗产的认可与选择等等都体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

其二,要实现遗产研究的本土化亟须重视中国国情和本土经验,

<sup>①</sup> 杨效忠、路林,《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研究述评》,《人文地理》2006年第4期。

<sup>②</sup> 向岚麟,《近22年世界遗产地研究进展——基于13种中文期刊的考察》,《旅游学刊》2009年第4期。

让中国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如吴毅所言:“扎根于基层田野的研究和村庄叙事不仅为我们提取去西方化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学者们提供了连接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这种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和互动才真正有助于在不排除各种外来理论与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并寻找本土理论的社会根基。”<sup>①</sup>这也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

其三,遗产研究的经验基础主要是源自民间社会,所以要特别强调“地方性知识”。概言之,今后的遗产研究亟须重视遗产运动及其影响下的地方社会,关注地方社会的文化变迁,以期实现遗产保护与地方民众、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和谐发展,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传承。

## 二、国外遗产研究回顾与展望

### (一) 国外遗产研究概述

对国外遗产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之一的《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进行的检索,可以反映出国外对世界遗产的关注程度。《国际遗产研究期刊》自1994年创刊以来,相关文献的研究视角涉及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管理科学等学科,其主题涵盖了遗产研究、遗产与博物馆研究、遗产旅游研究、遗产与认同、人文地理、遗产理论与历史、遗产保护与修复技术和法律、文化研究以及遗产的解说与规划设计等方面。概言之,其研究的主题日益深入和细分化,关注面也越来越广泛,早期较为关注博物馆及其相关研究、文物保护与恢复技术等多方面,近年来则越来越关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并开始对遗产保护与实践进行反思和学理探讨等(如表1.2)。

---

<sup>①</sup>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1—382页。



表 1.2 《国际遗产研究期刊》创刊以来研究主题及其变化

年份	相关研究主题
1994	博物馆收藏、博物馆与遗产解说
1995	遗产解说、遗产价值、博物馆管理、遗产展示
1996	文化遗产保护与重建、博物馆管理、遗产解说、遗产认同
1997	博物馆管理、遗产价值、遗产认同、遗产旅游市场、遗产重建
1998	文化遗产展示、自然遗产解说、遗产规划
1999	遗产解说、遗产与旅游休闲、博物馆与全球化、文化多元
2000	(考古)遗产管理、文化遗产管理、博物馆管理、社区参与、旅游对遗产的影响
2001	遗产解说、遗产认同、遗产旅游管理、社区与自然遗产管理、博物馆、城市发展与城市遗产、历史遗产恢复与重建
2002	遗产保护政策比较、遗产旅游管理、遗产形象、遗产创新、遗产经营效益管理(多以世界遗产地为例)
2003	遗产展示与解说、遗产志愿者、遗产旅游与移民、遗产认同、民俗遗产、社区遗产管理(多以世界遗产地为例)
2004	文化遗产管理、无形遗产的保护管理、真实性
2005	遗产与社区、遗产旅游与冲突的解决、遗产地与公共利益
2006	遗产认同、博物馆与认同
2007	世界自然遗产的管理与保护、文化景观遗产
2008	遗产与地方、遗产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2009	遗产与环境、遗产与家园、工业遗产、世界遗产的保护与所有权问题、国家遗产与官方遗产
2010	社区遗产的政治、管理与社区参与问题、全球遗产、遗产旅游、遗产与经济
2011	历史建筑博物馆、反思性的遗产研究、劳工遗产、遗产景观
2012	遗产化过程、遗产真实性、世界遗产与人权、海洋遗产的叙事与认同

资料来源:《国际遗产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http://www.informaworld.com/smpp/title~db=all~content=t713685629~tab=issueslist>;另参阅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第14页。

国外关于世界遗产的研究成果丰硕,从现有外文文献来看,其研究范围涵盖海滨遗产、水下遗产、文化遗址、博物馆等多种文化遗产与



自然遗产的保护、恢复、重建与完善方面的理论、技术及手段。就研究主题而言,有学者对民族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研究,提出必须以尊重当地民族为先的观点;关于管理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从政府的角色与地位(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heritage tourism)来探讨政府工作的影响。针对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有学者对沿海地区进行了研究,指出旅游发展是遗产保护的积极因素,并就遗产是资产还是责任的命题展开了讨论。<sup>①</sup>

2001年,日本在鹿尔岛举行的一次世界遗产国际讨论会提出,当前国际遗产管理面临六项基本课题:一是关于濒危的世界遗产;二是与遗产有关的部门发展及其给世界遗产带来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三是指日益增多的游客、旅游设施、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四是指世界遗产分布的不平衡特征;五是指世界遗产的维护管理,如何进行国际支援和紧急援助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课题;六是指未加入世界遗产条约的国家的遗产保护。<sup>②</sup> 上述讨论反映了当前国际社会进行世界遗产保护研究的基本方向。

## (二) 主要研究领域

从现有外文文献来看,人类学取向的国外遗产研究主要涉及两大部分:

1. 遗产与博物馆(体)的研究。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分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形式的遗产都将以物的形态展现于人,而博物馆正是诠释物的话语机制的最佳场所。斯宾塞·克鲁(Spencer Crew)和詹姆斯·西姆斯(James Sims)认为,物只有通过展示(display)和保存(conservation)才会被固定化和获得意义,以依附于博物馆的环境。<sup>③</sup> 博物馆中的物,其收集的原初动力是其视觉效益(visual interest),通过将物从其仪式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背景中移出,使“博物馆将文化载物(cultural materials)变成了艺术客

① 孟华:《中国山岳型“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的人地和谐论》,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第4页。

② 罗佳明:《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③ Crew, et al., *Locating Authenticity*, cited from I. Karp, ed.,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 159-175.



体(art objects)”<sup>①</sup>。由此看出,对物进行选择、收集并移植于博物馆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剥离其非物质文化语境及属性、重新附丽客体性艺术价值的行为。从博物馆(museum)的词源来看,“museum”最初指缪斯庙,即专门祭祀缪斯的庙宇,也是用于收藏于女神掌管的艺术品场所。此外,“museum”具有“记忆”的现实意义与功能,莫尔认为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使参观者通过知识将过去、现在和未来完整地连接在一起,并使之得以记忆,而不仅仅限于“物”的收藏和展示上。<sup>②</sup>

从现代博物馆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历史的建构紧密相关。马雷夫瑞(Maleuvre)指出,“博物馆对历史的重新发明(the museum's reinvention of history)被认为是对历史原义的一种威胁”<sup>③</sup>。一方面,现代博物馆通过搜集、修复与保护文物,使那些濒临灭绝和毁坏的文物得以留存和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博物馆具有展示文物的需求,那么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通常已经搬移文物的历史现场,而按照专业的分类进行过重新排列。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在博物馆里展示的物化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吗?”<sup>④</sup>毫无疑问,现代博物馆所展示的历史与“欧洲中心”的话语特征、西方价值体系、殖民主义的怀旧等等关联在一起。从这方面看,今天的博物馆事业已经体现出明显的“西方模式”,并对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发展造成了日益显著的影响。

如卡普兰(Kaplan)所言,现代博物馆还具有塑造自我意识的潜力。<sup>⑤</sup>也就是说,博物馆所选择、展示的文物与人类文化互证互疏。一方面,人类的收藏与文化一样悠久,文化在创造收藏(collections)的同时,收藏本身也创造了文化。<sup>⑥</sup>而另一方面,“艺术与手工制品,虽

① Svetlana Alpers, “The Museum as a Way of Seeing”, in I. Karp, Steven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p. 25-32.

② Willard B. Moore,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Reflection upon Interpretation in Folklife Museum”, in P. Hall, ed., *Folklife and Museum*, 1986, pp. 51-58.

③ Maleuvre, *Museum Memories: History, Technology, 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

④ Ibid., p. 13.

⑤ Flora S. Kaplan, *Museums and the Making of “Ourselves”: The Role of Objects in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

⑥ 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稻乡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然被视为美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明证,其被挑选的原则却并非其独特性,而是基于其陈列价值(display value)<sup>①</sup>。此外,由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加速,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表现为移动性(mobility),而且人群、信息、技术、资本等的移动与人群离散现象(diaspora)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空间置换(de-placement)。随着流动性的加强,一方面,人们具有对“根”的永恒追求;另一方面,人们日渐产生对昔日历史文化的“怀旧”,对旧物的怀念。在这种怀旧的原型情结的传递和陈述中,对遗产的物化需求也就更加突出;那是一种对过去、对家乡的永恒记忆。表现为“越是在迁移中的人民,就越表现出对他们珍藏和收集过去的有形纪念物的珍视”<sup>②</sup>。

2. 遗产与旅游的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旅游已经成为当今“地球村”中人们的基本生活内容。特别是,随着大规模群众旅游(mass tourism)时代的到来,人群、资本、信息、技术等移动日趋频繁和规模化,并促成旅游业成长为当前最大的一种产业。从本质上看,旅游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方面,旅游包含许多表述性的文化内容,譬如仪式、艺术、运动、民俗等;另一方面,现代旅游表明,旅游业是一项文化性的经济产业,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活动。旅游可以通过门票收入、纪念品收入以及其他相关的旅游服务产品带来经济收益,由此,旅游不仅仅是一次“神圣的旅程”<sup>③</sup>,或者一种“探索行为”,抑或一种文化体验,更是演变成为一种出售文化产品的商业活动。其次,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在享受现代工业技术主义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担忧,如战争的威胁、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等等,因此人们日益怀念“已逝”的过去,并试图在关于过去的“纪念物”中追寻或重塑一种家园感、归属感。而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恰恰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怀旧”、“寻

① Casey Valerie, "The Museum Effect: Gazing From Object to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History Museum", paper in Digital Culture and Heritage: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CHIM 2003-New Medias, New Scenographies, 2003, p. 7.

②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

③ 瓦伦·L. 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根”和确认自我的场景,从这方面看来,遗产为旅游赋予了丰富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与此同时,民众通过旅游活动来体验遗产,感受民族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对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就此而论,遗产旅游是遗产研究中重要的议题之一。

近些年来,旅游与遗产的关系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这方面的著述相当丰富,并且其研究主题不断细分化和具体化。通过以旅游与遗产为关键词和题目对1974年至2003年之间第一季刊《旅游研究年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进行的检索,其相关文献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对世界遗产项目的研究,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研究,遗产旅游的管理研究,旅游者的需求与动机、行为和体验的研究,遗产旅游的定义、解说、价值与影响的研究,遗产旅游与消费的研究,遗产和后现代旅游的关系研究,遗产旅游中的利益分析研究以及对真实性(authenticity)的研究。<sup>①</sup>国内以遗产与旅游为论题的研究,多以旅游或管理为视角,以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为焦点,并在此基础上做理论阐发。这方面的著述较为丰富,如陶伟的《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发展研究》(2001)、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2004)、张朝枝的《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2006)和《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2008)、王艳平的《遗产旅游管理》(2008)、彭顺生的《世界遗产旅游概论》(2008)等。

具体到旅游与遗产的关系,早期研究更侧重于遗产与旅游的成功“携手”,后期研究则强调在文化遗产所有者与旅游者体验两重视野下,来观察旅游情境中的“主—客”意识。一是探讨在大众旅游影响下的“东道主”社会与文化传承者的互动及其文化变迁问题,二是探究“东道主”社会、文化传承者与旅游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讨论旅游业发展及其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的嬗变、流失抑或复兴等问题。<sup>②</sup>

随着旅游与遗产的联袂,“文化真实性”问题成为遗产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旅游人类学家麦克内尔首次将“真

<sup>①</sup> 陶伟、岑倩华:《国外遗产旅游研究17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反映的学术态势》,《城市规划汇刊》2004年第1期。

<sup>②</sup> 赵红梅:《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展演与族群认同——以丽江白沙乡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实性”概念引入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之后诸多学者开始关注旅游中的“文化真实性”问题。<sup>①</sup>有学者指出,旅游的真实性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1)客观主义真实性(objective authenticity),指旅游在客观方面上的原始属性,如旅游行为;(2)建构主义真实性(construction authenticity),指在对真实的建构中既包含了旅游行为本身的客观性,同时又浸透了一些其他因素,如权力、想象等;(3)存在主义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指存在(being)的状态。进一步而言,从旅游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旅游地是否真实,他们都有可能感觉到真实。<sup>②</sup>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国内学者对文化商品化与文化真实性问题的讨论。<sup>③</sup>1988年,科恩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持问题进行了探讨,1993年,阿道夫就日本旅游真实性与遗产建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sup>④</sup>1996年印度尼西亚学者 Wiendu Nuryanti 以“遗产与后现代旅游”为题,指出遗产旅游存在四个值得思考的基本问题:对遗产旅游的解读、被构建遗产的出售、遗产地的规划、遗产旅游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等。<sup>⑤</sup>1997年,泰奥(Peggy Teo)与约(Brend S. A. Yeoh)在《地方遗产的旅游再制作》一文中,阐述了当地人对遗产再制作的反应与旅游者对此“新型”旅游商品的感知情况。<sup>⑥</sup>

相关的研究表明,有关旅游与遗产的讨论日趋具体化。譬如遗产综合管理、区域遗产的应用、历史名城/旅游城市的环境问题、遗产风景区的本质,另外,也有学者论述旅游和遗产的社会与政治关系,对遗产的供给、需求、保护、管理、解说、真实性等方面以及遗产与政治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其范畴涵盖了遗产与旅游的社会意义的研究、遗产管

① D.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② Ning Wa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 1999, p. 26.

③ 吴晓勇,《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困境研究》,《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④ 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⑤ Wiendu Nuryanti, "Heritage and Postmoder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3, 1996, pp. 249-260.

⑥ Peggy Teo and Brend S. A. Yeoh, "Remaking Local Heritage for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4, 1997, pp. 92-213.



理的研究、一般性的遗产研究,以及遗产的未来走向等。<sup>①</sup>

从现实情形来看,遗产的潜在价值是最直接旅游资源,这可从蜂拥而至的大众旅游看出;另外,遗产旅游的独特性可能会使规划者依据需要选择遗产地的一些文化特质,一方面适应于全球化的模式需要,另一方面凸显其地方文化特色。这一观点呈现出遗产地村落面临遗产旅游而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去地方化”与“再地化”。前者说明政府现行的遗产保护模式势必会削弱传统村落自在自然的地方文化,而后者则反映出遗产旅游所具有的潜在的商业价值、经济利益等将引起地方文化的再造与传统的发明。正如印尼旅游学者纽阳蒂所指出的:“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构成了遗产的特点,即特殊性与普遍性。为了成为极具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目的地,每个被策划旅游开发的遗产地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但是与此同时,即使其意义与重要性可能会受到质疑,需要重新加以解释,重新创立,甚至是重新建构,遗产地必须拥有各种不同游客都能够认同的普遍意义。”<sup>②</sup>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遗产保护与利用恰恰迎合了旅游发展的需求,而旅游开发则彰显了“保护遗产”下的合理利用。因而,遗产申报成功即意味着遗产地群众旅游的兴起,“遗产”的名片往往能用以转换成文化资本和商业资本等。

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与遗产的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但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主义(consumerism)、商品化(commoditization)却是促成旅游与文化遗产联手的主要因素。诚如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雷本所言,在旅游经济中,出于盈利的目的,任何可以合法地吸引外来游客的文化因素,如民俗、文化遗迹等文化遗产,它们都可以被包装、被定价、作为商品提供和出售给游客,文化被当作商品来买卖,文化遗产进入旅游消费市场<sup>③</sup>,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商品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即“舞台化”,而“舞台”的真实性问题备受质疑。恰如美国旅游人类学家

<sup>①</sup> 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遗产旅游》(程尽能等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1页。

<sup>③</sup> 纳尔逊·格雷本:《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格林伍德所表达的,“文化商品化只需几分钟,而几百年的历史却毁于一旦”。

另外,几本论著对“遗产旅游”的概念及相关的内容进行了阐述。蒂莫西和博伊德的《遗产旅游》(2007)在“遗产旅游”的话语背景中,对遗产的供给、需求、保护、管理、解说、真实性等方面以及遗产与政治的关联进行了探讨,其范畴涵盖了遗产与旅游的社会意义的研究、遗产管理的研究、一般性的遗产研究,以及遗产的未来走向。另外,美国旅游人类学家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H. H. Graburn)的《人类学与旅游时代》(2009)一书阐述了旅游人类学的基础性学理,探讨了以旅行—旅游为基本活动方式的研究方法对传统人类学在方法论上提出的挑战和具备的变革意义,并以日本近几十年来的旅游发展为案例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遗产热”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在他看来,遗产与传统、怀旧等都是现代性的产物,而它们正在成为影响人们进行旅游的“消费”对象。

此外,几本编著的问世,使遗产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不断深化与拓展。譬如玛丽·霍福德(Mary Hufford)主编的《保护文化:关于遗产的新话语》(1994)分为三大主题,共16篇论文,涉及对历史的保护、对生态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其中洛(Setha M. Low)以“地方的文化保护”(1994)为题,对遗产保护与地方保护的关系及特征进行了阐述。在作者看来,地方是一个赋予我们行为以特定背景与象征意义的文化空间,也是地缘性认同及地方性与全球化和现代世界的联系纽带。这说明,地方特质与全球同一性在地方遭遇、展演,并对人群共同体产生影响,带来改变。另外,地方是一个社会文化再生产与政治构建的场所,同时也表现出复杂多变的特质。

基于对地方的强调,托雷(Marta de la Torre)等编写的《基于遗产价值上的遗产地管理:四个案例》(2005)一书汇集了四篇关于世界遗产地的论文,它们分别以位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四种不同类型的世界遗产地为个案,对遗产地的管理模式、文化遗产地保护的意義与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作管理”的遗产保护模式。由戴维·哈里森(David Harrison)与迈克尔·希区柯克(Michael Hitchcock)主编的《世界遗产政治学:旅游与保护的协作》(2005)囊括了19篇学术论文,涉及世界遗产的表述问题、世界遗产地



利益主体问题、遗产与记忆、遗产与认同、遗产与旅游等内容,概括来看,它们主要是从遗产政治学的视角对全球性的遗产运动以及遗产与旅游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近年来,由艾利森·赫姆斯(Alison Hems)与马里恩·布洛克利(Marion Blockley)主编的《遗产解释》(2006)汇编了14篇论文,对城市遗产、工业遗产、国家公园、文化景观、历史遗迹等方面进行了阐释。此外,彼德·奥瓦尔(Peter Howard)的《遗产管理、解释与认同》(2006)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遗产学的相关内容,对何为遗产、遗产学的历史与相关理论、遗产与认同、遗产管理、遗产解说、遗产消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 (三) 研究视角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外的遗产研究正在日益成熟与系统化,其研究视角并不局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公约的遗产框架,而是具有向外的、反思的特点。总体来看,遗产批评、遗产政治学一直是国外遗产研究的主要动向。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罗伯特·休伊森(Robert Hewison, 1989)就从遗产政治学的视角对“遗产产业”(heritage industry)进行了反思。在作者看来,“遗产产业”<sup>①</sup>是指一套标准化、数量化、技术化、模式化、法规化以及行政化的“流水线”作业,以操作程序相似或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sup>②</sup>这样,遗产产业就掩盖了遗产的正向价值,如实践价值(stewardship)、学术价值(scholarship)与认同等,而造成了遗产的归属权和所有权的转变,同时使遗产变成文化再生产、“文化产业化”的产品或商品,从而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想象”成分,如遗产的建构、传统的“发明”或“创造”等。从此层面看来,遗产的“产业化”将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同一性,也会使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受到破坏。同时,对遗产产业的质疑与反思也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与

<sup>①</sup> J. E. Tunbridge, and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p. 2.

<sup>②</sup>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理性”的批判以及对“去中心”和“地方性”的诉求。<sup>①</sup>

围绕遗产的归属性与权力、政治的关系,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 1996)首先从个人遗产、地方遗产和官方组织等角度对“遗产是由主流群体界定”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戴维·哈里森(David Harrison, 2005)则从地方、家园的角度对遗产的归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遗产的归属性首先表现为个人的或家园的(the ‘place’ of home);其次,所谓“真实的遗产”也是经过某些个人、人群或历史的选择。而且,遗产的表述与解释同样具有选择性,并且都受到主观性、权力话语、历史记忆、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世界遗产身份的获得与其说是遗产得到了自我延续与传承,毋宁认为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民族—国家政府等主流话语以及高度政治化过程决定的结果。从这层意思来看,遗产的地方主体常常处于被“他者”表述的情状中。其次,彼得·奥瓦尔(Peter Howard, 2006)把遗产与继承、继承物联系起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遗产的所有权(归属权)(ownership)和遗产主体——人(们)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遗产的所有权常被用来描述一群人在政策上的责任感,不过这些政策经常受国家话语、权力等力量的影响,因而所有权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此外,继承之物是在被识别以后才被称为遗产,而任何遗产都可能是一个混合物,他们界定着不同群体的认同——国家认同、地域上的认同、家庭的认同、个人的认同。易言之,奥瓦尔看到了潜藏在遗产背后的力量来源和主体——受话语支配的“人们”,特别强调遗产的识别往往受到国家权力与强势话语的支配和影响,并由此造成了遗产的原初主体由个人的、族群的向国家乃至人类遗产的转变。秉承反思的研究思路,贝弗利·巴特勒(Beverley Butler, 2006)认为,遗产的价值已经被附丽上了许多其他的形态,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民主、文明、人文主义、全球主义(cosmopolitanism)等已经成为遗产在现代语境中的核心价值,并构成正在进行的遗产运动中的关键动因。

总体而言,关于遗产的上述批评与论争都是基于对遗产运动进行的“冷”思考,它们至少反映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现代语境

<sup>①</sup> R. Hewison,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avid L. Uzzel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Belhaven Press, 1989, pp. 17-22.



中,遗产的现行语义已经被附丽了工业社会、技术主义、强势话语、行政权力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遗产所呈现的历史文化传统逐渐演变为群众旅游的“消费”对象,成为“遗产产业”链中被操纵、被出售的商业“资本”,而遗产所附着的地缘性人群共同体更是在遗产运动的场景中被“遗弃”或被“异化”。

其次,从遗产运动的发生发展来看,遗产运动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政治性。这是因为:其一,遗产是经过选择的部分历史和过去,而历史往往是从战争的获胜者与当权者的角度来加以描述;<sup>①</sup>其二,遗产的确认、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必定涉及授权和参与<sup>②</sup>;其三,遗产还与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密切相连。具体而言,遗产及其命名在本质上就具有政治意义。“确切地说,一些遗产被统治者用来为其倡导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体系服务”<sup>③</sup>,也可以说,“遗产是由主流群体界定”<sup>④</sup>。这体现在国家化、正统化的遗产使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合法化的历史部分,以及遗产是经过选择,由“他者”来识别和确认的事实中。例如,一般意义上的遗产或者大部分的遗产旅游大都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普通民众的生活痕迹,换句话说,遗产区域内及周边的地方民众不断被他者表述和选择而处于边缘化的境地。其四,遗产既可以反映出权力,也可以反映出冲突。<sup>⑤</sup> 国际组织、民族国家与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遗产政策、识别遗产身份、确认遗产、施行遗产管理等方式,以强势的话语权力和所谓的“立法”把与遗产紧密相关的地方利益主体或者说遗产主体排除在外,从而引起了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五,遗产的规划与开发问题也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遗产区域的地方社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授权并受到鼓励去参与到规划与开发当中,进而分享遗产旅游发展带来的益处? 其实这是个权

① C. M. Hall, "Tour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Australia", in R. W. Butler and S. W. Boyd, eds., *Tourism and National Park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Chichester: Wiley, 2000, pp. 29-38.

② Marks,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 *Habitat International*, No. 20, 1996, pp. 265-278.

③ 戴伦·J. 蒂莫西·斯蒂芬·W. 博伊德,《遗产旅游》,第277页。

④ R. Hewison,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avid L. Uzzell,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Belhaven Press, 1989.

⑤ 戴伦·J. 蒂莫西·斯蒂芬·W. 博伊德,《遗产旅游》,第252-272页。

力的问题。可以说,本地人被排斥在决策规划过程之外的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司空见惯的传统做法,在一些较为传统的群体中情况更是如此。<sup>①</sup> 不过,近年来,形势正在发生转变,本地社区授权问题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基兰认为,在对遗产进行解说与表述的过程中,必须承认地方民众对遗产的所有权,并且应该让他们参与到遗产规划以及信息披露过程的所有环节中。<sup>②</sup>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民众对待自然环境的一些传统做法比那些外来的专家建议更具备可持续性。

就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的权力关系来看,霍尔认为遗产的保护与当地社区内外的权力关系存在相互关联。<sup>③</sup> 在发展中国家,很多遗产如建筑、人类遗址、古城、博物馆等都处于当地社区中,地方民众已经成为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有助于增强遗产地的活力。<sup>④</sup> 在中国,遗产地社区参与程度较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被动参与状态,保护区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sup>⑤</sup>。就遗产的所有权而言,它常常受国家权力、强势话语等方面的影响,使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遗产的归属权在国家政治、权力话语、行政管理、商业利益等合力作用下也常常发生变化与变更。遗产的主体性和完整性在现代语境、权力话语、商业资本主义等的表述与被表述、阐释与被阐释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自我的他性”<sup>⑥</sup>。

① 戴伦·J. 蒂莫西·斯蒂芬·W. 博伊德,《遗产旅游》,第270—271页。

② Keelan N. Maori, "Hritage: Visitor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in C. M. Hall and S. McArthur, *Heritage Management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Visitor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Marketing*,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5-102.

③ C. M. Hall,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 Place, Pow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Values in the urban Context", in P. E. Murphy, *Quality Management in Urban Tourism*, Chichester Wiley, 1997, pp. 91-101.

④ G. Ashworth, J. E. Turnbridge, *The Tourist Historic City*,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0.

⑤ 诸葛仁等,《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农村生态环境》2000年第1期。

⑥ 流心,《自我的他性》(常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 第三节 遗产运动对村落政治的影响研究

#### 一、村落政治的人类学研究

村落研究向来是人类学家热衷的研究领域之一。关于村落研究的经典个案,稍加梳理便能找到葛学溥(1925)的“凤凰村”、杨懋春(2001)的“台头村”、费孝通(2001)的“江村”、林耀华(2000)的“义序”和“黄村”、杨庆堃(1959)的“鹭江村”、威廉·韩丁(1966)的“长弓村”(即张庄)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陈佩华(Anita Chan, 1984)等的“陈村”、黄树民(2002)的“林村”、王铭铭(1997)的“溪村”、阎云翔(2000)的“下岬村”、折晓叶(1997)的“万丰村”、张乐天(1998)的“联民村”、毛丹(2000)的“尖山下村”、于建嵘(2001)的“岳村”、吴毅(2002)的“双村”<sup>①</sup>、彭兆荣(2004)的“摆贝”,以及刘朝晖(2005)的“新江桥村”、杨方泉(2007)的“塘村”、陆益龙(2007)的“小岗村”等。其中以经典的村落民族志居多,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村落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方向,亦即,受“后现代文化”研究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权力、权威是如何以符号、仪式、象征、语言和其他的文化表现形式对村落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产生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迁也逐渐被置于全球化、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等语境中进行论述。<sup>②</sup>

人类学关于村落政治的研究大概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此前的村落研究主要涉及村落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内容,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和《禄村农田》(1943)、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等。在徐勇看来,当时的农民还处于政治之外,而只有在激荡的革命催生下,在农民与农村发生根本性改变之后,譬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7)的颁布、村民自治制度的普及,农民与村落政治才进入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sup>③</sup>

① 刘朝晖,《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②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64—367页。

③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序言,第2—3页。

一般而言,当前村落政治研究的主题涵盖了村民自治、权力结构、社会或文化运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等诸多内容。其一,部分学者对选举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指出村民自治、村民选举是村民进行自我表达的途径之一,是促使村落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譬如杨方泉(2007)笔下的“塘村”在村民自治等集体化实践之后,村落的权力结构在变迁中不断重组。又如胡荣通过个案分析,以理性选择和制度实施这一概念框架为视角探讨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及其制度实施的状况。他把与村委会选举直接相关的村民、村干部以及乡镇干部都看作理性的行动者,他们在选举过程中权衡利弊,选择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动。<sup>①</sup>因而“尽管行动者在做出策略抉择时受到他们所‘嵌入’的社会背景的制约,但在这种制约之下个体仍有相当的选择空间。这些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意或无意地促成或阻碍了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建立”<sup>②</sup>。

其二,另有一些学者关注国家政权及其权力的变化,以及它们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试图从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去说明乡村基层政治生活与外部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sup>③</sup>作者通过对“岳村”政治结构的分析指出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与扩张在摧毁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乡村社会结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国家权力在致力于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注意到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构建,结果造成国家政治生活高度一元化的格局。此外,“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努力始终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与‘强制’手段紧密相连。所谓现代化的成就往往以农民利益的牺牲为代价。这造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sup>④</sup>。从岳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带有“横暴”特征的国家权力使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出现了不对等现象,不过作者的讨论仍是限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二元

① 李德瑞:《模糊的边界与多元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政治研究的总体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② 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③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3页。

④ 董国强:《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读〈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学海》2004年第6期。



结构中。另外，吴毅也试图从川东双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去阐释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的机制与动力问题。<sup>①</sup>作者在探究乡村社会变迁的原因之时，不仅关注到诸如“国家建设”理论、“中心与边缘”理论、“现代化”理论及“国家与社会”理论等外部性原因，而且还强调了一定背景下的内外因素的互动，特别是乡村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和作用。<sup>②</sup>

其三，陆益龙等学者还关注到，外来的社会或文化运动如移民活动等也是地方村落政治产生变迁的动因之一。陆益龙以小岗村为例从嵌入性政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外来的政治力量或社会运动对农村村落内部关系的裂变以及对经济效率产生的影响。<sup>③</sup>韩俊芳也认为外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是引起观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自从建国以来，国家的政治权力逐渐渗透到乡村社会，历次政治活动，迫使村民的生活发生变迁。<sup>④</sup>土地改革，将地主的私有制转变为农民私有制，合作化运动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到完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农业社，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村民失去了生产的自由支配权，连自己的劳动力也无法支配。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观村也没有摆脱政治权力的干预，移民活动即是一个典型的实例。

此外，贺雪峰의《新乡土中国》一书对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进行了研究，指出当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转型，并与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相距甚远。譬如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村庄类型已开始分化，出现了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以及外来力量、国家权力下沉之后的村落政治的改变等。<sup>⑤</sup>由此，作者得以向读者们展现出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图景，为当下的村落研究提供了一个适时的场域。

随着村落政治文化变迁的原因日趋多元化，人类学村落政治研究的视角与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家与社会”

①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第30页。

② 项继权：《从乡村研究乡村——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③ 陆益龙：《嵌入型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④ 韩俊芳：《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⑤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的分析框架历来备受重视。一般认为,在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至少存在两种思路,第一种是从国家制度权力与意识形态等来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思路;第二种是从乡土社会的内在结构进行的自下而上的分析。实际上,两种思考的角度具有一个共相,亦即它们都表现出二元论的二分法思维方式,在它们的框架中国家与地方变成了一种对立关系,或者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简单化的、单向度的。<sup>①</sup>对此,不少学者试图探寻一种所谓的“社会型塑国家”(society-making-state)和“国家型塑社会”(state-making-society)的理论建构,建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sup>②</sup>王铭铭的“溪村”研究、周大鸣对凤凰村信仰与仪式的研究、郭于华的陕北骊村研究等都从各自的视角阐释了“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

不过,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二元的分析模式,有些学者试图在“国家”与“地方”的二元结构之外寻找“第三种力量”或“第三领域”。譬如景军在 its 著作《神堂记忆》(电子档)一书中运用社会记忆理论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重修孔庙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呈现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指出两座孔庙之间的“抗争”并不限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原因,而是由全球化引发的“新”与“旧”的矛盾、“正统”与“非正统”的较量。<sup>③</sup>又如杜赞奇以“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为概念对华北农村的乡村权力关系及其与国家力量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在作者看来,国家与地方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体系、象征规范、文化符号等共同构成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基础,并成为影响国家与地方互动的重要力量。<sup>④</sup>需要强调的是,“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是处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个媒介,一方面它不是完全被国家和农民等社会利益决定的;而另一方面,“文化网络”涵盖了众多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如国家、以前的

① 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② 李斌:《“寺”“庙”之争:民俗精神符号再造》,载《中国研究》(2005年春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③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载《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386页。

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明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清政权、商人、农民等。这个文化网络不限于表达“社会整体”(social whole)的观念或者国家与地方的简单化关系,而呈现出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动态的、多元化的关系。至今,杜氏的观点仍对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不仅将关注到“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而且也注意到在国家或政府内部,以及地方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并非铁板一块乃至“分裂”的现象。

## 二、“遗产运动”场域中的村落政治及变迁研究

如前所述,21世纪以来遗产运动的影响与冲击日渐显著,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也难以避免地受其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其一,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中,遗产运动已经表现出强烈的政治隐喻与权力表征。遗产运动的“权力”表征首先反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所架构的全球性的遗产体系,包括遗产的概念、遗产的分类、遗产的识别标准、遗产的申报规则以及保护模式等。它们都被赋予特定的“话语”,成为现代国家识别遗产、保护遗产的特殊力量。其次,遗产运动是伴随西方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的产生而兴起的,因而现行遗产体现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遗产的分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结构。此外,在后现代、后殖民的语境中,遗产运动还体现出另外一种“权力”,即所谓的“文化霸权”。按照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意思,殖民主义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具影响的政治表现和政治表达,通过非西方(指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者”自身的解释和互动来实现西方(指第一世界、发达国家)——“我者”的权力性价值<sup>①</sup>。

其二,遗产运动所挟裹的权力不仅来自联合国,而且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遗产运动既体现了联合国的话语权力,也反映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权力。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从遗产运动看到国际规则、国家利益、西方价值等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妥协。

其三,遗产运动的参与主体不止是联合国与民族国家,实际上,遗

<sup>①</sup> 彭亮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4页。



产本身既包含“大传统”的主流文化和价值,也包含“小传统”的民间文化和认知,那么以民间文化传统为载体的乡民社会、地方民众也就成为遗产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利益主体。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看,遗产既包括大小传统,也涵盖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可以说是雅俗文化的融合体,因此,从这层意思来讲,遗产不仅是人类家园的文化载体与情感依托,而且也是地方社会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的联结纽带。

综上所述,遗产运动也如“文化网络”概念一般,成为连接国际社会、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媒介。而且,我们可以从遗产运动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尤其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从此层面来看,遗产运动也可以成为考察中国的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视角。而且,本研究并不限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而是把国际组织、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置于遗产运动的特定“场域”中来审视,指出现行的世界遗产已经是一个集聚来自联合国的话语权力、国家权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等的权力综合体。同时,基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是处于动态之中的,那么本研究将运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sup>①</sup>,在对事件进行“深描”的同时,通过过程来把握事件背后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发遗产运动所挟裹的权力、资本等西方话语以及过于强势的国家权力是引起新村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发生变迁、遗产地社会“躁动”的主要动因,由此在遗产保护过程中更需要强调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机构、国家(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地方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

<sup>①</sup>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黑龙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 第二章 新村田野图景

### 第一节 武夷山的人文地理

武夷山坐落在绵延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北段,福建省西北部,东连浦城县,南接建阳市,西临光泽县,北与江西省铅山县毗邻。据载,武夷山“发脉自西南白塔山,由笔架山一带逶迤百里,踰超峰棠岭,融结是山。周围凡百二十里,东抵崇溪,北为黄龙溪,西至将村里,南至蓝原,四面皆溪壑,不与外山连属。外山则环绕拱向若议卫”<sup>①</sup>。武夷山的丹山碧水既是自然的造化,也是历史人文化育的结果。

关于“武夷山”的来历,《史记·封禅书》称,“武夷”得名于彭祖,汉武帝曾派使者在此“祀以乾鱼”<sup>②</sup>。而清史貽直则认为,“考武夷之迹,最古其所称武夷君、圣姥诸事,多荒诞不可信”。但对于武夷山的文化底蕴,清史貽直曰:“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文学以显,至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其后杨文肃、胡文定倡道于此,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此山者,而山之名遂以甲于天下。”<sup>③</sup>期间,武夷山在佛教

---

① 徐袁然辑:《万历〈武夷志略·图经〉》,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安徐氏刊本。转引自李智君:《武夷山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基于游客诗词、游记和景观图的分析》,载《闽文化与武夷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董天工辑:《武夷山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清乾隆十六年修,道光廿五年重刊本,第236页。

③ 《武夷山志·史貽直序》,第12页。



传入后不久就被唐玄宗封为“名山大川”，至五代十国，道教在武夷山臻于鼎盛，并创建道教宫观。两宋时期，杨时、游酢、朱熹等聚于武夷山讲学著述，创建书院。自此，儒、释、道汇集于武夷山，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共存。之后的武夷山，更成为“道南理窟”、中国佛教名山、古今名人游览之地。可见，武夷山遗产积淀十分深厚。

据考，最早在武夷山繁衍生息的是古越族人。他们主要散居于溪涧旁与峡谷之间，多居住在悬崖上的洞穴或临水的“干栏”式屋内，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干栏”居室文化和“船棺”悬葬现象<sup>①</sup>。在历经数次外来文化的侵入与撞击之后，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以后，大批移民迁入闽地<sup>②</sup>，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耕文化的发展，武夷山的茶文化即是农耕文化不断发展的例证。

据载，关于武夷茶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朝孙樵所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至元代，武夷茶被封为“贡茶”，“岁贡茶二十斤”，并在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创建“焙局”，史称“御茶园”，园内建有仁风门、丹发殿、清神堂、思静亭、焙芳亭、燕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通仙井、通仙亭等，设场官二员领其事，至顺三年，筑造喊山台、喊泉亭，于每年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以及县丞等一并登临喊山台，祭祀茶神，同声喊“茶发芽”，而后井水渐满。<sup>③</sup>武夷茶的“喊山”仪式由此而出，并代代相传。有诗云：“御茶园里筑高台，惊蛰鸣金礼数该。那识好风生两腋，都从著力喊山来。”<sup>④</sup>“一曲休教松枯长，悬崖侧岭展旗枪。茗柯妙理全为崇，十二真人坐大荒。”<sup>⑤</sup>需要说明的是，此一时期的茶山主要是由武夷山中的僧人、道士经营；至清初，下梅为茶市，茶山才经由江西人经营，转运河南，销往关外；其后，随着福州的通商，下梅茶市衰而赤石茶市兴，山西客商、“下府（以闽南语方言为准，指厦、漳、泉一带）、广（以广州方言为准，指广东）、潮（以潮汕方言为准，指潮州、汕头

① 顾国华、曾武英：《武夷山社区文化变迁探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内刊》1999年第10期。

② 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林剑华：《明清时期福建省内再次移民及动因探析》，《东南学术》2006年第1期。

③ 董天工辑：《武夷山志》，第577—579页。

④⑤ 周亮工：《闽茶曲》，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年，第97页。



等地)”三帮先后来武夷山置办茶园，经营茶山。<sup>①</sup>自此，武夷山与茶及外来的茶商、茶工等一同构建了独特的武夷茶文化，并成为武夷山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过，正如南宋萧子开在《建安记》中所云：“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於烟岚之中。”<sup>②</sup>武夷山虽挺拔秀美，但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山上更不宜耕种粮食，因此武夷山当地人常常会另谋他处居住、耕作。不同的耕作方式、不同的语言日渐使山民与当地人的区隔变得明显，在当地人看来，武夷山内的山民是外来的采茶工、制茶者，是不同于“我群”的“他群”。这一点从本地人的说法则可见一斑，“他们住在山里的，都是江西、浙江等地来的茶工……”

近代以来，武夷山曾是福建省革命老区，20世纪70年代末因自然生态保持完整被辟为国家自然保护区，1982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區，1987年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的世界自然保护区网。改革开放以来，武夷山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20世纪90年代，武夷山确立“旅游经济兴市”的发展目标，大大地推动了武夷山旅游文化的发展。武夷山的历史积淀，儒、释、道文化，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等，都成为武夷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符号。

1989年武夷山撤县设市，其前身崇安县，建于北宋淳化五年（994年）。<sup>③</sup>1999年12月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區、闽越王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继泰山、黄山、峨眉山之后的第四个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世界遗产保护区（如图2.1）位于北纬27°32′36″—27°55′15″、东经117°24′12″—118°02′50″，总面积为99975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63575公顷、核心次区面积36400公顷、缓冲区面积27888公顷，分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区56527公顷、九曲溪生态保护区36400公顷、自然与文化景区保护区7000公顷、闽越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年，第9—10页。

② 《太平御览》卷四七武夷山，地部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0页。

③ 王国材：《武夷山市行政建置古今变迁》，武夷山市政府网，2007年4月25日，<http://www.wuyishan.gov.cn/Articles/20070425/20070425192922.html>。

王城遗址保护区 48 公顷四个区域。<sup>①</sup> 本书侧重于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武夷山景区)范围内的调查研究。该区域位于武夷山市南部,东起崇阳溪,南至东山埔,西至星村,北至黄柏溪。<sup>②</sup> 武夷山属丹霞地貌,系红色砂砾岩低山丘陵地形,山峰平均海拔 400 米,年平均气温为 18.5℃。景区内有九曲溪和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等,共有 5 大游览区,110 个景点,游览面积 6000 公顷。总体来看,各个游览区、景点都与武夷山人交融共处于此,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景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与这里的茶文化、旅游文化、地方文化等互证互疏。

武夷山规划图

1995—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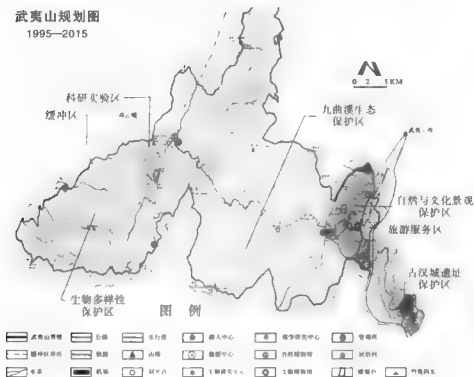


图 2.1 武夷山世界遗产申报区域(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1990 年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世界遗产公约自然·文化遗产:中国武夷山》(申报文本),1998 年。

② 参阅吴家洋、卓建武编撰:《闽北概貌》,建阳地委政研室编印,1985 年,第 270—273 页。



立,作为武夷山市政府的派出机构,管辖现今武夷山遗产地东部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保护区、中部的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以及南部的闽越王城遗址保护区。其主要职能包括:负责编制武夷山风景区规划及规划的实施、管理和监督;负责武夷山风景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与项目、人文景观、古迹文物和基础服务设施的保护、开发和管理;负责武夷山风景区的旅游活动、经营管理、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负责实行对景区内所有部门、单位和乡镇(村)涉及景区的工作和活动进行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sup>①</sup> 为了进一步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体制,景区管委会还特别下设武夷山景区世界遗产保护局,负责提出与制定有关文物保护要求及文物利用与修缮的审批管理,保持与上级文化部门的工作联系等。<sup>②</sup> 从遗产管理的角度来看,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对武夷山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较好地处理了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并已赢得游客较高的满意度。<sup>③</sup>

历史上的武夷山从不是一处纯粹自然、普通的山,而是一处有着深厚人文气息的名山大川。武夷山为新村人提供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而新村自建以来,也早已与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人文古迹融为一体。历史是一条流动的长河,在近百年的岁月里,新村历经革命洗礼、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仍一直坚守在武夷山,并对武夷山遗产的保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村曾处于武夷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内,若回溯历史,新村自1912年建置以来已近百年的历史,景区管委会则成立于1990年,不足20年。毋庸置疑,景区管委会及其前身福建省武夷山管理局(1980年成立)所开展的相关工作<sup>④</sup>,不仅规范了武夷山的旅游行为,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武夷山旅游业的发展。此外,景区内的村民也得益于武夷

① 《武夷山世界遗产保护机构》,武夷山市政府网,2007年5月28日,http://www.wuyishan.gov.cn/Articles/20070528/20070528095053750.html。

②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说明》(内部资料),2005年11月15日。

③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 with 实证》,第169—172页。

④ 1982年7月2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关于加强武夷山风景区保护管理的布告》;1986年6月1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1986〕综221号文批准《武夷山溪东旅游服务区规划》;1986年6月28日,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以〔1986〕城字295号文批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规划》;1988年2月29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以闽政〔1988〕50号文颁发《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

山的旅游开发,纷纷以多种形式参与武夷山的旅游活动,如开办家庭餐馆、茶馆,或当导游、筏工,或为游客拍照等等。

就村民而言,他们从武夷山的景观旅游中获益颇多,经济收入在逐年增长,生活质量也在日益改善;而且,他们通过一系列的旅游活动也逐渐认识到周边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重要价值,认识到他们与自然、文化遗迹之间的互为关系。从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来看,他们早已把对自然环境和文化遗迹的保护内化于日常生活中。虽然景区内众多的文化遗址、文物、寺院建筑等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遭到极大的破坏,但那种破坏主要是政治性运动等外来因素所引起的,是由那个特殊时代所带来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夷山管理局的柴薪补贴政策更是对村民的保护意识起到了一定作用。质言之,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进行“日常的守护”已经构成他们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他们会有限度地开垦茶山,自觉进行水土维护等。但是,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等问题。原本是由这些旅游活动以及外来游客带来的影响,却强加给了景区内的村民。在“他者”的眼中,村民人口的过快增长、生活垃圾的大幅增多,以及对资源的恶性开发和争夺等方面,是对景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遗迹造成破坏的主要因素与根本原因。在此语境下,当武夷山开始申报世界遗产之时,景区内村民面临搬离故土的境遇。事实上,景区内分布着多个行政村,其中以北山行政村的占地面积最大,分布最广。因而新村的政治文化变迁与武夷山景区及其景区管委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在全球性遗产运动的情境中,他们之间的互动,将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地方民众的生存发展造成最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 第二节 新村的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

### 一、新村的界说

在地理上,新村广泛分布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涵盖山地、林地、茶园等共70余平方公里的范围。该行政村曾广泛分布在景区内,“一是景区边沿从三岩前起点至山前逶迤八公里的福分公路两侧,共9个自然村;二是景区内部的10个自然村,除由桂林福分公路两侧折入



景区公路凉伞岩至水帘洞外，其余村庄均须徒步于山间峡谷小道，时而攀登石径山岭蜿蜒而上，随着峰回路转，又拾径而下，逶迤于青山幽谷之间”<sup>①</sup>。1998 年底新村因武夷山申报“世遗”进行整体搬迁，之后被安置于景区附近的居住小区（如图 2.2）。



图 2.2 新村位置示意图(Google 卫星地图)

从行政建制来看，新村自 1930 年开始被纳入行政区划，新中国成立前属崇安县赤石乡的武夷保，新中国成立初期属崇安县第二区（即星村区）的武夷乡，乡政府所在地就设在北山岩，1958 年人民公社化为北山大队，大队部设在梅林，下辖 12 个生产队；1985 年由大队改为行政村；2002 年改制后，新村又被称为“北山居委会”。

从人口来源看，新村人在武夷山已四代有余，早先的村民或因躲避战乱来武夷山开垦荒地，或为谋生来武夷山做采茶工、当制茶师傅（其中一部分人因采茶季节而流动，主要是在采春茶前后进行迁移；也有一部分人从短工转变为长工，受雇管理茶山）。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与武夷山接壤的江西、浙江等地，曾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土地改革，分得田地，并从此定居于此。新村的籍贯结构中，武夷山（崇安县）本籍人口少，而以江西、浙江、“下府、广、潮”三帮等制茶、贩茶的移

<sup>①</sup> 翁毅：《崇安县武夷乡地名志》（未刊稿），1989 年。



民后裔为主。<sup>①</sup>由此观之,新村人是指历史上因谋生或为躲避战乱等原因迁入武夷山,并以地缘、业缘为纽带形成的人群共同体。

新村人在武夷山繁衍生息已历数代,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武夷北山大队共有10个生产队,共203户,总人口696人。1959年该队有241户,968人。<sup>②</sup>1985年北山行政村辖有19个自然村,268户,1288人。1987年全村238户,1214人。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新村共306户,1274人。2002年总人口增至1500人。至2008年,全村总人口达1734人,508户,14个村民小组(如表2.1)。

表 2.1 新村 1958—2008 年间户数与人口数量的初步统计

年代(年)	户数(户)	人口数(人)
1958	203	696
1959	241	968
1985	268	1288
1987	238	1214
1990	306	1274
2002		1500
2008	508	1734

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资料整理而成。

由表2.1观之,50年间,农户数量增加了1.5倍,人口增加了1.49倍。此外,他们的居住格局也随着人口的变动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的居住格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地理形态上的分布,这与本村的历史文化、集体记忆密切相关(如水帘洞、马头岩、三姑、慧苑等)。这些自然村的名称深深地扎根于村民的心里,即便是在搬迁之后,他们仍自称是某某自然村或生产队的人。第二阶段是“嵌入”的行政区划,这一区划时常伴随国家政策与公共权力的改变而变动。这一点反映在自然村数量的增减上。第三阶段是公共权力与国家政策对村落格局影响的继续和延伸,大多数村民被安置于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紧凑而规整的居民小区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趋势。

① 与新村村民黄奕根的访谈,2008年10月。

② 《武夷北山大队1963—1972十年规划》(内部资料),武夷山市档案局提供。



## 二、新村的经济背景

长期以来,新村形成了以茶叶生产为主、以农业耕作为辅的经济结构,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包括茶叶的生产与制作、出租房屋,以及旅游业等。从新村的地理特点看,新村的林地、茶山广泛分布于武夷山内,其耕地面积极少,除南塘、旧衢两个自然村的粮食能自给自足以外,其他自然村曾经都由国家供应定销粮。“靠山吃山”,依托武夷山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新村人以茶为生,以茶叶收入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可谓“家家有茶山,户户做茶叶”。茶叶的销售收入构成了村民、村集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年村人均收入超过2500元,2002年村(居)财政收入20万元,债权25万元,债务160万元。至2007年村财政收入达3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为5100元。<sup>①</sup>如今,村民的种茶收入占到总收入的近90%,月收入突破4000元。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的农民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由于新村自身有着良好的商业基础与发展空间,外出务工的情形在这里并不多见。80年代以来,新村人开始积极投身于武夷山的旅游活动,于是,旅游收入构成他们另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旅游兴起之时,部分村民自办茶庄,开饭馆,当导游,跑运输,贩卖特色纪念品等,旅游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还拓宽了茶叶的销路。因而,一般村民的经济条件与生活水平都比较富足。黄奕献、黄奕根兄弟的人生经历及经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村村民与茶叶的渊源以及现代旅游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黄奕献、黄奕根兄弟都出生于武夷山内,其父亲早年来到武夷山当茶工,是当时有名的做茶能手。20世纪60年代黄奕献考入福州某学校,毕业后曾留在福州工作六年有余,但一方面由于山里人不习惯海边的工作与生活,另一方面则为了响应“上山下乡”的国家政策,他选择回到故乡武夷山。他在武夷山的工作经历极其丰富,至退休前他所从事的工作不下十种,包括基层农村干部、乡镇党政工作、统战工作以及政协工作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自返回武夷

<sup>①</sup> 《新村2009—2013年规划书》(内部资料),2008年10月。

山工作以来,他非常关注武夷茶的制作生产与历史传承,并出版过相关著作。对于武夷茶的传承与保护,他功不可没。

其弟黄奕根生在武夷山、长在武夷山,对武夷山的山水、茶叶感情深厚。从他这一辈开始,他们已经不再是帮人打工、种茶的茶工,而转变为本地的茶农。至80年代初期武夷山刚刚迎来改革开放,他就开始在水帘洞附近摆摊,出售土特产、茶叶等。随着游人的增多,他更是率先开办茶庄,置办茶企业。如今他的二儿子已经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他们也为自家茶叶注册了商标,其茶叶还已远销海内外。另外,在其兄的帮助与合作下,他们适时运用武夷山的文化资源与“世界遗产”的身份,从2008年开始筹建武夷山首个私人茶叶博物馆,由此不仅他家成为村里有名的茶叶大户,且其茶叶价格也比其他村民的略高一筹。<sup>①</sup>

现在的新村几乎家家拥有茶山,并被冠以“第一茶村”的头衔,茶叶是这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村民的经济形态而言,大部分家庭是以制作、出售毛茶为主,并不进行深加工;另有部分家庭则已开始茶叶生产的规模化与商品化,既种植、制作、加工,还以自家的品牌与商标进入市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外来的茶企业看中新村的地理优势与资源条件,纷纷进驻新村,于是,不少外来流动人口也随之而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村人的茶山面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代背景与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波动。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新村人的经济生活会有所变动,但不大可能会变的是,他们与茶叶的内在联系。在新村,茶山的面积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集体化时期由生产队分给祖辈,后由他们传下来的几分茶山;另一部分则是在非集体化时期由祖辈一家在武夷山内开挖而来的,这部分茶山面积更大。依据男性继嗣原则,茶山在男性后代中进行传承,并成为分家的主要财产。分家时,父母首先会为自己保留一片地段较方便的茶山,以供老年使用;其余的茶山则按儿子的个数来分,这时为了显示公平,大多数家庭会采用“抽勾”的方式来分这些茶山。村民陈瑾讲述了

① 与新村村民黄奕献、黄奕根兄弟的访谈,2008年11月1日。



他家分家的情形：

我家有兄弟四个，我是老小。当时我们兄弟四个是同时进行的分家。两个老人家首先留出了一小块茶山，然后把其余的茶山都拿出来按照“四股片”（因为茶山的分布较为分散，父母一般是按片区来统合茶山）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抽勾”。<sup>①</sup>

在新村，茶叶的生产与制作，既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维系新村人与武夷山的情感纽带。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是新村人一年当中最为繁忙、也“极不正常”的时候。“头春茶”的采摘首先要确定茶工、做茶师傅，这就需要提前在江西或武夷山的其他“乡下”进行预订，总体来看，新村村民所请的茶工和制茶师傅主要是来自江西，这种现象说明，时至今日，村民们仍与江西的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与经济联系。有一首山歌“清明过了谷雨边”唱道：

清明过了谷雨边/打起包袱走福建/想起福建真可怜/  
早晚咸菜早晚盐/有朝一日回江西，吃碗青菜赛过年<sup>②</sup>

这首山歌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江西籍茶工在武夷山（旧称崇安）采“头春茶”时的心境与情景，采茶之艰辛可见一斑。此处“福建”是江西籍茶工对制茶地崇安的指称。

另一首山歌“宁在江西觅食”同样表达了江西籍茶工的苦境：

宁在江西觅食/不往崇安采茶/三餐硬饭难吃/高山峻  
岭难爬/五十八两大秤/二分工钱难拿/欲问此是何厂/就是  
傅月生家

又有山歌“采了头春下了山”，云：

采了头春下了山/打个山歌好散班/今年几个搭得好/  
明年调掇作一班。<sup>③</sup>

①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8年10月。

② 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年，第109—110页。

③ 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13—114页。

这里的“散班”是指江西上饶等地来武夷山的茶工在茶季结束领工资后被遣散回乡,这首山歌反映了江西籍茶工常年往返于武夷山的情形。

在确定好茶工之后,村民们会及时去一年一次的“柴头会”<sup>①</sup>置办所需的采茶、制茶的用具,同时对做茶的设备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其采茶期间的顺利运转。“头春茶”的采摘期大致为半个月至20天不等,要依据天气而定。进入采摘期之前,村民大都会主动先期补充一些营养品,以应对随后的高强度工作。如前所述,元至顺三年(1332),在武夷山御茶园内置有喊山台,每年惊蛰崇安县令率县吏和差役,备牲礼到喊山台致祭。县令致祭文,祭礼毕,令差役鸣锣击鼓,同声高喊“茶发芽”。<sup>②</sup>“喊山”最初为民间祭茶神仪式,后正式成为武夷山御茶园内的一种祭祀仪式。“开山”一般定于立夏前三日之内,茶农们赶早在制茶祖师杨太白塑像前静默行祭。早餐后由专人带茶农至休茶地,分散采茶,待太阳升起、露水初收之后,带山人向采茶工们分发烟卷,表示可相互对话,开山仪式才正式结束。不过现在的仪式大都已简化。

采茶期间,男女各有分工。采摘与后勤供给以女性为主,而挑、运、制作则以男性为主。采茶期间的作息时间以茶叶的生产制作为准,为保证茶叶的品质,通宵达旦地工作是十分常见的。另外,由于“世遗”拆迁,新村与茶山的距离由此拉远,因而频繁往来于景区与新村之间的“皮卡”(运输工具)成为武夷山一道特别的风景。在吉登斯看来,时间与空间的分离是现代性所致<sup>③</sup>,依此观点看来,新村时空的分离也可以认为是现代遗产使然。不过,虽然现代遗产与遗产运动使新村搬离了原来的生存空间,但由于村民的生产时间仍与原先保持一致,因而空间上的分离并未阻断新村人与武夷山的联系。换言之,“世遗”符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新村人的“缺场”(absence),而这种时间上的“缺场”、“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的游离,又是引起新村人与遗产管理方之间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动因。

① 柴头会又称柴棍会。农历二月初六,各乡镇部分村民和外乡人自动前来武夷山市区推销产品和购置生产、生活用品,俗称“赶会”。会上销售的有大量本地和外地的水竹、藤类原货或半成品。会期2-3天。引自《武夷山市志》,第1036页。

② 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市志》,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035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8页。



如上所述,茶叶的生产、制作已经构成新村人最重要的日常生活部分,而茶叶的采摘仅仅是茶叶生产、制作的开始,后续的工作将是他们每日必修的“功课”,如茶叶的挑拣、包装等。由于现代制茶工具的引入,各种肥料的推广应用等,茶叶的采摘次数明显增多,有头春茶,二春茶,三春茶,甚至有五春茶,或冬片。而最为有趣的是,这些拣茶、包茶的工作备受女性村民的喜爱,不分老少,一般三五成群,围坐一个堆满毛茶的大木桌,边聊天边干活。这样的日子一般会持续大半年,工作场所在村内的各家不断转移。与此同时,村内的大小事情也在她们之间进行着传递,并由此形成了新村独特的公共空间。而这一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庄的政治与秩序。总而言之,也许正是源于新村人与茶叶的情缘,他们既得益于茶叶旅游的兴起,这也构成了武夷山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武夷山既承载着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彰显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还构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culture place)<sup>①</sup>。茶已经成为村民彰显其文化的符号与载体,是构建身份及其认同的文化表征,更是其生产生活方式的活态显现。换言之,他们的文化以茶为传承载体,因茶而延续,人与茶已相濡以沫,难分难舍。茶工、茶农、茶商、茶村的共存与演变,是为证。

### 三、新村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汉族村落最初是由单系亲属构成的社群组织。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有别于西方社会中的“家庭”(family),是指基于家庭之上的以“差序格局”<sup>②</sup>为特点的“小家族”。这类小家族以父系继嗣为原则,包括五代以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并被附有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复杂功能。<sup>③</sup>当家族不

① “文化空间”或称“文化场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用来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本文意指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包括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和物化的形态,以及在这一空间里践行的周期性的人类行为、观念、传统等。资料来源于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0页。

③ 同上书,第37—41页。

断发展,则形成了宗族。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一书中指出:“宗族组织,原为家族组织的伸展,宗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祠堂的伸展;家族的祠堂,原为家族的宗教;家族渐渐发展到宗族,祠堂也渐渐地扩张,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教育的机关了。”<sup>①</sup>由此观之,家族、宗族等社会组织是中国传统汉族村落的基本形态和构成单位。

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sup>②</sup>一书中开宗明义,他指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尤其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乡村社会中,宗族与村落的重叠现象非常普遍。对此,他感到疑惑不解。因为宗族与村落的“所指”并不一样,村落主要是指地理空间上的地方,而宗族是指建立于亲属关系结构和政治功能上的人群共同体或社群组织。就宗族而言,在时间上,宗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明中叶宗族庶民化之后才达至鼎盛;在地域上,宗族在江西、广东、福建和浙江等江南、华南地区较为发达,而在秦岭黄河以北则略显薄弱;在功能上,长久以来宗族都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sup>③</sup>一般来看,宗族与村落的关系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一个村落可能既由一个宗族组成,也可能由一个宗族与一些具有特殊经济角色的外来人组成;一个村落可能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宗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单位在村落中有区域界限”<sup>④</sup>。易言之,前者往往被谓之“宗族村落”或单姓村落,如人类学家笔下的凤凰村、义序、黄村等,基本上都是源自同一个祖先的宗族村落;而后者则是由多个宗族构成的复姓村。一般而言,判断“宗族”存在的依据主要在于: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共同的族产、特定的居住区域、祖先崇拜仪式和宗族观念等。<sup>⑤</sup>总之,宗族的内部关系是基于这些共同的文化表征、历史记忆而建构起来的。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村民虽是“生于斯、长于斯”,不大流动,但是村落也会发生“细胞分裂”的过程。<sup>⑥</sup>换言之,由于人口的增长、资源的有限竞争等原因,单个继嗣群体不得不进行扩展或分裂,

①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6页。

②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③ 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④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第3页。

⑤ 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第4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70页。



开辟出新的村落。不过,地理空间的区隔并未阻断血缘上的联系,甚至很多移民社会继续沿袭原来的地名,由此进行着空间和地域文化的再生产。基于上述的分析,中国传统的汉族村落与宗族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自明清推行“宗法制度庶民化”以来,宗族村落在乡村社会广泛延伸,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乡村仍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宗族组织,如修族谱、新建或修缮祠堂,并能按图索骥追溯到共同的开基祖先,有共同的族产,奉行同一的族规等。不过,这仅仅代表着一种村落类型。另外一种村落类型并不具备发达的宗族组织,没有共同的血缘关系、族产、祠堂、族规等,相比较而言,该类型的村落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构成的地缘性人群共同体。依此来看,虽然宋代以来福建的家族制度较为发达,但新村的情况显然不属于中国东南汉人社会中的宗族村落,而更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表征。

新村的人口结构非常复杂,并表现出方言多元、文化多样的特征。其一,新村村民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的后代,他们操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有着不同于本地的风俗习惯(如从江西请“四将军”来新村做法事等)。其二,第二代及其后的新村村民在适应武夷山的人文生态与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也经历了一个“在地化”的过程,譬如那些祖籍江西但出生在本地的村民大多能讲闽南语、江西话、本地话或江西话与本地话,其婚宴酒席上也会有--道与武夷山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公菜”等。相传,“文公菜”系朱熹所创,而朱熹又是武夷山理学文化的集大成者。简单而言,新村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复杂而松散的特点,自然村内部以家庭为生产与经济单位,各个自然村之间的联系以生产为纽带,个体、家庭与自然村之间因经济活动与生产劳作而彼此联系。由于来源不一,其信仰和崇拜的对象则也有所区别。此外,武夷山内的儒、释、道以及理学等共存于此却又“各司其职”,因而不同的自然村大多以其地域内的寺庙或道观所供奉的神灵为信仰对象。

一般而言,传统的汉族村落大多运行两套并行不悖的政治体系:一是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民间非正式权威,表现为族长、寨老等民间权威,以及族规、乡规民约等习惯法对村民非强制性约束。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乡土社会的非正式权威属于“同意权力”与“教化权力”的范





畴,前者的基础是社会契约<sup>①</sup>,而后者则指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力量。如上所言,新村是一个结构松散、文化多元的复姓村,其宗族组织并不发达。二是以村两委为载体的正式权威,包括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兵营、村妇联、村共青团及村民小组等代表的国家公共权力(如表2.2),以及宪法、地方法规等对村民强制性约束。显然,正式权威具有“横暴权力”的特征。<sup>②</sup>从我国的行政体系来看,村党支部是国家力量在乡村的延伸,是乡村公共权力的核心,对乡村事务具有决定性的权力,每届任期为3年,可以连任;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委会组织法》第2条)。我国的传统农业伦理社会大抵都是以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为共同的利益代表来进行乡村管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村民小组虽是由自然村落组成的社区组织,但它已经成为乡村政治结构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乡村社会的最普遍的集体经济组织<sup>③</sup>。第六章将从外嫁女与村民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来分析村民小组在村落政治结构中的作用与地位。

表 2.2 新村干部的分工与岗位职责

职务	职责
党支部书记	党务全面工作
村委会主任	村务全面工作
村支部副书记	办公文书、民兵预备役、林政
宣传委员	计生协会、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
经济作物管理员	饮食管理
文化协管员	物业管理
农民技术员	农业技术的宣传与普及
报账员、妇女主任	日常工作
计生管理员	计划生育管理

资料来源:根据《新村村干部分工一览表》整理而成。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60—64页。

② 同上。

③ 于建嵘:《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69页。



新村的党支部自1954年7月创建以来,虽历经人民公社化时期、大集体时代、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的变化,但其作为一个独立建制单位的正式组织的性质从未改变。新村现有党员50名,其中预备党员2名,现任党支部是2009年8月进行换届选举的。根据党章规定,村党支部委员会要由全体党员选举并经所在乡镇党委会批准,由乡镇党委从当选委员中确定村支书人选。由于村支书人选的认定来自上级正式权力机构,因而村支书的权威则具有了明显的体制性权力的意义。现任的村支书是范德西,他于1998年“世遗”拆迁前期上任为代理村长,由于在拆迁工作中贡献突出,不久后正式转为村长。从1998年至2006年,他所完成的主要工作包括:进行“世遗”搬迁,投资200余万修建水泥道路,引资、投资共130万元修建新村小学教学楼,投资80万元新建村部大楼,完成小区绿化,举办茶王赛,引导村民走茶叶产业化道路等。<sup>①</sup>2006年至今他一直任村支书。村民对他的看法是贬多于褒,相关分析详见第四、五章。

新村在1983年8月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时,由原来的北山生产大队变为新村村民委员会。现在的村委会已是第4届。第1任村主任从1983年2月一直工作到1998年2月,主管全村的农业工作、治安工作等。至199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通过并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sup>②</sup>从形式上来看,新村的第3届村委会基本实现了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而在选举的过程及舞台背后则有着特殊的话语逻辑与权力关系,具体内容详见第六章。

由第3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来看,村民表现出积极的参与热情。有村民说,他们以前对谁当村长、村支书并不关心,反正都一样,主要还是靠自己单干;但现在不同了,国家下发了很多很好的政策,如果村领导能力差的话就无法替老百姓说话。所以在第3届村委会选举中,新村成为了一个展示各方力量的竞技舞台。由于力量较为悬殊,村民推选的民意代表并未能上台,但是村民参与村落政治的热情大为提

<sup>①</sup> 《新村历届村主干政绩榜》(内部资料)。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第11条。

高,而且这部分村民正在形成村落政治结构中的新力量,并对传统的权力结构产生冲击。

## 小结 武夷山遗产的传承主体

总体而言,新村的政治结构显然因其特殊的社会结构而有异于传统的汉族村落社会。其一,新村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宗族力量相对薄弱。虽然陈姓是新村的大姓,人数较多,并在此繁衍生息已历四代,不过他们并未在此修建共同的祠堂,或置办族产、族田等。其二,由于全村没有共同的血缘关系,新村人更多地是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其三,长期以来,新村的粮食生产常常难以为继,即使是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他们也从未放弃过对茶叶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新村的农耕文化及其农业伦理在早期就已潜伏着某种变化的因子。进入改革开放以后,茶叶生产的规模化,茶叶的商品化已成趋势,并不断对新村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诸多的原因,所以说新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村落,也不是具有根深蒂固的农业伦理的乡村社会。换言之,新村是一个结构特殊、文化多元的复姓村落,其政治组织更多依托于村两委以及国家的公共权力,而民间权威、地方精英的力量则相对弱小。

从某种意义上看,新村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汉人村落社会中的另一种类型,而且也由于其与世界遗产的特殊关联,因此,基于新村的个案分析,探讨世界遗产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以及遗产与人类的关联等方面的研究则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与现实意义。正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武夷山遗产与新村之间的联系甚为紧密。一是自然环境上的相互依存。新村广泛分布在武夷山境内,并以地域上的叠加与同一性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地缘基础和文化认同,由此武夷山与新村也成为他们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地方”(place),武夷山于新村及其村民而言,更是一个需要他们共同经营与构建的“家园”(homestead)。二是新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武夷山遗产的传承和延续有着唇齿相依的关联。不可否认,新村村民既是武夷山茶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也是武夷山宗教文化的实践主体,更是武夷山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生得以传承至今的主体。可以说,武夷山的自然环境、历史遗迹、传统



文化及其与新村人一同构成了武夷山遗产，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是对武夷山遗产的整体性和真实性的破坏。

然而，1998年由于武夷山市申报“世遗”工作的需要，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决定，所有居住在景区内的新村村民必须整体拆迁，包括9个自然村，都要搬迁安置到景区外的两个安置小区内。<sup>①</sup>一年以后新村基本完成整体搬迁，他们的离去成就了“世界遗产”，从这层意思来看，新村也由此被纳入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之中，成为遗产运动中一个被“实践”的“地方”。由于遗产运动及其挟裹的权力、现代性等在近30年对中国乡土社会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影响，那么后文将以地方社会的“申遗运动”为切入点，把村落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置于全球性的遗产运动的场景中进行考察，通过动态地展示遗产运动与村落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来探讨地方社会发生变迁的原因及可能的应对途径等。

---

<sup>①</sup> 《新村规划小区简介》（内部资料），武夷山市武夷镇资料室提供，2008年10月。

### 第三章 “世遗”情境中的遗产申报 与村落拆迁

时下的“申遗”热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与推行下，由中央以政策的方式传递到最基层的地方政府<sup>①</sup>，并进而对地方社会乃至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本章以武夷山的“申遗运动”与新村的拆迁为研究个案，试图说明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申遗”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事件，而且已成为当今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那么，对“申遗”现象及其背后的话语流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遗产运动所具有的政治内涵与时代意义。

其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构架的遗产体系正是在遗产申报、评估、保护等方面对各个缔约国的遗产政策与理念产生影响，并由此建构出具有同一价值、同一模式的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而这种均质化的遗产保护模式显然不具有普适性。

其三，无论遗产是以“物”的形态或是精神的层面存在，都会涉及归属权的问题，而遗产的归属性与权力之间的博弈则直接影响着遗产地村落的去留。其四，遗产地村落的拆迁是遗产运动及其所挟裹的权力对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社会在遗产运动中面临“失语”(mute)的情形。

---

<sup>①</sup> 李春霞：《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 第一节 “申遗”现象与新村的拆迁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遗产申报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方面,“申遗在许多地方成了一项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政治任务”<sup>①</sup>;另一方面,“申遗”更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及旅游效益的推动下演变为“申报运动”或“景区改造运动”,不同规模或形式的建设、改造在各个遗产申报区内铺天盖地地进行着。由于遗产申报与景区改造都涉及遗产地内的民众,那么为了应对不断增多的人口以及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诸多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各种办法对遗产申报区内的民众进行搬迁,搬迁的方式大致包括:“集中搬迁,整体安置”、“统一规划,分类拆迁”、“分期分批逐步外迁”、“经营活动外迁”以及“行政机构外迁”等模式<sup>②</sup>。有学者通过对武夷山、武陵源、九寨沟、井冈山、庐山等风景区的调查研究,指出:武夷山风景区采取逐步外迁、集中建设旅游小城镇的方式,在 1998 年和 2003 年共投入 3 亿多元,外迁居民 1200 户;武陵源风景区则采用分期分批搬迁或拆迁的形式,于 2001 年 10 月开始对核心景区内的天子山、袁家界等地进行搬迁或拆迁;而九寨沟景区内大多数是原住藏民,出于实际考虑,当地政府采取了原住民不外迁,但所有经营活动必须外迁的政策;井冈山、庐山等风景区将在景区外围规划建设新型的行政旅游镇,拟将核心景区内的管理机构全部迁出,同时也带动相关服务人员的外迁,以减少核心景区的常住人口。<sup>③</sup>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景区遗产地内的民众纷纷搬离故土。据初步统计,1998 年至 2003 年期间武夷山景区共外迁 5300 余人,2001 年至 2002 年武陵源景区共外迁 1162 人,嵩山于 2003 年外迁居民 384 户,五台山在 2006 年外迁居民 129 户,2004 年至 2008 年中山陵外迁居民 2000 余户,2007 年至 2008 年南岳衡山共有 90 户居民外迁。<sup>④</sup>

从上述遗产地外迁的模式与规模来看,遗产地民众的外迁人数逐

①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第 30—31 页。

②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第 103 页。

③ 王凤武、张文:《核心景区居民外迁与小城镇建设》,《城乡建设》2004 年第 9 期。

④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第 103 页。

渐增多,规模不断扩大,但在实际搬迁过程中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认识上的偏差问题。部分官员、规划者等认为核心景区应采取“一刀切”,搬迁核心景区的所有住户,使之成为“无人区”。从遗产管理方来看,外迁景区民众的做法可以简化其管理工作,为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一个较为单一的环境;但是,从遗产与人类的关系来看,遗产地内的村落大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深厚的文化积淀,他们与遗产地的生态环境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保护者,他们与遗产本身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遗产体系。其二,景区规划、民众搬迁工作缺乏统一性,缺乏监督。部分景区的规划通常难以一以贯之,搬迁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并出现滥用强制权力的现象,从而导致民众不满。其三,外迁民众安置用地和搬迁资金缺乏保障。其四,外迁民众的就业安置问题<sup>①</sup>。部分景区对外迁民众的住房安置、补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对拆迁户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做得不够。同时,由于“世遗”拆迁改变了地方民众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外迁民众难以从遗产旅游中获得收益,所以“世遗”拆迁的遗留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政府与地方民众的矛盾。

具体到武夷山,1993年武夷山市政府首次确定申报世界遗产,之后,历经数年,投入巨资,动迁数千人。特别是从1998年8月开始,武夷山市高呼“举全市之力,作世纪之搏”,对999.75平方公里的世界遗产申报区展开全面整治建设。依据世界遗产的申报标准,建设的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挖掘、整理遗产资源的价值;二是规范、加强对遗产资源的保护与管理的水平。基于对申报区域内及周边环境的整治,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核心区域居民的搬迁、有碍观瞻构筑物拆除、各种线网落地的铺设、申报区域内的绿化、各种展馆的兴建与重布<sup>②</sup>,武夷山遗产在这场整治建设的运动中得以重组、重构或“发明”。毋庸置疑,武夷山的“申遗”对于武夷山、福建省、中国乃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其经过与内容大致如下:

从1998年8月中旬至1999年3月底,武夷山政府总投资1.18亿元,拆迁3个乡镇、2个农场范围内的7个行

① 王凤武、张文:《核心景区居民外迁与小城镇建设》,第42-43页。

② 张健光:《Hello,武夷山!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艰难历程》,《走向世界的武夷山》(内刊)2001年版,第247页。



政村的 404 户 2000 余名村民的私人建筑和 23 个单位的公用建筑,共 14 万平方米,区外新建安置房 16 万平方米;完成 2000 多公里的电力、广电、通讯线下地;铺种绿地 30 多万平方米;新建 15 公里的环景公路,168 公里的旅游公路得到有力整治;诸多文化遗迹得到整修、保护,并新建、重修了 7 个展馆,旅游景点的基础服务设施和环境监测站建成,全面完成整治建设任务,世界遗产申报区内焕然一新。1999 年 3 月底经过“世遗”专家的审核与评估,武夷山于同年 12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sup>①</sup>

“申遗”及其相伴而行的整治建设并非武夷山所独创,而是每个遗产区域在获取“世界遗产”身份之前必须完成的工作,因此,“申遗”已经成为当今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申遗”现象的普遍性至少呈现出三方面的特质:一是(民族)国家被确认为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的合法主体,而地方政府则是“申遗”的主推手,并成为遗产保护的“事实”主体;二是“申遗”的成本日渐攀高,但“申遗”的地方却日益增多,“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地区尤其重视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三是“申遗”及潜藏其后的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开发商的“合力”对遗产区域的地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冲击也日趋显现。可见,“申遗”不仅成为一种运动型的“嵌入性政治”<sup>②</sup>,而且还是权力隐喻下的文化资本在世界遗产“场”中进行的实践。

按照世界遗产的要求,申报过程主要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列入国家的“申遗”预备清单,报联合国总部备案;第二步是编写文本、摄制幻灯片、录像等申报材料,由国务院下文,送到联合国总部,取得申报权;第三步是整治建设,所有管理达到规范化;第四步是迎接由世界保护联盟和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两个组织的检查;第五步是验收之后,配合中国派驻联合国办事处跟踪联系两个世界组织,直到新一届世遗委员会大会的召开。就武夷山的“申遗”来看,其“申遗”实践在进入联合国这一特定场域之后就成了一项国家行为,一项“为国争光、为

<sup>①</sup>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 2004 年版,附录,大事年表,1998 年 8 月 28 日词条。

<sup>②</sup> 陆益龙:《嵌入型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民族增彩”的政治任务。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展了诸多工作,一方面,地方政府积极组建“世遗”工作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对武夷山境内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并在此基础上编写申报文本;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对申报区域进行整治建设,其中拆迁工作就耗费数千万元的资金。

市政府对搬迁非常重视,由各级政府组成了若干专门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市里政府官员一个,镇里官员一个,村干部一个,村民小组长组成一个工作小组对一个村民小组做思想工作。同时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总体来说,是从上到下,从外到里,层层突破。先是对村两委做工作,接着是号召村里的党员,村民小组长,然后到村民。<sup>①</sup>

由上观之,武夷山的“申遗”所涉及范围之广,投入的金额之大,影响之深远,都是难以估量的。以上“业绩”足以为据。由此,遗产区域内的民众便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申遗运动”中“遭遇”拆迁以及“世遗”遗留问题带来的震荡与变迁。

对于遗产申报区域内的村民们来说,他们对“世界遗产”及其申报有着另一番体认和感知。2000年6月新村被武夷山市委、市政府授予“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工作特别贡献奖”,众所周知,其特别的贡献正是在于新村的整体拆迁。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新村的“离去”成就了武夷山的“世界遗产”身份。具体来讲,新村人关于世界遗产的记忆始于1998年。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世界遗产”,虽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还未完全明白武夷山与世界遗产的关系;也是在这一年里他们为世界遗产而“舍小家、为大家”,最终搬离故上,理由则是武夷山并不仅仅属于“他们”,而是归属于中国和世界,武夷山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共有共享的“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

总之,对于新村人而言,1998年是无比寻常的一年。“世遗拆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村民肖晓雨说。他们于1998年9月接到市政府与景区管委会发出的通知,并要求他们在同年11月30日前必须全部搬

<sup>①</sup>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世界遗产管理”课题组:《遗产管理与社会变迁:对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内部资料),2006年,第4页。



出景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拆迁的,给予一定的奖励;而不能按期搬迁的则进行强制拆迁(详见附录3)。

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在1998年11月31日前将房屋自行拆除完毕,按所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20元;1998年12月31日前自行拆除完毕的每平方米奖励10元。

为促进各村民小组早日完成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全组完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按各组完成时间顺序选择安置地块。

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与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的各组前两名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5万。<sup>①</sup>

新村村民的拆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旧房的拆除。立足于武夷山的地理优势,新村人所建的房屋面积都较大,一般都是独门独院,第一层用来做茶,其他层则用来居住。而此次“申遗”拆迁的范围较广,共涉及北山行政村内的7个自然村,190户村民的宅基地。由于拆迁来得较为突然,有些村民的房屋还刚建不足两年,因而这一阶段的拆房遇到了较大的阻力。第二阶段,他们在拆房以后,或在景区附近租房住,或借宿亲戚家,或在安置区外搭棚而住,与此同时,他们也马不停蹄地在政府修建的毛坯房上扩建或装修。肖晓雨家的旧房修建于1996年,对于拆迁,她的经历与感受在新村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刚接到拆迁通告时,我们大部分人根本不愿意搬,尤其那些刚建房不久的人更是不想搬,但政府是为了申报世界遗产,为了开发旅游线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才来要求我们搬迁的。所以,虽然很舍不得,但政府说可“以面积换面积”、“以本换本”,这样,在政府(指“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的强硬措施与思想动员之下,有些村干部、党员以及家里茶山面积较小的村民就最先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然后,没

<sup>①</sup> 《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十项优惠政策》(内部资料),1998年10月。

办法大家只好跟着一个一个地都签了。<sup>①</sup>

她对“世遗”拆迁的大费周折与残酷现实,感到既无奈又惆怅。

原来我家的房子很大,独立院门的,才刚建了两年,我们实在是不忍心拆啊。说真的,梅岭小组就我和另外两户坚持到最后才搬迁,原因很简单,补偿款太少,亏得最惨。可是后来,指挥部领导做我们的工作,说其他人都迁了,如果我们再不迁,到时候就没有地块安排给我们,第二年就会没有地方做茶。虽然我们对协议书上写的条款都不同意,但考虑到这一点,没办法我们就签了。签完字后就开始搬。<sup>②</sup>

“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正是通过运用软硬兼施、恩威并重等非正式手段来分化、瓦解村民,最终达成拆迁的目标。在孙立平和郭于华看来,这种权力技术是发生在国家权力资源弱化背景下国家意志在农村基本上仍然能够得到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③</sup>而吴毅则对此看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非正式手段的运用会削弱国家权威,也会使民间对抗政府的做法具有扩散性。<sup>④</sup>我倾向于后者的看法,非正式手段仅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民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权威。在新村的搬迁过程中,“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与村民之间出现了很多问题,“那时局面很混乱”。就梅岭小组的村民而言,他们对“世遗”拆迁的政策存有不同的看法。就房屋面积的测定而言,村民认为他们的房屋以前都有独立院门,那么庭院面积以及楼层面积都应算入补偿范围,其实,这里涉及农村“黑土地”的问题。一般而言,“黑土地”是指计税面积之外的土地,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土地改革,之后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全国的农村。<sup>⑤</sup>事实上,地方政府与村民都清楚“黑土地”的存在,也会在表面上维系那些耕地统计数字,但是临近征地拆迁之时,“黑土地”的面积则成为双方

①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的访谈,2008年9月22日。

② 同上。

③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④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第237页。

⑤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65页。



争论的焦点。新村人据理力争要求重新丈量房屋土地面积,按照实际面积来补偿,但政府则坚持以村民上报的计税面积为准,这一点反映在《世遗指挥部关于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1998年10月26日)中,亦即,“房屋拆迁补偿以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面积、层数、结构为依据”。为此,村民感到政府不体恤民情,是在与民争利。此外,由于拆迁补偿政策“拆一补一”、“以本换本”与实际操作有所出入,“村民需向政府花300块每平方买多出来的地块,因而就引起我们村民的反感”<sup>①</sup>。这也是村里人诟病最多的一个方面。

不过,当时在“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的思想动员下,一部分村民逐渐认识到他们的生产生活有可能会对武夷山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而武夷山为了达到申报“世界遗产”的标准则必须让他们进行搬迁。“毕竟,世界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都要进行保护”。具有这种“思想觉悟”的村民虽不太多,但已经在村里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不过,他们也强调,“我们新村村民是景区的主人,对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管委会应与我们村民一起保护遗产”<sup>②</sup>。朱宣城是新村的宣传干部,一方面他是以村干的身份示人,既要努力保持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传达并落实政府政策,也要积极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也是新村的一分子,是这里的茶农,于是他在协助指挥部对其他村民进行思想动员的同时,也代表其他村民强调他们的主人身份。而有村民则认为,景区内村民的生产生活未必一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事实上,保护遗产的关键不在于拆迁,而是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说,1998年以前的某些政府决策反倒对武夷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如1990年至1992年‘万亩茶山’政策的出台使大量外来者进入景区开挖茶山,由此加剧了武夷山的生态压力”<sup>③</sup>。

虽然村民关于拆迁与污染之间的联系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但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其结果都是要从景区搬出。总的说来,“世遗”拆迁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景区内南源岭行政村内的62户村民在12天之内进行了搬迁,新村村民从1998年9月底陆陆续续往外搬迁,10月

① 与新村党支部副书记郁胜利的访谈,2008年9月28日。

② 与新村村民朱宣城的访谈,2008年10月3日。

③ 与新村村民梁片林的访谈,2008年9月26日。

初开始进行旧房拆除,前后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如图 3.1)。有些村民说他们不敢回忆当时的情景,看着那些完好无损的房屋变为残垣断壁,最后成为一片废墟,实在令人感伤!有些妇女也会全然不顾地发泄真情,一边守在自己家的房屋旁不忍离去,一边喃喃自语,任凭泪水流淌。她们在与我的交谈中,都一次次地重复着一个问题:保护世界遗产为何一定要让他们搬走,为什么非要让他们做出牺牲?十年后一位老人对我谈起拆迁时的情景,他神情凝重地说道:“对于拆迁,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恨与无奈。”<sup>①</sup>



图 3.1 “申遗”拆迁现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供图)

在此,我们无意去还原或重现当时的拆迁场景,而是侧重于关注不同群体对“世遗”拆迁的理解与看法,并以此去考察遗产运动背景中的世界遗产与地方民众的关联。就武夷山的“申遗”工程来看,专家学者、基层政府与地方民众对“世遗”拆迁持有各自的看法与理解。

关于“世遗”拆迁,学界大致有两种看法。其一,部分规划者、设计专家从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角度来支持拆迁的做法。显然,这是对遗产概念及遗产保护原则的误读。虽然有部分文化人类学学者试图用生态学概念来阐释人文现象,但“原生态”毕竟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其用来解释人类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仍具有相当的模糊性。<sup>②</sup>而且,原初性的自然生态并不等同于原初意义上的文化生态,因为“原初性”也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特别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场景中,完整意义上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周宗新的访谈,2008年10月。

<sup>②</sup> 金少萍:《“中西部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战线》2004年第6期。



的“原生态”文化已然不可能存在。在刘晓春看来，“原生态”更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符号，是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媒体及商业资本等“合力”制造出来的神话。<sup>①</sup>从这方面来看，“原生态”的理念所规划与设计的遗产区域将会是一个相对单一的自然环境，所保护的也只是那些静态的文化遗迹、遗址等。然而，文化遗产并非一成不变，她承载着历史和过去，所以我们既要强调文化遗产的“历史态”，也要关注遗产的自我存续，还要强调遗产的完整性，对遗产与其所处的地方以及地方文化持有者进行整体性保护。其二，部分学者通过考察文化遗产与家园生态的关系，认为拆迁行为势必会割裂文化遗产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地方民众之间的情感纽带，而遗产保护所要强调的恰恰是人文生态、地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因此要重视“文化地图”、“家园生态”以保护遗产的真实性与整体性，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在世界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国家是根本性的表述主体，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所确定与认可，是“合法”的遗产主体；而国家则以政策、法规等形式再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遗产理念与话语传递至最基层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则在“世遗”规则以及国家政策、法规的双重框架下对遗产区域进行具体的建设、规划、保护与管理，包括对申报区域内的村落进行整体拆迁、对环境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建设等。一般认为，地方政府所秉承的是以遗产为本（相对于“以人为本”来说）的理念，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排除人为因素的破坏，投入巨资对遗产区域内的村落以及其他人群进行拆迁，或者对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加强管理，力图遗产营造一个较为纯粹的环境。殊不知，这种保护与管理的模式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世界遗产的两难处境。其一，他们对文化遗产的管理、规划与开发大多是按照设计者的主观意图确定的，其中不乏不实际的想当然的成分；其二，在文化遗产管理中，他们又难以贯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精神，从而割裂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地方民众的生活。<sup>②</sup>最为重要的是，现行的遗产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民众的生存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并

① 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刍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促使地方民众对遗产保护的认知发生转变。一言以蔽之,在遗产管理方看来,拆迁既是为申报,也便于今后的管理,还有利于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建设的加速,城市拆迁问题愈演愈烈,“钉子户”问题、被拆户自焚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等等已经频频见诸报端,成为当今社会一大热点问题。部分学者已经对城市拆迁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有学者认为城市拆迁是政策缺陷所致,比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存在违宪或不合理的因素;也有人认为城市拆迁问题是“公共利益”下的“合谋”,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双赢或者说内部交易导致了暴力拆迁乃至“被拆户自焚”等拆迁悲剧的发生。而在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看来,拆迁许可来得过于容易,拆迁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的缺失才是导致拆迁悲剧的根源所在。这一点反映在“许多地方的被拆迁户直到政府贴出限期搬迁通知才知道自己的房子要拆”。此外,由于拆迁决策的不透明性,使得拆迁补偿的公正性受到严重质疑,并使得强制拆迁与暴力拆迁成为可能,因而亟须从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和落实公正补偿原则。而要使公正补偿原则得到落实则需让民众参与拆迁决策的过程,对拆迁方案和补偿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其次,还需构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使争议双方通过中立估算或公正司法的方式来解决。<sup>①</sup>

就“世遗”拆迁而言,它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拆迁。前者涉及世界遗产的申报,是与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遗产保护紧密相关的,因而在拆迁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所谓的“钉子户”或者拆迁悲剧,拆迁的进展还较为顺利。两者的共同点则在于,不论“世遗”拆迁,还是城市拆迁,都是一种征用民众财产的行为,而“世遗”拆迁是征用了村集体的财产与资源,其后的资源开发也是在占用村集体的资源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与开发商之间的“合谋”是力主拆迁的主要因素,而他们与村民之间的占用与补偿的关系也成为日后冲突的关键动因。

对地方民众而言,他们并不完全知晓遗产的内涵,更不明白为何要因世界遗产而搬离故土。由于没来得及把一些问题考虑清楚,在接到拆迁命令之初,大部分村民表现为不配合、不理睬(如表 3.1);直到

<sup>①</sup> 张千帆:《〈拆迁条例〉不是悲剧根源》,载郭光东编选,《2010 中国时评年选》,花城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 页。



“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进驻村里,通过思想动员,部分党员、村干部带头签字等方式,大部分村民才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终于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拆”的工作。<sup>①</sup>

表 3.1 村民外迁意愿调查分析表

	原先住景区的人数	是(愿意)	否(不愿意)	无所谓
村民(70)	63	16	47	0
导游(38)	3	2	1	0
景区员工(23)	7	3	2	2
个体经营者(17)	11	5	5	1
酒店员工(13)	5	3	2	0
普通市民(27)	17	12	5	0
合计(210)	106	41	62	3

李国林壁属等:《武夷山封闭式管理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旅游学刊》2006年第7期,第34页。

关于拆迁之后的遗产保护情况,部分村民认为他们的拆迁确实减少了生活污染,保护区内的环境变得比以前更好;而另一些则坦言生活污染看似减少,但事实上景区内的汽车尾气污染、生产污染反而增多。这是因为,村民虽已搬离景区,但他们的茶山、林地还在景区内,所以长距离生产势必会增加做茶工人、运输工具等,而这又会在无形中产生更多的工业污染。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拆迁是为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言辞并不那么贴近地方社会,这种以拆迁来换取保护的方式值得商榷。从这方面来看,这种“拆字当头”的景区遗产保护理念并不符合“地方性知识”,因而亟须调整。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民众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但其“失语”的状况则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他们处于遗产运动之中,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处于一场以强势话语与行政权力为特征的全球性的遗产运动当中。从遗产政治学的视角来看,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权力上处于弱势,而官方、土地规划者、景区设计者、土地开发者、专家等等却拥有

<sup>①</sup>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



特定权力,并且足以决定一个地方及其人群的去留。<sup>①</sup>换言之,村民并不是没有话语权,而是其有限的“声音”往往被湮没于国家权力、强势话语以及全球性的遗产体系之中。这一现象同样出现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正如苏东海针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出现的问题所谈到的:“专家和地方政府是主导力量,村民是被领导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不得不说,事实上外来力量成了村寨文化的代理人,村民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sup>②</sup>就武夷山风景区的规划与开发而言,制订规划的政府、专家以及企业等更侧重于保护纯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的原因在于,为了遗产旅游的开发,“为了打造自然景观,特别是建立国家公园”<sup>③</sup>,通常都会采用拆迁安置遗产地民众的做法;另一方面,统一的遗产管理模式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发旅游,拉动全市经济。因此,从武夷山的“申遗运动”来看,新村人自始至终都在“沉默不语”,或者说处于被“他者”表述的情状中,不过,从地方社会来看,他们正在以“合法的抗争”、“集体抗争”或者说“文化抗争”的形式来进行自我表述,这些来自“地方的声音”正在形成一股时代的“洪流”,并日渐影响着当前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就村级组织而言,由于他们是国家力量在基层社会的延伸,其功能主要在于服务村民,而不具有行政权力。基于此,村干部在“世遗”拆迁中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他们一方面要协助“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的工作,对村民进行思想动员;另一方面,小部分村干部首先响应政府的政策与号召带头签字,并得到了相应的奖励。<sup>④</sup>不过,他们的工作受到了村民们的普遍质疑。自此以后,村民与这些个村干部的关系日益受到“世遗”拆迁余波的冲击。此外,从后来的情况来看,由于较早签字的村干部或党员得到了丰厚的补偿款和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新村原有的结构状态,对村里的人际关系、权力关系等方面造成了直接的影响。

① Mary Hufford,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68.

②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③ 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遗产旅游》,第131页。

④ 与新村党支部副书记邵胜利的访谈,2008年9月28日。



## 第二节 “暗流”涌动：“挖路”事件分析

随着新村的顺利拆迁、“世遗”整治建设工程的完工、世界遗产专家的审评通过,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12月3日武夷山市召开了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暨建市10周年庆祝大会。庆祝大会盛况空前,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纷纷前来参会,另有数十家新闻媒体和上百名记者对此盛会进行了采访报道。庆祝大会后,武夷山市还举行了盛大的踩街活动。<sup>①</sup>从武夷山“申遗”成功的庆典仪式来看,其一,武夷山遗产已经由地方性的遗产演变为“公共遗产”,成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世界遗产”,在此过程中,遗产与其所依存的地方社会之间的互为关系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换言之,在“申遗运动”、“景区改造运动”对世界遗产所采取的“解构式保护”<sup>②</sup>中,世界遗产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逐渐被重构并呈现出强烈的政治隐喻。尤其是在行政权力的影响下,世界遗产越来越成为政府业绩和经济创收的资源,而地方政府也率先地成了世界遗产的保护主体、管理主体以及受益主体等。其二,遗产地社会的地方民众逐渐游离于世界遗产之外,他们仅仅是庆祝仪式中的“看客”或“边缘群体”。从这层意思看来,遗产的权属正在经历改变,而这种变动也对遗产地村落新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如上所述,新村在“世界遗产”及“为国争光”的感召下进行了整体搬迁,90年代末他们搬离了故土,21世纪之初他们新的安置区内开始重建“家园”。总体而言,“世遗”拆迁给新村人带来几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新村最为外显的变化在于其村落空间的改变,由散居于景区内变为被统一安置于景区外,这种“内—外”的变化预示了新村人身份的变迁,其与遗产的关系也在“他者”的表述中发生改变。其二,另一外显的变化在于其村落名称由曾经的“新村”转变为“北山茶村”,这反映了地方政府以遗产旅游为名所采取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村村民与茶叶及武夷山的联系。其三,“世遗”拆迁改变了村民原

<sup>①</sup> 《武夷山年鉴(1994—2000)》,武夷山市政府网,1999年12月3日, <http://www.wuyishan.gov.cn/Articles/20080528/20080528160906125.html>。

<sup>②</sup> 刘魁立、施爱东:《刘魁立先生访谈录》,《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有的生活秩序,加大了他们的生活开支,而旅游收入明显减少。其四,“世遗”拆迁给新村人与遗产管理方的关系带来了最为强劲的冲击,同时,“世遗”拆迁的诸多遗留问题也使村落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结构变得更为复杂。

即便“世遗”拆迁给新村人带来了诸多变化,但新村人与过去的联系并未由此中断,他们曾经的生产方式仍在延续,他们与武夷山内的茶山也仍然保持着情感和现实上的密切联系。首先,新村人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由于搬迁而完全改变,茶叶生产仍是他们最为主要的生计方式与经济来源;其次,景区内的茶山大多为新村人开垦的荒山,虽权属并不非常明确,但村民占有茶山的事实已在客观上得到地方政府、村委会的默许,然而,当新村人被置于“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时,其主体性开始遭到质疑,由此关于遗产权属的纷争成为日后新村人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矛盾的焦点;最后,新村人把茶山视为留给子孙后代最为重要的遗产与财产,所有权不能让渡。“房屋地基已经让给政府了,但是茶山绝不能放弃,要不然拿什么留给后代。”<sup>①</sup>这反映了绝大多数新村人的心声。下文将通过“挖路”事件来呈现新村人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互动,力图说明,在世界遗产语境中地方社会正在发生裂变,而这种裂变又进一步对地方民众的文化认同与自我表述产生影响。

### 一、“挖路”:一纸“政府令”激起千层浪

自1998年底被整体搬迁以来,新村人的当务之急在于恢复生产与重建家园。当时,由于“世遗”拆迁来得突然,拆迁安置工程又很浩大,以至于村民在拆除老房之后,并未能如期入住新的安置小区。为了应对来年“头春茶”的制作,那年他们的春节过得十分简单又繁忙,“那个年简直不敢去想,我家在正月初三就开工了,其他人家也差不多,总之大家的时间非常赶”。一位村中的大姐神情凝重地对我说。1999年的4月中旬,大部分村民匆忙搬进新居,紧接着便开始做茶。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新居的装修或扩建、茶叶的生产与制作等。虽然这些工作看似都是村民各家的事情,但因其与“世遗”的纠葛,所以村民在进行家园重建与恢复生产的同时也糅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黄薛妹的访谈,2008年9月18日。



合了各种情感与思想。其一，“世遗”拆迁所言说的相关政策并未完全落实，如“以面积换面积”、“以本换本”的安置补偿政策迟迟未能实现，令部分村民心存怨言；其二，由于“世遗”拆迁问题既涉及征用景区内多个行政村村民的宅基地，又与村集体的茶山、林地、林木以及村民所有的茶林木等相关联，还牵涉景区风景林的权属问题，因而“世遗”拆迁后的补偿款问题以及新村山林的权属问题也变得相当复杂；其三，由于茶叶生产所需，村民不得不经常出入景区，因而连接景区与“茶村”的道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世遗”拆迁之后，茶村与茶山之间的距离由此拉远，而“茶路”却由于景区管理的原因变得日渐狭窄，摔倒、撞车等事故更是频频发生于此。频发的事故促动了村民的心弦，他们认为其生存空间正在日渐狭小，生产生活也被“设限”。

从1999年起，我们都忙着修房和做茶，根本没时间去考虑其他事情，但是那条路上一直有人摔倒的、掉河里的、手摔断的事情发生。事故频发，村里人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但一般还是放在心里，后面没办法，直到听说要封闭，村里才火爆起来的。<sup>①</sup>

上述“封闭”是指武夷山市政府与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对武夷山世界遗产施行的一种管理制度，其经验主要来自黄山、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等世界双遗产地，其依据则源于国务院1985年颁布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在我国，景区管理与世界遗产地管理大多有所重叠，由属地政府依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组建的景区管委会全面负责世界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于1990年成立，从1999年起，负责对武夷山世界遗产地东部的自然与文化景观保护区、中部的九曲溪生态保护区以及南部的闽越王城遗址保护区的管理与保护。显然，景区范围和边界的划定具有强烈的文化政治意义，由此景区便成为体现地方政府与景区管委会行使行政权力的符号。因而，与其说封闭管理是遗产保护的制度性需求，不如认为是行政权力和强势话语的象征与隐喻。

近年来，世界遗产景区的管理模式已经引起专家学者、政府、媒体以及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如徐嵩龄等通过对黄山进行实地考察和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肖晓南的访谈，2009年3月20日。

评估,指出,黄山的遗产管理模式虽然以市场机制较好地解决了遗产管理的费用问题,促进了旅游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世界遗产景区的社区化和城市化问题,遗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因而黄山模式在行政建制与社区关系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sup>①</sup> 专家段松廷也指出丽江现行的管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的置换与空间污染,而这种“空壳化”现象又将导致古城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sup>②</sup> 针对武夷山风景区封闭式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林璧属等通过对武夷山封闭式管理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需求变化、利益主体的分歧点及其复杂关系的考察,指出封闭式管理引发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重构问题,而且只有顾全利益相关主体,保证各方利益需求的实现和协调发展,建立利益均衡的景区合作管理模式,才是景区封闭式管理困境的最佳破解途径。<sup>③</sup> 在作者看来,遗产管理与开发方在征用村民集体用地的情况下,应考虑让地方民众参与景区开发管理决策,兼顾村民的利益诉求。由上观之,部分学者已经从遗产管理的角度对景区管理体制与模式进行论述,并且已经关注到,景区管理不仅仅是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问题,还涉及所在地各利益主体特别是地方民众的利益问题。但是,上述研究侧重于遗产管理与旅游开发的矛盾,而对封闭式管理背后的深层逻辑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冲击的关注还不够。鉴于此,下文将通过“挖路”事件的描述来展现封闭式管理遗产背后所潜藏的文化逻辑以及地方民众对此做出的回应。

话分两头。随着拆迁整治建设的顺利完工,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打造世界级精品景区,武夷山景区管委会于2000年6月开启“世遗二期环保工程”项目,并于第二年实施开发项目,首先投入1.3亿元新建三条公路,改扩建2条公路,新建1个景区主入口和2个次入口,其次投入1亿元组建景区环保旅游车队,另外投入1500万元创建武夷山景点票证网络智能化管理系统,同时还投入7000余万元外迁景区村民735户,拆迁面积12.1万平方米。<sup>④</sup>

① 徐嵩龄:《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之路》(上),《旅游学刊》2002年第6期。

② 刘红婴、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195页。

③ 林璧属等:《武夷山封闭式管理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旅游学刊》2006年第7期。

④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准备,武夷山政府于2004年3月20日向武夷山景区内及周边村民颁布了试运行封闭式管理的“政府令”,准备于4月1日对景区施行封闭管理。《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试运行暂行规定》(参阅附录4)对武夷山的旅游车辆、旅游者、公务活动、住户通行、票务、违章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规定,并指出封闭管理由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具体负责。虽景区管委会为封闭管理的施行提前向村民做了一定的思想动员工作,但其中“因农事活动使用车辆及雇工进入景区的,由户主在主次入口或卡口登记,办理临时通行证后进出;到全封闭管理区探亲访友的,可经就近卡口登记核实后直接进入”<sup>①</sup>的所谓“霸王”条款却激起了村民们的忿恨,这可以从村民们对景区封闭式管理的看法中窥见一斑。在完成的70份调查问卷中,63.6%的村民认为景区封闭管理造成了他们生产的不便,而且使其生产生活成本增大;另有31.8%的村民则表示景区封闭式管理一方面是景区所需,而另一方面却不利于村民生产,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如表3.2)。总的来看,新村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冲突与武夷山景区施行的封闭式管理有着直接的关联。

表 3.2 对景区封闭管理的看法

		频率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有效	股份公司为了盈利而试行封闭	3	4.3	4.5	4.5
	封闭造成我们生产不便	42	60.0	63.6	68.2
	说不清楚	21	30.0	31.8	100.0
	合计	66	94.3	100.0	
缺失	系统	4	5.7		
	合计	70	100.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分析整理而成。

新村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至“政府令”颁布之后不足10日,也就是在试行封闭管理前夕的3月29日,村民们迅速聚集到一起,把通往景区的“茶路”横腰“截断”(如图3.2),随后

①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封闭管理试运行暂行规定》(内部资料),2004年3月20日。

又与景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图 3.2 通往景区的“茶路”

关于那天的“挖路”事件，村民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刚吃过中午饭，正准备做清明果用的豆子，一听到外面的声响，我拿了把锄头就冲出去，到河边时已经有很多人在那了。我没有动那些树（防护带），但是挖了路边的竹子，把路挖开些，把气一起出了。<sup>①</sup>

此“毁路之举”连同“政府令”在后来被村民们视为“上访”的导火索，并因此唤醒了他们保护“家园”和共享遗产利益的意识。

他们真的是意想不到，因为我们也没有说要扩建这条路，就是一听说封闭，个个很火，觉得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了。我们进入自己的茶山做事，要提前向管委会打申请报告，请求批准进入，这样的规定太不合理，完全是没有顾及我们村民的利益。所以当时每家每户都很积极，拿刀的、拿锄头的，拿去就挖就砍，两下子很漂亮的绿化带就被挖开，路就变宽了。挖了以后，市镇主要领导和景区管委会领导就赶来了，站在边上拍了些照片，后来还说：“你们不要再挖了砍了，等明天路会给你们加宽。”后来有些人去砍广场上的树，

①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等的访谈，2009年3月20日。



这确实有些过分了。不过当时广场也不让我们走，要我们绕道过去，说实在当时也很火。本来，4月1日封闭当天所有记者和市镇领导是要一起来这里举行封闭仪式的。<sup>①</sup>

“挖路”一事事出突然，武夷山市镇领导与景区管委会领导随即赶到现场。不过，新村的村干部们却迟迟未露面。部分村民与管委会领导进行直接对话，“如果我们连路都没得走，最终自己连饭都吃不上，那也没有什么东西要去保护了”。对此，管委会领导答应为他们加宽路面。事后，村民出资请来石匠，把挖开的路面进行整理并打上水泥，加宽了路面。之后，封闭仪式被延期，“挖路”事件看似已经平息，但是该事件犹如一颗被掷入湖中的石子，不仅打破了湖面的平静，更泛起无数涟漪。

随后，新村部分村民又于3月30日、31日到景区的售票口阻拦售票，“游客可以不用买票进入景点，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我们村的茶山”<sup>②</sup>。30日中午张夸梅与另外200多名村民一起来到水帘洞景点，对景点的售票进行拦阻；第二天上午，她们带着午餐又一起来到天游峰景点进行“拦票”。张回忆了当天的情形：

当我们到达天游峰的时候，市镇领导、景区管委会领导，以及上千便衣公安突然出现。不一会，他们就带走了十几个村民。有一些跑回村里的村民立即喊了村里的其他人赶往分局，与此同时，一部分村民堵住了村口的公路，不让过往车辆通行，并把家里的小孩全部从学校接回家；另一部分村民则以封路、罢学为条件与分局进行谈判。而被带回去的村民在里面待了十多个小时，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最后，他们终于被允许回家。

对于这件事情的后果，村民张没有过多考虑，但她强调他们只是打算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引起政府的关注，并希望能参与景区的保护和分享世界遗产带来的收益。由此看来，遗产管理方与新村人的“平静”关系出乎意料般地被那条联结双方的“茶路”所打破，并由此引发双方关系不断趋于紧张。显然，在这件事情的背后，“茶路”已经不仅仅是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黄薛妹的访谈，2009年3月10日。

<sup>②</sup>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的访谈，2009年3月22日。



一条普普通通的公路,而成为一条承载世界遗产身份符号与标识的纽带,是“主客”之别的象征。

## 二、事件背后的“洪流”

武夷山的遗产保护工作虽然一直都受到同行的肯定和称赞,但从武夷山现行的遗产管理实践与保护成效来看,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方、地方政府之间正在形成某种“张力”,这种紧张关系还对遗产的保护及遗产地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地方民众作为文化遗产的直接传承者,却在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以至于使地方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发生转向,由自觉的保护转变为消极的保护,甚至还出现地方民众故意破坏遗产资源的事件,如恣意砍伐古木,任意开挖茶山等。

文化主体的边缘化问题是文化遗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文化主体的集体出走、传统文化的边缘化问题<sup>①</sup>等都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世界遗产的文化主体因其复杂性与多层性而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显然,新村村民已经构成武夷山茶文化不可或缺的文化主体,是武夷山遗产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是武夷山景区核心部分山地、林木、茶园的所有者,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作为武夷山遗产的文化主体为何要集体搬迁?这说明,在全球性的遗产体系中,新村村民仅仅是一个被言说、被解释、被表述的对象,是全球性的遗产产业(heritage industry)链条中所生产与消费的内容之一。总之,他们的声音已经湮没在“遗产权力”之中,也湮没于实践遗产保护的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之中。

另一方面,在“世遗”拆迁至景区施行封闭式管理的过程中,地方民众在“为国争光、为民族增辉”的号召下,在行政权力的要求下搬离故土,其身份也随之由“主”而“客”。不过,正是在这“主—客”的转换中,由于生活空间的“设限”,生产受阻,以及沟通的不畅等等,地方民众也在以“过激”的方式或者说“集体抗争”、“依法抗争”、“日常抵抗”来发出“地方的声音”,对当前“自上而下”的遗产保护模式做出自己的

<sup>①</sup>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8—48页。



回应。由此观之，“世遗”语境下的“封闭管理”以及“挖路”事件的发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遗产全球化的必然后果，是全球性遗产保护模式出现在地方的不适应“症状”。

因而，我们不能把“挖路”事件当成一起简单的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冲突事件，更不应简单地断定是村民闹事以扰乱正常的旅游秩序和破坏遗产资源。它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最为重要的动因在于，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体系中，村民往往被视为遗产保护潜在的破坏因素，并被“刁民化”；其次，自拆迁以来，村民都在实践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但同时他们也在经历着由“茶路”的受阻至生存空间的“设限”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他们感到“他们正在被遗弃”。所以，村民把“挖路”的发生说成是景区管委会所逼，“他们特意把这条路弄穿点，以为我们会知难而不再进入景区，接着就会把景区内的茶山全部交出来”。

此外，“挖路”事件的发生发展与世界遗产的管理和保护的举措密切相关。其一，景区封闭管理主要是由景区管委会下的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公司在具体负责，在村民眼中，股份公司是盈利性质的企业，明显不同于政府单位，也就是说，股份公司是在开发、利用新村人的资源，而又不允许他们分享遗产资源开发带来的利益，这是新村村民难以接受的事情。

其二，自“世遗”搬迁以来，景区管委会在招工、摊点分派等事项中未能关照到村民。在村民看来，他们为世界遗产的保护作出了“搬离故土”的贡献，而他们的付出却未能得到景区管委会的重视，那么他们自然会去开挖茶山、砍伐林木等，因为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或者说他们的利益已经受损。反而言之，如果村民对其生产生活享有自主权，并能分享到遗产旅游带来的利益，那么在遗产的保护方面，他们便会相互监督，彼此约束，自觉保护身边的遗产。<sup>①</sup>

其三，“世遗”拆迁安置带来的遗留问题，如房产证、补偿款等。以上表明，在“世遗”拆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强调世界遗产对于国家声望、民族自豪感，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需重视被拆迁方的话语和言说，注意基于这些“地方性知识”和“生存道义”的

<sup>①</sup> 与村民刘林、刘森的访谈，2008年10月25日。

表述。

就“挖路”事件的后果来看,正如村民自己所说的,“挖路”仅仅是一个引子和导火索。首先,该事件及其后的阻拦售票等打破了村民一贯以来的“沉默不语”,首次引起政府与景区管委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其次,从村落内部结构看来,民间权威以新的形式(不同于族长、头人或老人会等)出现在新村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积极与官方对话,为村民争取权益。另外,在“世遗”拆迁过程中被消解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恢复,而新的村落权力结构、人际关系等又处于型构之中。再次,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民众与遗产保护的矛盾由此凸显,并在福建省政府、武夷山政府与景区管委会以及普通民众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自此,村民与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的关系不断紧张,随后村民们更是一度到省政府进行“上访”维权。下一章将对“上访”等群体事件进行详细阐述。

### 小结 遗产主体的边缘化与权力的隐喻

基于上述的分析,“世遗”拆迁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遗产运动中各方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首先,显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及其评估专家在这场遗产运动的权力话语体系中处于制高点,他们是世遗规则的制定者与最终“评审团”,一方面倡导文化多元、价值平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划分标准,创立名录,在客观上成了“遗产消费”的引导者。那么他的“至高权力”从何而来,值得深思。是全球化进程使然,还是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或文化上的策略性选择,抑或是地方社会主动输出其差异性特质来获取旅游资本,拉动经济,还是有其他原因呢?其次,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来看,其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处于全球遗产体系中的制高点,他们主要从国际法赋予的非强制性权力、遗产概念与遗产标准的话语权力、专家学者的西方中心主义等方面来实现其目标;其二,民族国家是“世遗”申报的唯一“合法性”的表述性单位,包括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赋予的权力、民族国家的行政权力等;其三,地方政府是遗产申报与管理的具体施行者,包括行政权力等;其四,地方社会或人群共同体处于遗产体系的终端,往往被动地接受遗产概念、遗产理念,对遗产保护的“沉默不语”或“失语”,抑



或变为遗产的消费主体等。

然而，从遗产与人类的关系看，地方无疑是遗产的落脚点与根本性表述单位。地方包括“地方性知识”与地缘性人群共同体，前者构成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后者通过遗产得以追溯历史和强化认同。易言之，遗产是地缘性人群共同体的情感依附与集体记忆。不过，在时下的遗产运动中，遗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与记忆中的认同符号，而被附丽诸多的其他价值与次生形态。首先，地方政府视遗产为实现政绩和改善民生的资本，并由此采用资本化运作来保护和管理遗产，从而出现遗产的制造与发明，遗产的商品化、产业化等问题。其次，由于民族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因而要特别关注其在遗产保护中的“限度”和政治倾向，尤其应警惕基层政府滥用权力来利用遗产。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框架的遗产体系有其发生发展的逻辑，其权力源自现代西方国家的“向外”的需求，现代遗产的全球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一种与遗产的特殊关系。换言之，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其流动的进行主要源自权力与政治的影响。再者，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地方政府与学者专家等也在以话语、权力等多重力量对遗产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的结构产生影响。

从表面来看，“世遗”拆迁似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遗产申报与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然不料，“世遗”拆迁及其所遗留下的问题给遗产地村落社会带来的冲击以及引发的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已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影响。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诱因除了是所谓的“村民的小农意识浓、文化素质低、刁民”等因素外，更应当质疑当前的“申遗”标准与遗产的保护模式。毋庸置疑，文化的传承与延续、生态环境的保持都离不开人的因素，那么，如果人的因素被“遗弃”或忽视，那么“遗产作为过去送给未来的礼物”<sup>①</sup>，又将如何传递与存续？

如上所言，“世遗”拆迁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这种共识正是基于国际组织、政府、专家学者及其潜藏的话语、权力等力量的“合谋”（conspiracy）。在此背景下，遗产地村落的生存状况不得不令人担忧，它们要么被整体拆迁，要么被重新规划，要么受到外来力量的管理与

<sup>①</sup> World Heritage Centre, "Heritage: A Gift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World Heritage Information Kit*, 2005, p. 5.

约束,村民们面临失去“自主权”的境遇,而且他们的生产生活也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拆迁运动”已经对活态的文化遗产造成直接的冲击与影响,所谓的整体拆迁、旧址绿化是从根本上铲除了武夷山文化遗产的历史之根,而所重建的新村已不是原有人文概念上的村落了。<sup>①</sup>由此,有些地方的利益相关群体会联合抵制地方政府的“申遗”行动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外,从当前遗产保护的实践来看,遗产地内的自然环境与文化遗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这样的做法并未激发遗产地周边民众的“文化自觉”,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遗产与遗产主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难以在根本上促成村民保护遗产的自主意识。从下文的叙述分析中可见,虽然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权力得以实现拆迁村落与申报遗产的目标,而随后景区管理上的一系列变动尤其是景区封闭式管理更加剧了拆迁带给地方民众的创伤,并由此引发村民们前后多次“上访”维权等群体性事件。由此观之,新村进行“世遗”拆迁所带来的最为直接的后果,则是村民与遗产地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预示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也给地方民众与遗产地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带来冲击。

综上所述,“世遗”申报是一项庞杂而浩大的工程,涉及国家名望、民族自豪感、地方经济与遗产旅游的发展,地方民众的生存发展等等,所以在完成拆迁、成功“申遗”之后,也给遗产地留下诸多后续问题。譬如遗产区域的等级划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遗产的整体性,对世界遗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遗产保护与景区管理之间的矛盾,现行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模式对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方、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冲击,“世遗”拆迁的补偿款对村庄内部关系的冲击等等。而且,这些问题的凸显也反映出遗产地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不可预知的政治文化变迁,而地方民众所做出的“回应”正是这场变迁的“地方表述”。

<sup>①</sup> 吴春明:《2004年度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报告》,载《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与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 第四章 遗产的归属与地方的声音

如前所述,“茶路”所引发的不仅仅是“挖路”、阻拦售票等群体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茶路”的畅通与否已经关系到新村人的身份认同与家园意识。一方面,村民自称为武夷山新村人,或某某小组人,这说明他们是在确认、强调自己与武夷山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系;另一方面,由于在当地人的眼中,新村人只不过是“江西、浙江等地来的茶工”,是外来者,因而新村人更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强化或维系他们与武夷山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一种新的家园意识与共同的历史记忆。由此,在世界遗产的场景中,对遗产地内的山林进行“确权”成为新村村民的一种不二选择。

于是,余波未息,一波又起。为了景区内茶山、林地的归属,为了生产生活不被“设限”,部分村民开始积极主动地向市镇反映情况。在“确权”的召唤之下,村民们更是越过地方政府直接到福建省政府多次进行“上访”。本章将对“确权”与“上访”的发生发展的原因及过程进行详细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以下三个观点。其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遗产体系已经引发遗产地民众与遗产管理方的直接冲突,并对地方社会的稳定与遗产本身造成巨大冲击;其二,时下的遗产运动已经使遗产的归属性发生了变更或“倒置”,这种变更的发生发展与现代遗产的西方话语、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以及基层政府的行政权力密切相关;其三,地方民众一方面试图通过“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来引起政府的关注,表达对遗产归属权的诉求,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运用世界遗产的符号、武夷山的文化传统、地方政府的遗产旅游政策等来举办传统“斗茶赛”等仪式活动,以此来使村民的集体认

同、历史记忆与“地方感”得以重构与强化。

## 第一节 山林“确权”的由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林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历经数次变动。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依据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分得个体所有的山林。新村人正是通过“土改”翻身做了武夷山的“主人”,由原来的茶工或者制茶师傅等外来人口的身份转变为当地的常住人口;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不仅分到了宅基地,而且还分到了茶山、林地等,并领到“房屋土地所有权证”。发展至50年代中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林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又有所变动。在初级社阶段,林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分离,农户拥有所有权,初级社拥有使用权。之后,又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山林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之时,人民公社又将合作社的山林全部收归。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林权经历了农民个体所有、合作社所有至人民公社所有的过程。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划定少量自留山,将少量的林地和林木的使用权还给农户。在北山大队,各个生产队(小组)是基于地缘之上的合作群体,并开始享有自留山的“小集体”所有权。

1981年,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81〕21号),农户分到自留山,并可承包责任山。进入90年代以来,村民所有的林权制度遭遇挑战与冲击。1998年新《森林法》规定: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在南方集体林区,大多数森林、林地的所有权为集体所有,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主体是集体、公民个人。不过,由于相关规定对“集体”的界定较为模糊,导致部分村干部成为林地的实际所有者。此外,虽然《土地管理法》(1998)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先行征用转为国家所有后才能转让。”但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国家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大,导致不少工程建设项目借用“公



共”之名等原因征用林地的现象严重。<sup>①</sup>由此，山林“确权”既已成为我国当前林权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具体到世界双遗产地武夷山的新村，“世遗”拆迁以前新村人与景区内的林地、林木、茶山之间的关系虽也经历了几次波动，但仍较为清楚，即一部分山林属于村民的自留地，大部分山林则属于新村村民集体所有。但是，世界遗产的到来及其后进行的整治建设、村落拆迁等“运动”对原本清晰的权属关系带来了冲击。一方面，由于新村人的林地、茶山身处武夷山内，而武夷山既是国家级风景区，又是世界遗产地，其境内的部分林地属于国家生态公益林，部分则属于风景林地，因此新村林地、茶山的权属在多重身份的交错中变得极为错综复杂。另一方面，景区的旅游开发是由景区管委会之下的武夷山旅游股份公司在具体运营和负责，那么村民的茶山、林地事实上已经成为武夷山政府、景区管委会以及武夷山旅游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成为他们共同开发的旅游资源。所以在村民看来，他们平白无故多了“几个父亲”，而且，旅游公司的性质显然与政府行政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由旅游公司来开发村民集体所有的茶山与林地就成为没有法律依据的事情。因此，对景区内的茶山、林地进行“确权”成为新村村民势在必行的大事。

从2000年以来，我们经常从电视上看到类似“确权”的新闻，但当时忙于做茶叶、恢复生产等事情，也就没有人去过多地关注这个事。到了2004年，我们从更“乡下”的农村、娘家等地得到消息，土地和林木都已经分到各家户了。于是，我们才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去了解这件事。原来我们国家已经下发了这方面的文件，这说明国家政策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的。我们从其他乡下的“确权”情况就联想到我们村，既然他们可以把林权证办到各家户，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世界遗产地内的林地、林木等办到我们村集体来。毕竟我们今后还要靠我们的茶山、林地吃饭的。我们这才认识到“确权”的重要性，才有了一点觉悟。特别是那条路的事

<sup>①</sup> 徐秀英、马天乐、刘俊昌：《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研究》，《林业科学》2006年第8期。



情爆发以后,我们就更希望“确权”早点办下来,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现在想来,如果景区管委会当初把我们那条路修好点,可能就不会有这些后面的事情发生。<sup>①</sup>

正如上所言,2004年4月随着“挖路”、“拦票”等事件的相继发生,村民对景区封闭式管理的意见越来越大,曾发生过村民与景区管委会某工作人员之间的直接冲突,并由此引起武夷山政府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而此时,200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已经颁发《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闽政〔2003〕8号),建议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的集体商品林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等进行确权,但该意见并未对风景林的确权问题进行明确说明。在此情况下,一方面,新村村民要求“确权”、办理林权证的呼声越来越高涨;而另一方面却遇到现实与政策上的难题。

另有一个小插曲对于激发村民的“确权”意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世遗”拆迁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新村村民大多数曾是从江西、浙江等地迁入武夷山,那么景区内的茶山、林地等原本就不应属于他们。对此,村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的祖辈都在这亲历了毛主席时代的‘土改’,有分田到户,而且我们还有那个时候颁发的房屋土地所有证(如图4.1)作为凭据”。虽然,在大集体时代农民的房屋土地所有证被要求上缴,留存至今的已经极少,但当时陈谨达的父亲却小心地保存下一份。所以,当陈谨达把那份存留至今的泛黄的房屋土地所有证拿出时,那些地方官便一言不发了。此外,村民还认为:“虽说世界遗产是全世界人民的,不属于哪个村,但也不能牺牲某一个村的利益来换取世界遗产,这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实在不公平啊。”总之,这份20世纪50年代的房屋土地所有证使他们与武夷山的关系得到了确认和认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份房屋土地所有权证是新村人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表述的文化符号,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与资本。而且,从这一件事上,他们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土地凭证对于家园的重要性,也由此意识到在世界遗产地进行“确权”,对于维系与延续他们与武夷山的关系将至关重要。因为,这种联系不仅关乎他们的现实权益,更关乎他们后代子孙赖以生存的家園。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的访谈,2009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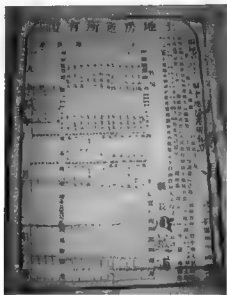


图 4.1 福建省崇安县土地房屋所有证(1952 年)

通过数次大规模的群体性行动之后,关于“确权”的想法逐渐在村民中达成共识,而且,村民的关系也逐渐从“世遗”拆迁的“硝烟”中走出,从“各自为政”变为具有一定集体特征的群体性行动。从“挖路”来看,大部分村民都是自发的,因为他们都深受“狭路”之害;但从“集体拦票”的内在动因来看,他们的集体意识与政治诉求最终在景区封闭式管理及其挟裹的权力政治与强势话语下被激发出来。

一开始,大家为了确权的事情真的很积极。起初,我们先到镇里反映情况,后来镇里没有做出什么答复,于是我们又接着上市里进行反映。这么一闹开,事情就很多了。<sup>①</sup>

村民肖晓雨回忆了最初去镇里反映情况的情形:

当时镇里领导见到我们,声音很粗,好像是我们农民一旦走到镇里来,就会被看扁。我们也不示弱,直接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的事情办妥了,我们也不会走到镇里来。后来,我们看镇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就直接坐车去市里。反正市政府离我们村也不远。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镇

①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的访谈,2009年3月20日。

里走、市里走,就像上菜园一样。<sup>①</sup>

“拖延”往往是基层政府惯用的策略,对此“上菜园”则是村民们最初应对的方式之一。因为山林“确权”对于村民而言,是一件关系家族存续、村庄发展的要事,而基层政府对于村民的“确权”要求反映淡漠,不表态,或是“踢皮球”,这样“上菜园”数次之后,村民们开始考虑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达成山林“确权”的目标。此后数次的上访揭示出村民与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及互动策略,并以此阐明了村民日常生活“政治化”的内在动因及其对遗产造成的冲击。

## 第二节 “三访”——“世遗”语境中的诉愿机制

关于农民与地方政府通过上访而展开的博弈,已有学者进行过一些研究。有学者认为,上访最初是新中国采取的一种权力技术与象征仪式,是承续国家在“土改”时期发明的诉苦技术,也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制度化、常规化的渗透方式。换角度而言,上访的设计是为了向政府反映民情民意,体察百姓疾苦,声讨各式各样的官僚主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sup>②</sup>另有部分学者指出,上访是既有政治结构有意预留给地方民众的诉愿机制,当农民在遭遇“冤情”而又无法从当地政府获得解决之时,则可以向上一级政府诉愿。但是,信访制度的设计并非是为行政救济所设,而主要是出于了解民意的需要。因而,中央或上级政府更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把问题化解在当地,于是,上访与“拦访”也就不断上演于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sup>③</sup>在李连江和欧博文<sup>④</sup>看来,上访则是农民以政策为依据的,采用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进行维权的方式,是“依法抗争”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在“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中,农民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来诉

①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陈瑾的访谈,2009年3月12日。

②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14—315页。

③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第134—143页。

④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第141—170页。



求上级政府的权威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sup>①</sup> 概而言之,从“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来看,上访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普通百姓向上级政府反映问题的正式制度。这也许就是普通百姓寻求上访,并以上访为权力技术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合法性”依据吧。对于普通百姓,上访已经成为他们合理运用国家制度进行的合法抗争,是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方式之一。

### 一、“三访”始末

就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新村而言,村民的上访并非直接因于“世遗”拆迁,但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遗留问题,如征地补偿问题、山林权属问题等,以及景区的封闭管理却是最为主要的动因。因而新村村民的上访不仅涉及地方政府,还直接与遗产管理方——景区管委会发生联系。新村村民的上访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村民代表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他们希望地方政府能解决其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确权”问题及“世遗”遗留问题。如上文所述,村民代表频繁走动于市镇之间,由镇政府走向市信访办、市政府,又由市信访办走向镇政府,但事情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他们所反映的情况与问题虽已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却仍被“束之高阁”。与此同时,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建设与农用地征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农民群体性上访事件经常见诸于各类媒体。从各类媒体传来的信息,村民感觉到中央政府的政策都是替老百姓考虑的,而问题主要是出在地方政府。那么,为了解决他们与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之间的问题以及防止出现地方政府内部之间的“官官相护”,集体向上级政府申诉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这后一阶段的上访又分为前后三次声势浩大的“越级”上访,从武夷山直奔福建省政府。

2004年9月初,关于集体去省政府上访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百余名女性村民迅速做出回应。为了集体“出走”不被发现,她们分批分次去火车站上福州的车票。9月19日,近200名村民聚集在福建省信访办门口。新村村民“上访”维权的帷幕由此拉开。

按照村民的说法,这种事情是全村的大事,与自己的利

<sup>①</sup>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益密切相关,如果得到利益补偿了,也是分到每户的,所以基本上每家每户都要有人参加。有的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去的,也会叫朋友和亲戚代替去。上访的人员多是老弱妇孺,这也是村民的策略,村民自己也认为,对妇女小孩,政府不敢乱来,男的则可能被抓起来。<sup>①</sup>

在村民看来,从反映情况到上访,他们是“情非得已”。因为景区的封闭管理已经严重影响村民正常的生产秩序与日常生活,而且,只有待景区内山林的权属问题得到解决,“确权”到村集体之后,景区与新村的关系才能够说清楚。进而言之,只有明确景区内山林的权属问题,才能厘清新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在确定景区内的山林归属于新村村集体以后,新村村民才能据此向景区管委会提出分享遗产旅游带来的利益的要求,以此维护其合法权益。这次上访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也给地方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其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村民认为,此次上访效果不明显的主要原因是人数还不够,他们总结上访人数越多就越能引起省府领导的关注。于是,“为了正义,为了后代”,300余村民在一个多月后,即10月25日,再次前往省府“上访”。李西华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那时候武夷山的天气已经有点冷了。为了避开村干部与镇里的阻拦,我们分成了好几批去买的火车票。我们有人带着山界图、田地的协议书等,有人带着我们事先做好的标语横幅——“还我山权、还我林权、还我使用权”,后来到福州又有几个人再一次凑出来一份简短的“申诉报告书”,并把它们分别送到省政府、省信访办、省妇联和省“人大”四个政府部门。

当时,虽然地方政府和村镇干部试图劝阻和说服新村村民不要去上访,但村民们还是到达福建省信访局。此外,由于此次上访人数众多,声势浩大,新村与世界遗产的问题引起了省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一个月之后,省府派出专门的调研组到武夷山及新村进行实地调查。

<sup>①</sup>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世界遗产管理”课题组:《遗产管理与社会变迁:对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内部资料),2006年,第7—8页。



2004年11月27日调研组进入武夷山,通过与地方政府领导座谈、走访群众、实地查看等方式展开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从世界遗产管理的方向来看,实行封闭式管理符合遗产保护法规和规划的规定,也将有利于提升景区的竞争力、整合旅游资源,而且实行封闭式管理是“双世遗”的通行做法,目前国内其他双遗产地——黄山、泰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但是,从武夷山的实际情况出发,调研组建议推后实行封闭式管理。原因首先在于进入景区的道路较多,封闭管理难度大;其次,景区内居民较多,外迁量大,群众需求将难以满足;再次,封闭式管理将对外迁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

调研组认为,新村人前后两次上访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诉求:其一,景区内大半的生态公益林属新村集体所有,山林、土地是其生存之本,因而村民要求以山林权入股参与经营、分配利润。其二,由于景区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利用村里的山林、土地开发旅游与收取门票的行为完全属企业行为,因而村民要求从每张门票中提成或每年收取补贴。其三,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村民要求明确山林权属,发给他们生态公益林和茶山林权证。其四,景区封闭式管理造成村民生产不便,以及外迁后茶叶运输成本增加,要求股份公司给予运输补贴。最后,涉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如世遗一期拆迁后的两证办理问题,补偿地(回拨地)问题,外迁安置问题,以及发展问题。<sup>①</sup>通过一个星期的调查,调研组于12月2日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对生态公益林进行补助,建立扶持发展基金,办理一期遗留房产证问题,处理好征地补偿费用,景区核心区的临时摊点面向村民招投标,招工时间等条件下,尽可能地优先照顾周边村民,安置拆迁问题,解决新村发展问题,设立举报电话,监督二期拆迁中的不公正现象等。<sup>②</sup>

通过调研组的信息反馈与村民们的积极走动,景区的封闭管理暂被延后。不过,村民认为他们上访的效果仍十分有限。一方面,山林“确权”的事情仍未落实,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反馈到省府的信息则是说新村的事情都已得到妥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的“确权”要求又被无限期地延后。

进入2005年的年初,继续为了解决世界遗产的遗留问题、山林

<sup>①</sup>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

<sup>②</sup> 同上。

“确权”以及补偿款的分配等问题,村民们又一次前往省政府进行上访。在上访前夕,一些村民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世界遗产带给村里的一些问题,最终“炮制”出一份长达3页的申诉报告(详见附录5),其主要内容涉及武夷山“世遗”拆迁及景区封闭管理给新村村民带来的实际困难,诸如搬迁负债、生产生活费用增加、封闭管理造成的出入自由与生产不便、房产证以及利益分配问题,并对前次“上访”遭到上级政府阻拦等事件进行申诉。<sup>①</sup> 在他们看来,新村为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武夷山景区遗产的保护者,那么村民就应该有与之相应的收益权。另一方面,依据1998年“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所制订的拆迁优惠政策——“新村拆迁后,新村的名称、建制、山权、林权、土地使用权不变,村民出入景区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不受限制”<sup>②</sup>,新村与景区内山林的权属关系——景区内山林属于新村集体所有,这一点不能因为景区要施行封闭管理而发生改变。

如果说前两次的上访遇到了层层阻拦,那么第三次上访的经历可以说是重重“突围”而更显惊险与刺激,村民们对此次上访的经历记忆犹新:

在我们上访前夕,有人总会把风声透露给村干部,而村干部就会立即通知到镇里。那一次由于出现这样的“异己”分子,我们竟然在武夷山火车站买不到去福州的火车票。此后,我们又租到两辆旅游车,准备包车去福州。但是,第二天旅游车一到村里,便被赶来的村干部、市镇领导等游说回去了。而村支书范德西还流着眼泪来劝我们不要去上访,说有什么事可以回去慢慢商量着解决。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选择先步行去建阳。由于有村镇领导一直在旁边劝解、拦阻,所以那次上访我们大概只去了60多人,而且很快就有一小部分人被劝了回去,到后来只剩下一半左右的人在坚持。我们这30多个又兵分两路,一拨十几个人被迫沿着火车铁轨走去建阳,另一拨人则在村干部、村镇干部等的

① 《写给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报告》(内部资料),2005年1月。

② 《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十项优惠政策》(内部资料),1998年10月12日。



拦截之下，还是险胜逃脱。最后我们都赶到了建阳。

从建阳坐上去福州的大车已经是深夜，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才到达福州。下车后我们也没来得及休息就直接去信访办，并打开横幅“还我山权、地权，还我使用权”。这个时候村干部和市镇领导也已经赶到。他们一边劝说我们回去，一边试图拿走我们的横幅，阻止我们上访。总之，这一次上访最辛苦，也花费最大，后来大家都是睡在省政府门口。我们村民的素质还不错，到了省政府从来不闹不骂，把道理摆出来，我们想政府最后还是要解决的。<sup>①</sup>

总归来讲，农民的意志不够坚定，反正我是意志最坚强的，从挖路开始我就没有缺过一次，到哪里我都没有停顿过。因为总归是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我会坚持到底。<sup>②</sup>

在村民向省信访办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村支书又一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流着眼泪劝说他们回去。可是村民并不为之所动，在他们的心中，村支书私心太重，在“世遗”拆迁的过程中只顾中饱私囊，而不考虑大部分村民的利益。关于村干部在“世遗”申报、拆迁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已在上文有所提及，而他们在遗产保护与管理过程中的角色已有所变化，因为从遗产管理方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关系来看，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充当“协商者”、“沟通者”的角色。不过在现有村治的场景中，村干部事实上既难以实现国家代理人和村落当家人的角色，也不会放弃其已经获得的职位，而是充当一个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撞钟者”，并从中寻求既得的制度利益。<sup>③</sup> 这一种解释也部分地体现在新村村干部的行为当中。也正是由于村干部所秉承的这种工作态度，使他们在对待村民上访、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冲突时也表现出多面性。相关的分析详见下文。

在新村村民前后三次声势壮大的上访中，新村的群体上访逐渐使新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化”，并成为影响武夷山世界遗产

① 与新村村民张夸梅、肖晓南、李桂英、黄薛妹、陈阿旗等的访谈，2008年9月18日。

② 与新村村民肖晓南的访谈，2009年3月20日。

③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79页。



保护与管理、遗产旅游的不利因素。对此,福建省人民政府讨论形成《关于研究武夷山风景区管理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05年3号),督促南平市、武夷山市政府解决有关问题。针对新村出现的“不稳定”局面,地方政府因此决定创建新村稳定工作队,采取法制教育和依法管理、依法打击相结合的方式,以防止新村村民发生冲击景区、阻拦竹筏等过激行为的发生。<sup>①</sup>其后,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景区管委会与新村村委会签订协议,确定:自景区封闭管理实行之日起景区管委会向新村村委会支付有偿使用费,有偿使用费的标准是以130万元为基数,并依据景区门票销量逐年递增。由此,补偿款问题取得突破性进展。不过,由于补偿款问题牵涉到新村内部的分配问题,因此该问题又进一步影响到新村内部的利益分配与政治结构。对补偿款问题的分析与讨论详见第五章。

在村民看来,他们的上访经历虽然充满艰辛,但他们并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是在为大家、为集体谋利”。由此看来,一群来自社会基层的乡村女性群体虽身处强势的世界遗产权威与政府行政权力之中,却并没有因此而“失语”,而是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来进行自我表达。不过,也正是因为过于强势的行政权力与相对弱势的民众之间的力量悬殊太大,以致在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与地方民众之间难以进行对等的沟通,或者说遗产地社会的沟通机制并不完善,因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难以化解在基层,并由此出现村民寻求“上访”,而地方政府竭力“拦访”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访的过程中,村民代表试图向村干部寻求智力与财力支持,但未能成功。这一结果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而村干部所代表的国家权威也会大为削弱;其二,新的民间权威力量在历次上访过程中逐渐成形,并成为影响新村政治和权力结构的新生力量。由此观之,现行的世界遗产管理模式及体现其中的遗产理念都亟须特别重视,因为它们不仅已经引发地方民众与遗产管理方、地方政府之间的疏离,而且还导致遗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遗产地民众保护意识的转变,从而影响到遗产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① 《中共武夷山市委关于研究新村稳定工作专题会议纪要》(内部资料),2007年6月。



## 二、转机：“面呈领导”

如上所言，由于新村村民的上访涉及武夷山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以及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工作，因而三次上访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尤其是山林确权的事情仍未落实。不过，此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村民重新燃起了希望，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村民得知福建省政府某领导要来武夷山视察工作，并极有可能“做客”新村。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有当面向这位领导反映村里的情况与问题，“确权”以及“世遗”遗留问题才有可能最终解决。于是，黄薛妹和其他十来位女性村民紧急在黄柏溪旁的小道上集合，进一步商讨相关事宜。她们告诉我：

2006年农历7月的一个晚上，省里的那位大领导在隔壁村某村民家里喝茶。当我们十几个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立马赶到这个村民家门口。当时已是晚上8点左右，我们就在河边的路灯下，临时凑成了一份报告，把我们村里的实际困难（包括确权问题、房产证问题、景区招工与村民就业问题等）简单地写在一张纸上。我们一群人在河边等了好久，到夜里12点左右，我们终于看到那位大领导走出来，便赶紧围上去，想把那份报告直接交到他手里。可是突然有人抢先一步来夺，我们没给他；然后我们市领导也打算来拿我们的报告，我们也不同意；接着是南平地区的某领导也伸手来拿报告，我们还是不放心。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地方上的领导，万一他们先拿到，说不定我们的报告就会被他们撕碎或者自己收起来，不给那位大领导看。<sup>①</sup>

当事情处于僵持不定时，这些村民竟然做出一个令人大为吃惊的举动。

后来，我们噗通跪倒在地，恳求大领导亲自来拿报告。他走过来拿到我们的报告，认真看过后，非常生气，他当场就要求马上回南平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我们听说，由于我

① 与新村村民黄薛妹、肖晓雨、王莲等的访谈，2009年3月5日。

们到省里上访过三次了,大领导以为我们村的确权问题和其他的“世遗”遗留问题等都已经解决。而且,当时我们下面的人反映上去的情况是,我们的所有问题都按上级的要求办好了。所以那次会议上,我们那些地方官都挨了批评。现在想想,我们村的问题幸好是碰到这位好领导啊,要不然我们还在为“确权”的事情烦心。<sup>①</sup>

山林“确权”的事情终于在“三访”之后出现重大转机。村民认为那位大领导的直接关怀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6年8月11日,新村村民就景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山林“确权”等问题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并针对景区封闭式管理(或称畅通工程)提出14点建议与要求,其中特别强调“关于山林确权问题,请市政府尽快对新村在景区内的山权、林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登记并办证”、“景区有租用北山小组土地,原合同条款是永久租用,需改为有年限租用”等<sup>②</sup>(详见附录6)。不久之后,新村村民代表还与景区管委会领导进行直接对话,通过沟通初步达成一致意见。由于景区山林确权问题已经构成景区与周边镇村不和谐因素的主要症结,而新村与景区管委会、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又直接影响着景区封闭式管理的顺利实施与遗产旅游的正常开展,在此情状下,2007年武夷山市人民政府明确了新村山林的确权原则,即“景区内山林使用权、经营权确权给景区管委会,山林、土地(以林业部门确认的山界面积为准)所有权确权给村集体”<sup>③</sup>,以及景区管委会有偿使用新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并向新村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款。

不过,景区管委会与村民双方对“补偿款”与“租赁金”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方面,景区管委会拒绝使用“租赁金”这一词汇来表达他们使用和管理新村山林的事实,而坚持使用“补偿款”,这说明景区管委会在试图重构其与新村之间的关系,力图打破原有的“主—客”关系,从而为他们对世界遗产的管理与保护及其旅游开发行为寻求合法性依据;同时,村民们曾经为“租赁金”和“补偿款”的不同表述与景区

① 与新村村民黄薛妹、肖晓雨、王莲等的访谈,2009年3月5日。

② 新村村委会:《景区实施畅通工程涉及新村存在问题的汇报》(内部资料),2006年9月10日。

③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纪要(2007)21号》(内部资料),2007年。



管委会主任进行过直接对话,但最终在主任的人情面子、劝导说服之下,做出让步,同意使用“补偿款”。村民之所以做出让步,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解释:首先,土地政策的历史变迁使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处于不断变动中。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使新村村民分到了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家的“房屋土地所有权证”;但在其后的集体化时代、“文化大革命”等却又把这一纸证明从大部分农民手中收走,造成很多村民的房屋土地所有证的散失。易言之,村民与土地的权属关系也存在一定的“空隙”或者“可乘之机”。其次,这是村民在官方强势“权力”话语下做出的策略性选择。村民说他们曾经有山界图、土地房屋所有证,而现在这些文件大都被收走。所幸,村民中还有所剩不多的、保存完好的几份“土地房屋所有权证”(1952年),用以证明他们与这块土地之间的历史关联。不过,在世界遗产的特定场域中,要把山林确权到各家户已然不大现实,而且其山林还涉及地方政府与景区管委会的遗产管理实践,因而在山林确权到村集体的前提下,他们已经能据此参与遗产地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并以此与景区管委会、地方政府共享遗产利益。

另一方面,村民与景区管委会对补偿款的数额意见分歧较大。村民认为,2005年新村村委会与景区管委会约定的130万元的补偿款基数太小,而村委会干部可能是受了特别恩惠才答应的。部分村民代表更是直接找到景区管委会领导,据理力争,于2007年12月形成补充协议,内容如下:

#### 补充协议书

甲方:新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乙方)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是武夷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全面负责风景名胜区的保护、管理、开发与利用,景区新村村民是景区保护与发展的主人。为了全面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条例》,解决新村村民反映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保护世界遗产与维护群众利益的关系,确保武夷山“双世遗”的有效保护和管理,促进武夷山景区的健康持续发展,在甲方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提交的申请报告的基础上,现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

公会议纪要》((2007)21号)和甲乙双方2005年2月1日《协议书》,经双方反复协商,现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双方明确按照《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纪要(2007)21号》确定的原则解决新村在景区内5万多亩的山林、土地(以林业部门确认的山界面积为准)山林权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

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景区)内甲方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所有权归属于甲方集体所有,上述土地、林木(不含村民现有茶山)的使用权归属于乙方,由乙方统一管理,有偿使用。

2. 现有的茶山由甲方与现有的耕种者签订使用协议。

3. 今后国家对风景名胜区内土地、林木所有权、使用权有新的规定时,按新的规定办理;同时,国家赋予风景名胜区内集体或村民其他土地、山林的权利和优惠,应全面落实甲方。

二、双方明确按照下列标准和方式由乙方向甲方支付有偿使用费。

1. 有偿使用费标准。本补充协议约定的有偿使用费已包含了双方于2005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扶持发展资金,有偿使用费的标准以2006年景区景点门票总收入(不含竹筏及景区其他业务收入,具体见附件:《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受入面明细表》)的一,门票分公司总收入的1/10项为计算标准)对应双方于2005年2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130万元为基数,若景区景点门票收入增长,则按同比例增加有偿使用费(以2006年景区门票总收入为8427.917315万元,2007年收入达10226.499159万元,则增幅为21.34%,2007年乙方应支付给甲方的有偿使用费为:130万元+130万元×21.34%=157.742万元,今后年度都按2006年景区门票总收入为准计算)。

2. 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每年的1月15日前向甲方支付上年度的有偿使用费和递增款,有偿使



用费自 2007 年起开始计算。

三、为鼓励 2007 年度以前甲方履行对景区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支持景区的保护和管理,乙方给予甲方新农村建设等如下支持:乙方给予甲方奖励补助款人民币 260 万元,该奖励补助款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的十个工作日内拨付到武夷街道账户,由武夷街道根据甲方支持景区畅通工程(封闭管理)的具体情况在景区畅通工程(封闭管理)实现(试行)一个月后,再转拨给甲方。若由于非甲方及甲方村民原因导致景区畅通工程(封闭管理)无法实施,乙方仍然需支付该 260 万元的奖励补助款。甲方受到上述款项后,原则上按照 2004 年 12 月 12 日省调研组的《关于武夷山风景区新村村民上访反映问题的调研报告》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武夷山风景区管理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05)3 号的精神,由甲方依照村民自治原则合理安排使用。

四、景区实施畅通工程以后,乙方应确保甲方村民进入景区生产、生活不受影响,确保甲方村民可保持传统的茶山管理方式,造成的生活不便乙方应予以协调解决。

五、为了支持和配合景区实施畅通工程,涉及甲方范围的入口、卡口的协管员需招用甲方村民。景区在其他招工中,在同等条件下需优先招用甲方村民。

六、为了更好地保护世界遗产,乙方同意支持甲方成立一支保护管理队伍,该队伍由甲方、武夷街道、乙方共同管理和领导,办公费用和人员经费由乙方支付。

七、乙方今后有改善景点设施或增加新景点需要用地,应征得甲方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的同意方可征用。

八、随着甲方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变化,乙方应积极协助甲方解决新农村建设用地,并对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支持。

九、本补充协议与双方于 2005 年 2 月 1 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条款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的为准。

十、协议年限与本轮国家延长土地承包政策年限相一致。

十一、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持两份,报市政府备案一份。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甲方(盖章):新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林某

乙方(盖章):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某

甲方村民代表签字:郝胜利、黄薛妹、张夸梅等三十人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sup>①</sup>

其中特别提到,“有偿使用费的标准以 2006 年景区景点门票总收入对应双方于 2005 年 2 月 1 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 130 万元为基数,若景区景点门票收入增长,则按同比例增加有偿使用费”。因此,自 2007 年底,新村村民便可每年获得来自景区管委会支付的有偿使用费和递增款。更为重要的是,该公证书再一次明确了景区内新村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所有权归属于新村集体所有。由此,武夷山市政府、景区管委会与新村村委会关于景区内山林的权属问题以及补偿款等问题,终于获得突破性进展。就此而论,新村村民是武夷山世界遗产的文化持有者、主体,已是无需争辩的。不过,至 2010 年初,新村村民所期盼的“山林权属证”仍未得到落实。

### 第三节 新村群体性上访中的权力关系分析

需要强调的是,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与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牵涉武夷山景区遗产的权属问题和遗产旅游的发展问题,因而村民们的上访主要表现为以保护世界遗产为名,以重构家园认同为目标。而另一方面,世界遗产的身份与头衔又给新村的上访赋予了新的政治表征与时代意义,在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下,新村村民与武夷山地方政府及遗产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也呈现出新的权力关系与特点。

<sup>①</sup>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与新村村民委员会公证书 补充协议书》(内部资料),2007 年 12 月 29 日。



其一，从表面来看，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与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关联并非必然，反倒是世界遗产的到来及随后的村落拆迁还给村民们带来更为丰厚的旅游收入与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村的群体性上访与遗产管理方的遗产理念及管理举措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武夷山景区封闭式管理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如“挖路”、拦票等，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引子，是村民们在应对武夷山遗产成为世界遗产以后所做出的回应，这一点可从随后发生的山林“确权”、群体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窥见一斑。具体而言，自1999年武夷山成功“申遗”以来，由地方文化与自然资源构成的武夷山遗产已经转变为“国家遗产”，继而成为世界遗产，其归属已经由地方民众扩展至全人类。在此情境中，身处武夷山遗产地内的新村村民最终搬离故土，为“全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作出贡献。但“世遗”拆迁给新村与遗产管理方、武夷山政府之间遗留下诸多问题，并且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及时化解。从后来的群体性上访来看，在武夷山的“申遗运动”与遗产管理过程中，新村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逐渐显现。从这层意思来看，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已经与遗产的归属性、主体性以及遗产管理方的权力话语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在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中，武夷山遗产已经具有明显的政治表征，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及其属下的景区管委会是武夷山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主体，因而遗产地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的工作成效。但是，遗产的资源特性又使地方政府把遗产的开发与利用视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马车”，不过由于遗产的归属权既涉及国家又与地方民众休戚相关，因而当地方政府在开展遗产旅游与保护实践时，遗产地民众要么被强制拆迁、要么生活被“设限”，他们逐渐“游离”于与之生活密切相关的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在此情状下，一些影响遗产旅游和遗产管理的集体“闹事”行为、群体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日渐凸显，并且已经对遗产地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压制事件的扩展与蔓延，而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各种权力技术和手段来安抚民心、平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在下面的阐述中，我将通过对上访过程中的武夷山政府、景区管委会等官方权威以及地方精英的考察，进一步探讨分析新村上访所反映出的“遗产”特质及各方力量之



间的“博弈”。

## 一、官方的“摆平术”及其效力

### (一)“拦访”与围堵

显然,村民的上访是属于“突发性群体事件”。但即便如此,上访的消息却常常会在前一天从村庄“跑”到镇里,而后再传至市里。与此同时,上级政府会迅速做出回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以防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前者展现了上访信息的向上流动,同时也说明了村两委干部在村民上访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其一,村民的群体性上访并没有刻意避开村干部,而且他们之间还保持着某种若隐若现的联系。其二,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基层村级组织,村干部在看到上访势在必行之时,又不得不把上访的事态及时传达给上级政府,否则,他们会因此而受到组织上的批评或者引起上级的不信任。于是,上级政府在获知村民欲将上访的信息之后,会即刻向镇里下达命令,要求镇领导出面解决问题;而镇里在接到命令之后则会立即通知村两委,要求他们拦截村民的上访队伍。这一信息的“双向流动”反映了村民上访与官方“拦访”的第一个回合,也是他们之间“博弈”的开始。

如上所言,上访是国家认可的一种正式制度,而村民也认为上访是国家预留给他们反映民情民意的合理合法的渠道、途径,因而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可以见“阳光”的,是在依法维权。所以,即使是在上访之初村民遭到官方的百般阻挠、层层拦截,他们也不畏惧“军检法”的威严。村民肖说:“国家给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力,而且我们去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我们怕什么?”那么,既然村民上访是合法的行为,为什么会遭到拦访呢?

这是因为,“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的运作中,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是上一级政府衡量下一级政府工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这里的稳定有其特定的内涵,即无目标指向政府的闹事事件、群体性上访和其他突发事件等”,“有无群体性上访是作为衡量稳定工作是否做好的一项重要指标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和基层政府不愿意在自己的辖区内出现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重要原因”。<sup>①</sup> 在世界遗产地武夷山新村发生

①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第687-688页。



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尤其令人关注,它不仅涉及世界遗产的保护,而且也与遗产地社会的稳定休戚相关。正是基于稳定的考虑,一些地方或基层政府为了抑制上访的增加和升级而采取各种手段控制上访甚至对上访者实施打压。<sup>①</sup>所以,当新村村民进行上访的时候,地方政府和村镇领导会试图运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手段和权力方式对上访群体进行拦阻、劝说,如上文所言及的沿途围堵、劝阻,此外,他们也会适时地运用一些非正式权力如人情、面子等来逐步瓦解上访群体。总的来看,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和村民自治思想的逐步深入,村民们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也日渐加强。就新村村民而言,地方政府和村镇干部的层层拦阻对部分上访村民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大部分上访村民认为他们是在坚持正义、是为集体谋利,所以官方的拦阻与围堵并没有让其放弃上访。

## (二) 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权力的影响

在村民上访的过程中,有些村民会在地方干部的人情、面子的影响下而放弃上访。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的人情文化进行过研究。在美国华裔学者阎云翔看来,人情既指感情,在实践中又有三重不同的指代:一是指人际交往中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二是指对他人的情感理解;此外也可指当今社会新的人情关系即“走后门”或者理解为可以交换的资源。依据阎的观点,前两项道德与情感的因素已基本消失,而新的人情则主要是用以实现功利目标的工具。<sup>②</sup>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干部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村民的亲属及连带关系之名来施压。对此,黄薛妹深有体会:“他们用我舅舅来压我,因为我舅舅在景区管委会做工,所以没办法我就没有去,后来是我家里人去了。”

其次,镇里和景区管委会的领导也会以电话或直接面谈的形式来与村民代表沟通,这种建立于私人情面之上的联系对新村上访群体的思想动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上述补偿款与租赁金的表述分歧就是在景区管委会主任与村民代表之间的多次直接的交谈中解决的。一方面,该主任对村民代表提出的问题表示理解,能够将心比心,但同

<sup>①</sup>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

<sup>②</sup>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时暗示只有同意“补偿款”的提法,山林“确权”才能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他以礼待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村民感受到平等与尊重,从而使他们对其人格和品行感到信服。又比如镇里的李书记通过主动走近村民代表的方式,与村民建立了日常的联系。在上访村民的眼中,李书记的亲民策略是他们放弃继续上访、“闹事”的主要原因。

村里(指村干部)没有写过一份反映材料,都是我们这些农民在写,你一句我一语,凑在一起写。镇里的书记换过之后,他(指李书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沟通,他比较重视这个事情,而且与我们一起协调,这些事情做得比较好;那如果没有他的沟通,如果是用势力压着我们,那景区要封闭就很难了,还可能会爆发很多的事情。他还帮助我们修改反映材料,给我们建议。原来的书记就是用势力压着我们,所以之前的事情就发生了。

至今,村民肖、张、黄等上访积极分子都与武夷镇的李书记、杭主任等领导保持随时的联系,与管委会主任也交流甚多,还与省林业局的领导保持联系。肖说,原先村支书经常到市镇反映情况,称村里上访的村民为“刁民”。但是,在这些上访村民与市镇领导直接交流之后,村民们的做法不仅得到领导们的理解,还被认为是一群说理懂理的村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刁民”一般是指胆大妄为,敢与政府对着干的村民。在村干部的眼中,他们是爱闹事、不安分守己的违规者;而在村民的眼中,他们有些是能说会道、坚持正义的维护者,也有些是不安分守己者、起哄者。其实在媒体和一些学者的理解中,他们更多地被视为底层正义的化身和农民意见领袖。<sup>①</sup>而事实上,上述对“刁民”的诸种看法都存在于乡村政治的场域中。简言之,上述生活化的场景已经从不同侧面反映出,针对群体性事件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应对与解决,官方的正式权力及强制手段并不必然地产生效力,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权威的技术与手段,如人情、面子、关系、尊重等;并且,由于上访并非等同于“社会失范”,而更倾向于一种来自地方的、民间的声音表达,是在国家许可的

①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第681页。



诉愿机制内进行的“农民的日常反抗”<sup>①</sup>、“集体抗争”、“依法抗争”(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sup>②</sup>或“文化抗争”<sup>③</sup>,因此对待群体性上访等事件时决不可强势“压制”。

## 二、“上访”场景中的地方精英

国内外学术界对传统社会的精英群体研究大致经历了“士绅”到“乡绅”,再到“地方精英”的过程,总的来说,其研究主要是从精英群体的存在形态和地方性策略的角度进行阐述和分析。<sup>④</sup>就我国而言,乡土社会是我国的基本形态,地方精英集中反映为地方性的乡村精英。从国家—社会的互动权力格局来看,新时期的乡村精英存在多种类型。他们或借助政府的权威形成政治精英,或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成为经济精英,抑或凭借个人的人格力量以及借助于农村社会中正在复兴的各种传统力量来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活从而成为乡土社会的社会文化精英。<sup>⑤</sup>易言之,新时期我国的乡土社会逐渐形成了新的精英群体格局。他们会根据不同的身份和性质表现出对官方、民间利益的不同特点,比如他们有对官方负责的力量,也有代表民间草根利益的向下的力量,也有进行调和的中间力量,所以说,不同类别的地方精英对遗产的保护及遗产地社会的稳定会起到不同的作用。<sup>⑥</sup>另外在有文字和无文字的时代和社会,地方精英对遗产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就新村的政治结构与地方精英而言,村两委、经济能人与上访积极分子等都是对武夷山遗产及新村群体性上访产生影响的主要力量,他们因立场与情境的不同所扮演的角色也各有区别。

①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2页。

②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第141页。

③ 周建新:《动魄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 袁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29页。

⑤ 汪小红:《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启示》,《中国社会导刊》2006年第16期,第52页。

⑥ 彭兆荣、林亚端等:《遗产的解释》,《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6页。

### （一）村两委的多面性：挖路时的“躲”、拦访时的“泪”、分款时的“私”

如“挖路”事件所述，村民们情绪激昂地把“茶路”横腰截断以后，市镇领导第一时间赶到武夷山景区主入口，而此时村里的主要领导却迟迟没有露面。那他们去哪了？村民说他们都“躲”起来了。正如村民所言，此时的村领导确实是“躲藏”在村民们的身后，他们既没有出面阻止村民们挖路，也没有站出来替政府“说话”。这一现象生动地体现了地方精英群体之一的村干部的多重特性。首先，就“挖路”事件所分析的，村干部作为新村中的一部分，他们同样遭遇来自“狭路”与生产不便带来的诸多麻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是被武夷山遗产所“遗弃”的那大多数数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除了没有登场挖路以外，不太可能出面阻止其他村民来表达这种“声音”。其次，村干部的代理人身份又使其成为村落治理的负责人，虽说更多的时候是扮演无为而治的“撞钟者”或“守夜人”，但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维持村落社会的稳定秩序即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和责任。换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村里发生了影响社会稳定的事情，尤其是群体性突发事件，那么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很重大的，譬如会受到批评或不再受上级领导的信任等等。然而，有一种特殊情况，当村干部们没有出现在现场，对于事件的发生也“不知情”或“后知后觉”，那么他们的连带责任与风险也就变小了。总之，在村民挖路时选择“躲”起来就成了他们应对官民矛盾、村民“闹事”的一个惯常的策略。

但是有些情形是村干部们想躲也难以躲得住的，比如村民前后多年的群体性上访。因此，在村民上访期间，村干部都表现得较为积极主动。首先，他们一般是及时地把村民上访的消息汇报至镇里，然后与市镇干部一起对上访队伍进行劝说或拦阻。上访村民对于村干部们的紧随其后、竭力相劝并不感到意外。“这是他们的工作”，村民如是说。而且，随着上访次数的增多、上访经验的丰富，上访村民总结出：“要见我们的村长，要到镇里；要见我们的镇长，要到市里；要见我们的市长，要到省里。”确实如此，一旦村民开始上访，那些平时想见却不怎么能见着的上级领导就都会跟着上访队伍一起出现。所以每次当上访村民们一出发，村干部们也就要跟着忙活，更确切地说，如果难以阻止村民出发或让上访村民半路折回，那就要尽力阻止他们到达福



建省信访局；如果上访申诉报告已经送达信访局，那么村主干势必也要跟着上访村民一块进去叙说上访事由。简单而言，村主干们在上访这件事上不含糊，也没怠慢，如果不能以理服人，那就试图以情动人。村民林阿姨讲述了上访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场景。

在省信访局的门口，范德西，也就是新村的村支书，曾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深情款款地对她们上访村民说：“你们回去了，不要让我为难，我干不了这个村干部，我一回家就写辞职报告。”

如此诚恳的言语和行动并没有打动上访村民，因为在村民看来，村支书经常会做这样的表演，而其表演的手法和内容都很拙劣。“说了不当的，可回去以后，他还是照样当他的书记”。而且，在村民上访的过程中，他也未能给上访村民提供过任何物质和资金上的支持（对待上访的问题，村支书的不支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武夷山的其他村里就发生过村民上访，村领导给村民送快餐盒饭的事情，不过之后该村主要领导因此而受到撤职处分）。另外，村支书还是一个先己后人、私欲极强的人，在对待“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上，他总是在满足了自家及其亲属之后才来考虑其他村民，这一点体现在随后要叙述的“外嫁女”事件中；而且以他为代表的村两委也常常采用“截留”“世遗”补偿款的方式来为负债的村财政“买单”。这一点是村民们最为闹心的。因为村民所经历的上访过程十分坎坷，他们不仅为上访付出了诸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自己投入了活动经费。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以个人的付出来换取村民的集体利益。这也反映出新村上访的一个突出特点，亦即，与经济利益相比，家园认同才是村民们进行上访的最为内在的动力与诉求；同时，这也说明村民们的上访行为并非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而更是一种基于非理性的、道义上的行为。

通过村民的多次上访与福建省政府的“特殊”关照，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村民们最终争取到“世遗”补偿款、部分景区门票收入、山林确权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上访村民成了新村地道的“英雄”和地方精英，这是因为他们既保住了新村人及其后代子孙所赖以生存的“家园”（山林“确权”），也为新村集体争取到如此难得的“世遗”补偿款，而且这笔补偿经费并非一次性“买断”，而是随着武夷山景区门票收入的增加而逐年递增。所有这些都为新村集体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力量。然而，从中国的乡村政治现状来看，村集体组织带有一定的模



糊性,村主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事实上的村集体组织的代言人与代理人,因而村集体共享利益在最后也就变成了村主干来支配这些补偿款项。从新村后来的村落政治变迁来看,这些补偿款项的分配及其分配的原则等,对村集体组织与上访村民以及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外嫁女”事件、村民代表被打事件等都是这些影响的具体体现。总而言之,在乡村政治这一特定场域中,由村支书所代表的村集体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总是因场景不同而表现各异,支持或反对、有为或无为等等,不过都是他们所采取的策略而已。

## (二) 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的影响

从新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背景来看,新村从来就不是一个深居武夷山中的偏远落后的小山村,而是一个以茶叶生产为主、以粮食耕作为辅,具有一定商业基础的乡村社会。历来这里的茶叶生产与消费都很积极。回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新村人大多不过是为“岩主”做事的茶工或制茶师傅;至土地改革以后,他们在武夷山分得田地、茶山等,继而成为武夷山中土地的持有者、主人;到“以粮为纲”的年代和大集体时代,茶叶的生产与加工也一直是新村人的主要经济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与旅游发展更使新村人的茶叶生产进入规模化与商业化的发展之中,新村人由此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他们的身份也由茶工至茶农并演变为茶商。一方面,新村内几乎家家户户都拥有了自己的茶山,并置办了茶厂,有些已经自办茶叶企业,并申请自家的茶叶商标,另外有些茶厂则转租给外来的茶叶企业,这一点集中反映在村内鳞次栉比的广告牌。另一方面,茶叶的初制加工与手工制作逐渐减少(只有极少数的手工工具及技艺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保留的),而茶叶生产的机器化、规模化与商品化则已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新村成就了众多的经济能人和财富巨人,尤其是在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新村的茶叶经济与旅游收入更是获得了广阔的发展。“捧着金饭碗”是官方对新村今日经济生活的形象表述,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村民则认为他们是“捧着金饭碗”的“要饭者”。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一些村民这样认为:

我们村身处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按理说我们是手捧“金



饭碗”，然而，自我们村“世道”拆迁以来，我们的茶叶生产就受到了限制，旅游收入也有所减少，特别是景区封闭式管理的施行使我们深感不便。于是，我们不断地上访。我们之所以上访，一是要争取解决景区内茶山、林地的确权问题。虽然我们从景区内搬迁出来了，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对山林的确权。另外，景区管委会在管理、经营我们的茶山、林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遗产旅游，那么他们就应当支付一定额度的补偿款。这一笔补偿款则是上访的另一主要目标。

以此而言，新村的村民一方面已经过上富裕生活，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通过上访争取山林的确权和补偿款，也就是说，新村村民的群体性上访并非出于谋求生存之道或者为了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如上文所述，新村的上访村民中绝大部分都是经济能人，他们为上访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首先，村民上访的主要经费包括车旅费、申诉资料费用、律师咨询费等，基本上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腰包”，因而上访村民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较为简单。其次，由于新村的上访主要是为解决集体利益问题，为村集体的确权、子孙后代的生活考虑，因此他们的上访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参加上访的人数也逐次增多。就某种程度而言，新村的经济能人在上访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大多数村民眼中，他们既能大公无私，以自己的付出来换取集体的利益，也能以无畏的勇气来与官方、权威对话，这种精神使他们逐渐成为影响新村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重要力量。总体而言，他们不仅已经成为影响新村上访的重要力量，而且也逐渐成为与新村村两委、官方权威进行较量的地方精英与民间力量。

综上所述，新村的群体性上访至少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质：一是上访的参与主体以女性为主，她们试图通过社会所赋予的“女性/弱势群体”身份来与官方进行博弈。这集中体现在上述的三次上访中，上访群体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尤其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在上访村民看来，她们女性群体较为容易赢得官方和社会公众的同情，从而有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不过她们身后的男性也在上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只不过男性主要表现为一种“隐形”力量。

二是村民在上访的过程中采用了“事件问题化”的策略，诸如在上访前夕他们曾多次反复地前往市镇政府反映情况，以期引起地方政府



的关注；又如他们多次以集体的智慧凑成申诉报告，并把报告送往省政府、省信访办、省人大、省妇联等多个部门，从而把世界遗产地武夷山遗产的保护问题及新村的稳定问题推向上一级政府。

其三，与其他形式的上访如大河移民上访、城市居民上访等相似的是，新村村民上访的缘故也与拆迁有关，而拆迁过程中又都充斥着官方与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的权钱交易、腐败行为等。从上访的深层动因来看，拆迁及上访都是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后果之一，如大河移民上访是国家建设运动所引发的，新村上访则是在地方政府的“申遗运动”及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发生的；从上访的过程看来，上访与“拦访”相伴相随，而上访的结果则不尽相同。值得一提的是，新村上访的不同之处，主要反映在新村村民是以保护遗产为名，以谋求遗产归属与经济利益为目标而进行的多次群体性上访；与此同时，官方应对上访群体的态度与方式也因遗产的特殊性差异而有所区别。

#### 第四节 传统“斗茶赛”的接续与重构

如前述上访、确权等群体性行动所说明的，地方民众正在运用国家预留给农民的诉愿机制、非正式的权力手段与方式来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通常被认为是影响世界遗产地社会和谐的不良因子，正因为如此这些声音的发出者也由此被贴上“刁民”、“闹事者”的标签，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地方民众与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之间形成了某种“对立”的关系。但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民众并非总是以群体“闹事”的方式来对待其与世界遗产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也会运用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来挖掘、发明或接续传统文化，既可以用之发展遗产旅游，也可在“发明的传统”中重构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下文将透过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斗茶”习俗的现代演变和新村“斗茶赛”的举办历程，以说明新村村民在运用世界遗产的身份与名片、地方政府的遗产旅游政策等进行文化传统的接续或“发明”，并试图在此过程中重塑其文化认同和族群意识。

武夷山“斗茶”的历史悠久。斗茶，又称“茗战”、“点茶”或“点试”，即通过烹制茶汤，品尝茶叶，比赛茶的质量和烹茶技术。斗茶之风始



于晚唐的福建建安,兴盛于两宋。<sup>①</sup>据考,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一诗中,对武夷茶的斗茶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可欺,十目视而十手指。”<sup>②</sup>这说明当时的斗茶首先是选拔“贡茶”的方法,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文人雅士以及朝廷命官喜好“斗茶”,并以斗水品、茶品、诗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为内容,其盛况可见一斑。宋人唐庚的《斗茶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之水烹之,而次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闻人其所赏宜尤高,而又第之,然大较皆精绝。”<sup>③</sup>需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斗茶活动主要是指地方官吏为博取皇室欢心而到处搜茗斗茶。至南宋,斗茶之举才开始普及于名茶产地及寺院,后渐入民间。赵孟頫的《斗茶图》所描绘的正是南宋至元代时民间进行斗茶的盛况。<sup>④</sup>明清时期,我国古代或传统茶业、茶学达到鼎盛,并逐渐由极盛走向衰落。同时,饮茶和茶叶加工技艺不断革新,而斗茶的习俗却早已融入民间社会,成为武夷山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武夷山茶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等逐渐成为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旅游资源。随着大规模群众旅游的开始,武夷山以传统的斗茶习俗为基础,推出了不同种类的节庆、仪式,如“武夷岩茶节”、“武夷岩茶茶王赛”、“武夷山民间斗茶赛”等等。尤其是,在武夷山登录世界遗产名录之后,武夷山茶文化及“斗茶”传统更是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不仅成为外来游客体验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对象,而且还被接续甚或建构为武夷山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1990年10月1—2日,第一届“武夷岩茶节”由南平地区行政公署、武夷山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至1998年,武夷山共成功举办五届岩茶节,为武夷茶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武夷山的旅游开发做了积极的宣传。1999年11月8日,为配合武夷山的旅游宣传和世界遗产的申报,

① 巩志:《中国贡茶》,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②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范文正公集》。

③ 杨东溥:《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④ 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由武夷山市人民政府主办、新村镇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武夷岩茶茶王赛”在九曲溪溪畔举行。茶王赛不仅组织了茶艺茶道表演,还在武夷山茶厂、茶商、茶农间进行了茶品评比,评选出肉桂王、水仙王、品种王、名丛王等系列。<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初武夷山着手申报世界遗产地,历经10年的整治和管理,1999年12月,武夷山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屈指可数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名声大噪,而位于武夷山内的新村也由此备受瞩目。新村村民曾散居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内,并以茶叶的生产、制作为生。在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新村因其整体搬迁而被授予“特别贡献奖”,并由此被誉为“武夷岩茶第一村”。随着武夷山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其文化遗产资源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新村也尝试运用武夷山世界遗产的特殊身份、文化符号与象征资本,来开展茶文化旅游。2000年7月27—30日中国武夷山茶文化节暨“凯捷杯茶王赛”在新村举办。据《武夷山志》的记载,此次茶王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叶界知名人士、茶叶专家、茶叶经销商和慕名而来的游客等1000余人参加<sup>②</sup>,一时间,新村成为武夷山茶文化的代言人。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观看到武夷山传统的茶艺茶道表演和“茶王赛”,而且可以通过参观茶书画展览、参与茶业发展研讨会、进行“茶之旅”及茶叶贸易等形式来了解武夷岩茶的历史文化与传承现状。从这方面来看,武夷山的“斗茶赛”已初具规模,并且逐渐被打造成一项与遗产旅游相结合的地方文化产业。同时,此次“茶文化节”既向外来的客人弘扬了武夷山源远流长的茶文化,也使新村村民在茶文化节的仪式展演中强化了他们与武夷茶的关联,加深了他们与武夷山遗产之间的历史联系,同时,基于地缘、业缘与物缘<sup>③</sup>关系的文化认同也在此过程中得以重构。从这层意思来看,武夷山遗产本身也构成了新村村民文化认同的因素和内容。

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认同”(identity)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① 黄贤庚:《佳茗飘香》,附录。

②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2页。

③ 物缘,是以物为媒介、为纽带而聚拢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对特定的物的共同爱好和情感基础上的。引自林其敏、吕良弼主编:《五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我是谁？我群(the Self)与他群(the Other)是什么关系？个体与群体归属感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族群是一个描述性概念，其范畴可大可小，既可以是文化意义上的人群共同体，也可指政治层面上的人群共同体，可以说，“族群是内核稳定、边界流动的意识共同体”<sup>①</sup>。族群认同是族群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人们与不同起源和认同的人们之间互动的产物<sup>②</sup>，也可以说，族群认同与族群意识、族群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族群认同既是原生性的，也有产生于具体情境中的，前者被人类学者视为“原生论”(primordialist approach)，这种认同是族源性的，是构建于人们对于他们具有共同世系或起源的信念上，是亲属认同的一种延伸或隐喻，不具有选择性；而后者被称为“工具论”(instrumentalist approach)或“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 approach)，是在具体情景中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其与利益和资源配置有关。当前的研究倾向于把这两种族群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因为族群认同一方面是基于情感上的、非理性的、象征性的自我肯定的延伸，而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来，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这种原生的情感与象征资本在利益、权力等条件的刺激下有可能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族群认同存在于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sup>③</sup> 易言之，族群认同在自我与他者的结构关系中、在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下已经超越“原生纽带”和“情境论”，而呈现出多重性与层次性。

具体到新村村民，他们的祖籍大多是江西、浙江等地，那么对于祖籍地的记忆与认同是情感上的或者说“原生性”的。一些江西籍的村民告诉我，他们年纪稍大的人一般会每年回江西祭祖，江西老家的族人也会来武夷山找他们捐款、修族谱等；对于出生于武夷山的第二代、第三代及之后的村民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是祖籍江西的武夷山人，生于斯、长于斯、栖于斯，与武夷山的关系既有情感上的，也是地缘、业缘与物缘基础上的，他们的族群意识与文化认同既来自于“原生性”的情感，也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具体情境中的选择。换言之，新村的先民虽

① 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②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

③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346页。

是迁入武夷山的外来移民,但他们及其后辈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武夷山为地缘、以武夷茶为物缘、业缘的文化认同,并且已经成为武夷山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武夷山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与管理过程中,他们的族群意识与自我认同受到了当地政府与遗产管理方的“质疑”。“人民需要认同,但有的时候,某一群人的认同往往又对另一群人的认同造成伤害”<sup>①</sup>,尤其是在遗产运动的背景中,对遗产的认同也成为一种被解释、被表述、被“设限”的主题,这一点已在上文中有所提及,需要补充的是,也许正是因为有“他者”的质疑,新村的村民们更需要通过某种途径,来强化他们与武夷山的联系,重塑他们的身份认同。“斗茶赛”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景。

如上所述,首先,斗茶是武夷山文化遗产中一项重要的历史传统,与武夷茶、武夷山的茶农一同构成了武夷茶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次,新村自建制以来都与武夷茶密切联系在一起,早先来武夷山的祖辈要么是当茶工,要么是做制茶师傅,要么就在茶厂帮工谋生,后来有些举家迁入武夷山,历经土地改革分得田地、茶山,至今,新村村民家家都做茶,家家都有茶山,他们是今日武夷茶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因此,新村在运用武夷山世界遗产的特殊身份、文化符号与象征资本的同时,还结合了武夷山发展遗产旅游的需要,先后在新村举办数次民间“斗茶赛”,从而使斗茶的传统在新村的这一方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

其实,早在2003年,新村曾举办过小规模斗茶赛,以此来推动茶业和旅游业的继续发展。至2006年6月“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武夷山茶文化进一步引起了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其后,武夷山市政府做出决定,将把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此来扩大武夷山的世界影响,实现武夷山旅游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sup>②</sup>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地

<sup>①</sup> Peter Howard,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pp. 17-18.

<sup>②</sup> 《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山资讯》2007年第1期,第7页。



方政府在申报遗产的过程中加强了与武夷茶文化之间的关联，并逐步将其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之中。此外，武夷岩茶申报世界遗产的实践又一次让新村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武夷岩茶的历史悠久，蜚声中外，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她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民族认同的象征。而自近代以来，武夷岩茶的传承与保护更是与新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连，新村被冠以“武夷岩茶第一村”的称号，数位村民还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在这一背景下，新村于2006年6月6日至7日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斗茶赛。相比往年，这次的规模有所扩大，参与的茶农和参选的茶样有所增多，斗茶的时间也有所拉长。从“斗茶赛”的活动安排来看，新村内部茶农之间的斗茶、评比仍是当年最为主要的活动，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2007年7月18日，新村举办了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民间斗茶赛，这次的参与者几近2000人。这次斗茶赛共迎来了67户茶农的参与，共有大红袍、水仙、肉桂等101个茶样参选，其影响力和热闹程度又一次胜过往年。新村的“斗茶赛”也逐渐呈现出规模化、程序化的趋势，并受到武夷山市政府、武夷山景区管委会、武夷山市茶业局等行政机构以及新闻媒体等的支持与关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驻足。2008年6月18日，新村村民又一次迎来了斗茶赛，参与其中的茶农和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多，其影响力日趋增强。

2009年8月18日至21日，新村举办了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民间“斗茶赛”。主办单位为新村“斗茶赛”组委会，其成员包括新村村两委的主要领导；协办单位包括武夷山市政府、武夷山景区管委会、武夷山市茶业局等单位，参与的主体仍是新村茶农，不过也有不少游客和外来的爱茶人参与其中。“斗茶赛”采用的是开放式的报名，凡有意参与的茶农都可报名参加。按照村里的约定，一般是1户茶农提供1个系列的4种茶样进行评比，同时，各茶农预先提供22斤茶叶，其中2斤用来参与斗茶，待斗茶活动结束后，另外20斤茶叶则既可用来自售，也可自家留用。此次“斗茶赛”的开幕式正式且庄重，武夷山市政府、茶业局等单位的领导都纷纷到会祝词；从开幕式结束至第3天的主要活动就是泡茶、斗茶，从上午8点30分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期

间仅休息 1 小时,而评委也以新村的茶农为主。泡茶地点设在新村与景区入口之间的空地上。“斗茶赛”最后一天的活动则主要是进行颁奖仪式和茶叶拍卖。<sup>①</sup>虽然上述“斗茶赛”的活动仍以泡茶、斗茶为主,但其已经附丽了诸多的现代元素,如旅游产业、茶业贸易、经济资本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斗茶”习俗在现代旅游与遗产保护运动的共同推动下,逐渐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斗茶赛”。

事实上,由于新村的“斗茶赛”是在遗产保护运动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背景中进行的,由此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化就成为可能,而现代的“斗茶赛”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斗茶的几个特质。首先,“斗茶赛”是在接续传统斗茶习俗的基础上被重新梳理和建构的。之所以说是传统的接续,如前所述,斗茶的习俗确实在武夷山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民间斗茶、品茗自唐宋以来已经普遍出现在武夷山地区,“斗茶赛”的传统性即在于此。但时至今日的“斗茶赛”与传统意义上的斗茶习俗之间的差异分明,因为新村所举办的“斗茶赛”是在遗产旅游的催生下、以迎合游客为潜在目的的商业行为,也是当今“遗产产业”的生产方式之一,更是文化传统的再生产。因而,“斗茶赛”不仅仅是传统斗茶习俗的接续,而且结合了现代旅游和茶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武夷山市政府、景区管委会、地方文化精英等影响下被建构成武夷山茶文化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名片。这从前述“斗茶赛”的规模日趋壮大、成为武夷山市政府“茶旅开发”项目的重要内容等看出。

其次,日趋规模化的“斗茶赛”为武夷山茶农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和茶叶利润,同时,也使茶农们在与外来游客、商人等的交流过程中产生了更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从“斗茶赛”的举办过程、内容及影响等方面来看,“斗茶赛”是在新村村民对世界遗产的符号、话语、资源以及官方的遗产话语等进行吸收、消化与运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村民们对待世界遗产的一种表述方式,也是他们所经历的“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sup>②</sup>过程。同时,“斗茶赛”还凸显出新村村民与武夷

①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

② Philip Thomas, "Conspicuous Construction: House, Consumption and 'Relocalization' in Manambondro, Southeast Madagasca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98, Vol. 4, No. 3, 转引自范可,《“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开发时代》2005年第2期。



茶的亲缘关系和历史联系,并且村民们的凝聚力、地方感和认同感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强化。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村民们积极踊跃地参与“斗茶赛”上。

自新村举办“斗茶赛”以来,村民们大都会积极参加斗茶赛事,“一是可以在斗茶赛中喝到上等的好茶,二是让自家的好茶参与评比,并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一想法与做法也反映了大部分新村茶农对“斗茶赛”的态度。

再次,在传统斗茶、评比的过程中,一般都是“以茶论分”,以茶叶的品质来评比,但是在现今的“斗茶赛”中,有些茶农则会为了使茶叶的身价有所提高,力图通过他们的人情面子或其他形式来为参选的茶样进行“拉票”,并使其茶样获得“某某茶王”的头衔。由此来看,“斗茶赛”虽是以传统斗茶习俗为基础,但其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思想观念等都已经发生诸多改变,尤其是在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申报国家遗产、世界遗产的进程中,“斗茶赛”的举办更成为复兴乃至重构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举措。而其中,政府政绩和旅游经济是“斗茶赛”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动因。

## 小结 遗产权属的变更与地方民众的回应

在时下的遗产运动中,现代遗产所挟裹的权力已经使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了分离,遗产的主体发生了分层,遗产地民众已然不可能成为遗产的唯一主体,他们也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把“私义”的遗产变为“全人类”的遗产,以求在遗产保护中“被赋权”,并参与遗产保护。从新村的个案来看,在武夷山的“申遗”与保护运动中,新村村民被迫搬离故土,其与武夷山遗产的关联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主”而“客”,譬如他们进入武夷山景区内劳作需办理通行证,需接受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的检查等。在此层面来看,新村村民的身份变迁预示了武夷山遗产权属的变更。而由于遗产是延续传统文化的载体,是遗产地民众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她的这些特性使之又具有神圣性与不可让渡性。需要强调的是,武夷山在成为世界双遗产地之后,其遗产区域内的土地、山林等资源多数仍属于当地村集体所有,其中新村集体所有的面积约占武夷山景区遗产总面积的80%。那么,一方面是世界



遗产地,另一方面又是归属于村集体的土地、山林等,二者如何协调,这不仅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而且还考验着官方与民间、遗产管理者与遗产主体之间的互动,更为当下进行的遗产保护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当遗产的权属遭遇“变更”时,新村村民做出了他们的回应。

如前所述,新村在历经“三访”与“面呈领导”之后,世界遗产带给新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逐步化解,山林“确权”提上地方政府的议程,景区管委会支付的补偿款也于2007年开始进入新村。正如新村某驻村干部所言:

随着新村与景区之间的矛盾较为妥善地解决后,村民与村集体之间、村民小组之间以及村民内部之间的矛盾又逐渐呈现出来。总的来说,这些不同层次的矛盾主要出自“世遗”申报及拆迁安置与补偿的政府行为。由于一些不明确的利益关系与利益分配导致了矛盾的浮现。客观来说,新村拆迁以来其直接利益是受到损害的,表现在生活空间变小,生产距离拉大,生产成本提高;不过,村民的住宅与交通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sup>①</sup>

综上所述,新村村民的三次上访并未能使山林“确权”得以顺利解决,但是,正是在运用群体性上访等权力技术与方式之后,他们的声音才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通过上述前后多次的上访以及“中国式的请愿”的艰辛历程,新村村民终于获得景区管委会的补偿款,以及为山林“确权”找到了破解的途径。据了解,2008年4月景区管委会最终与新村村集体协商决定将景区内8万亩的山林按照“两权分离”的办法,即景区范围内的山林所有权归村民,使用管理权归景区,实行有偿使用,使困扰景区管委会与村民的山林权属问题得以解决。<sup>②</sup> 据此,景区管委会每年向新村村民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款。在群体性“闹事”、多次上访之后,村民们终于获得一定的回报,山林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新村,景区封闭管理被推迟,一定数额的补偿款入账村里,村民可以自由

① 与新村驻村干部刘贵印的访谈,2008年9月27日。

②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



出入景区等。他们说，“幸亏我们去闹一闹，要不然什么都拿不到”<sup>①</sup>。自此，村民与景区管委会的关系终于有所缓和。不过，村民对于他们与景区管委会的关系走向并不看好：

如果他们对我们村民进入景区再苛刻，那又会引发新的问题。在1998年至2004年之间，景区管委会对我们很苛刻。2004年之后，我们通过上访，他们对我们好些了。不过到景区正式封闭的时候，我们也不懂得今后的路会怎么样，总之还是会有新问题出现的。<sup>②</sup>

此外，从“确权”等事情的解决方式来看，上级领导的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权力技术，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就此而论，这也是村民在苦苦寻求的一种中国式的解决方式。不过，2004至2008年期间，他们曾多次试图向来武夷山视察工作的国家高层领导请愿，抑或是通过打电话给新闻媒体等方式来反映问题，从这方面来看，村民们也在尝试运用诉愿机制以外的现代传媒等途径来发出声音。

“要见我们的村长，要到镇里；要见我们的镇长，要到市里；要见我们的市长，要到省里”。这是村民们津津乐道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们试图影响地方政治而采取的非正式的权力技术。其实，在“世遗”拆迁以前，他们对于村里的大事极少关注，而且，那时候大家都是“各忙各的生产、各做各的茶叶”。不过，2004年开始情况就有所变化，为了山林“确权”，为了子孙后代，他们认为村民必须团结起来去政府反映情况，而且还必须在村里找寻能代表村民利益、向上反映村民诉求的村领导。从2006年的村民选举来看，这些已经远离政治的村民们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他们并不是如同以往那样随意处置选票，而是很慎重地填写自己支持的对象，因为他们渴求一位充满正义感、能代表村民利益的村长。下文关于村民选举的讨论将进一步讨论村民们对待村落政治事务的态度及其演变。

① 与新村村民陈瑞的访谈，2009年3月10日。

② 与新村村民赵丽颖等的访谈，2009年2月23日。

## 第五章 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重构

2007年1月中旬伊始,新村迎来了两件大喜事:景区内新村范围内的茶山、林地的所有权最终确权给新村集体(虽然确权证至今仍未发到村里);同时,景区管委会则需为其使用与经营新村集体所有的茶山、林地而支付“世遗”拆迁补偿款及景区有偿使用费。由此,新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关系在确权与补偿款问题的解决下得到缓解,不过世界遗产对新村的影响却并未就此停步,而是随着“世遗”拆迁补偿款与景区有偿使用费的分配,以及世界遗产所潜藏的政治与权力话语,进一步对新村的村落政治产生影响。

本章将通过对“外嫁女”事件、村民选举等事件的细致描述,来说明,在遗产运动的特定场景中,新村村民随着“世遗”拆迁、“世遗”补偿款的发生发展,他们的认知观念、价值理念等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民间力量的壮大及其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也是地方民众在应对世界遗产的话语逻辑与权力政治等时所做出的调适。从下文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村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经济能人与上访积极分子之间的某种交叠与重合促成了新村新的地方精英的成形,而这些力量与国家正式权力的代表——村两委,又都试图通过各种权力技术与方式来影响村庄政治,并日渐形成一定的“张力”。他们之间的竞争与博弈又必将对武夷山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如村民保护意识的转变、遗产地社会的稳定问题等。



## 第一节 “世遗”补偿款引发的村落纠纷： “外嫁女”事件

### 一、事件原委

2008年9月5日，新村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张夸梅作为村民代表参加了当天的村民代表会议。会上，她对村支书提出的分配方案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并建议由全村户主投票来决定该方案。会议结束后，她留在村委办公楼食堂吃饭，突然五个妇女直接冲到她身边，要求其在补偿款的分配方案上签字。当她拒绝签字后，遭多番殴打，随身携带的钱款也被人抢走。而更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是，当她奋力跑下楼时，却发现办公大楼的大门竟然已经被锁。而且，在她被打的过程中，其他村民代表却无人向前劝架或拦阻。

张代表回忆了当时的具体情形：

那天上午我去参加村民代表会。当时村支书提出外嫁女及其儿子参与补偿款分配的问题，要我们村民代表当场举手表决。我们觉得这个钱应该由村民户主签名来决定，如果大家都同意了，我们村民代表也没意见。我们二三十个人怎么能够做主呢？不过，村支书要求我们当场举手表决，但1000多号人的东西我们怎么能答应呢？我们以前分钱都按方案来分，这个方案既可以走法律程序也可以拿来投票。当时我们对这种方案进行了表决，同意从法律程序走的有20票，另有14票赞成让户主去投票。

中午12点半左右村支书叫散会，我就和几个村民代表一起到食堂去吃饭。我一碗饭都没有吃完，那些外嫁女就闯了进来，逼着叫我签字，我说我做不了主，她们就开始打。打到第四场她们还要叫我签字，我说打死也不签。当时有三个女的，抓着我的裤头，从我裤袋里抢走904块钱。这些钱原本是我准备在开会以后去旅游社交的，因为几天之后我准备带我妈妈去北京。

这场突如其来的打架事件又一次让新村躁动起来,新村的稳定问题又一次引起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以及地方民众的普遍关注。村民之间的打架斗殴事件在新村的历史上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反映出现的新村积弊太多,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sup>①</sup>从这场打架的外显特征来看,农村妇女之间的争吵其实并不少见,也见怪不怪。但是,如果将打架双方置于世界遗产地武夷山的新村这一特定场域来审视,这一事件显然并非如此简单。就发生的时间而言,2008年的新村自“世遗”拆迁至今已近10年,村民的生产生活正在从转型、变动走向稳定。与此同时,村民通过一系列的上访行动或者说“依法抗争”,为新村赢得了山林的确权与“世遗”补偿款,以及进入景区生产劳作的优惠政策等。一方面,山林确权的协定已经以武夷山市政府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下来;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景区管委会所支付的“世遗”补偿款也已经陆续进入新村。从下文的分析可知,“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是引起“外嫁女”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当事双方来看,一方是村民代表,另一方是外嫁女代表,平日里她们之间既无私人恩怨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如果说她们之间存在分歧或意见,那就是双方对于“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持有不同看法。按照新村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意见以及村规民约的约定:1998年以前,户口一直留在村里的外嫁女,或外迁户口在2004年以前(以“挖路”事件爆发的时间为界)因故回迁至村里的外嫁女,或者嫁入村里的女性同时持有结婚证与本地户口的,每年都可享受到一定数额的补偿款;而2004年以后迁入村里的外嫁女及其家属则不能分到补偿款。<sup>②</sup>从新村户口的迁移情况看,自2004年开始,回迁户口的外嫁女在逐年增多,而外迁的则越来越少。由此,外嫁女的回迁问题日渐显现,而她们的回迁动机与目的更是遭到大部分村民的质疑。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村民小组及村民代表已经成为乡村政治结构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尤其是2006年的换届选举(详见下文)以来,新村的村民代表实现了一次较为全面、彻底的革新,新的“民选”代表纷纷涌现,一些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或其他地方精英“高调”步入新村的政治舞台。之所以称其为“高调”,一是在村民看来,这些民选代表的为人大多较为正

① 与新村村民黄献奕夫妇的访谈,2009年3月19日。

②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9年3月8日。



直、正义,敢于表达不同意见;二是他们的家庭大多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三是虽然他们在“世遗”拆迁前对政治生活并不太关心,但后来大多积极参与到上访等行动中,主动为村集体谋取福利,因而他们在当地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此,有必要对新村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进行简要分析。

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民会议的一个常设机构,它代行村民会议对重大村务的审计、决策、监督、立规和评议等权力。<sup>①</sup> 吴毅通过对川东双村的考察,指出双村的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与村庄党组织和村委会组织在人员构成上具有同一性,绝大多数代表都是村组干部,少数非干部代表则是一些较有影响力的党员。<sup>②</sup> 确切地说,他已经关注到村民代表与村两委干部之间的微妙联系,对“民选”村民代表等新的民间权威的阐述却较少。

就新村来看,2006年以前的村民代表基本上与村两委干部具有一定的重合性,或者说那时的村民代表主要是村两委干部在村民中的“代言人”,而并非完全代表村民利益。“以前的组长(村民代表)不是选的,也不是任命的,因为我们都忙着做茶叶,谁也没空去当,所以那些不爱做事、与村干部关系又好的人就当上了代表”<sup>③</sup>。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民意难以上传,国家政策下传给村民则更为滞后。新村村民认为,1998年“世遗”拆迁的消息来得突然,主要原因就是那时村民代表与村干部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在整个拆迁过程中,也是由于他们难以代表民意,因而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出现的诸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化解,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村民肖晓雨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组长和代表也很关键,有些事情在会议上要代表我们提出来,会议后又要传达政策给我们,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以2006年产生的村民代表为例,在全村的20余位村民代表中,村组干部1个,党员2个,其他村民代表既非党员也非村干部。这反映出新村的村民代表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基本上实现了“民选”,一些经济能人与上访积极分子纷纷出任村民代表,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敢于表达不同于强势权威的意见,对村民自治与村民民主的认识逐渐提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

①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第215页。

② 同上。

③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陈瑾的访谈,2009年3月21日。

村民代表与村支书及其外嫁亲属等对于“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中。

在商讨“世遗”补偿款的分配原则与方案的过程中,村民代表与外嫁女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凸显。对于外嫁女之所以把矛头直指张代表,一些村民是这样认为的:张代表为人正义、讲话直率,在村民代表会议上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而她这些耿直的性格却让外嫁女、村干部等有些恼火;另一些村民则认为张代表话太多,过于张扬,才引来这场祸事。但村中某干部并不完全认同上述看法,而认为张代表被打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从新村的的社会结构与姓氏分布来看,陈姓的人数最多,虽未形成完整的宗族组织,但陈姓家族已经以血亲与姻亲为纽带连结成了一个较为紧密的网络,在村中的影响一直都比较较大,所以一般会有人与陈姓人及其亲属“较真”。而相比之下,张代表的家族在新村的影响较小,其家庭内部也不和睦。其二,张代表还是上访积极分子,在村领导看来,她的言行已经对他们的工作业绩产生负面影响。<sup>①</sup>从上述三种说法可以看出,新村村民对“外嫁女”事件的关注程度,由于各自立场不同,对于此事的处理态度截然相反,村中的上访群体对于张代表被打的事情非常关注,她们支持张代表把此事上诉至镇政府等,并要求公安机关对肇事者进行拘留或罚款;另一些村民则对张代表的态度漠然。

回到事件发生的当日,在张被打的过程中,虽在场的村民代表与村干部都没有向前劝阻,但有村民偷偷地报了警。随后,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当张的丈夫得到消息时,他正在茶山做农活,赶回村里时张代表已经受伤严重。之后张代表被送往医院。

9月20日张代表回到新村。她被送往福州某医院接受检查,结果是头部与腰部受伤较重。住院疗伤一段时间以后,她待身体有所恢复便回家来休养。当日新村村支书与村长一起到家里探望她。他们来的目的有二:一是代表村民向她表示慰问,并给她送来慰问金;二是来询问她对被打事件的处理意见与态度。等两位村干部离开之后,张代表的几位朋友纷纷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她们的讨论至少表达出四层意思:其一,村里(指村两委)给的慰问金太少,说明他们的诚意不

① 与新村党支部副书记邵胜利的访谈,2009年3月16日。



够；其二，张被打这一事件是有人预先策划好的，而且外嫁女与她们都是相互认识的，可以肯定的是，外嫁女出手伤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分享“世遗”补偿款；其三，这一事件与村支书有着某种隐晦的密切联系；其四，虽然村支书的姐姐及姐姐的媳妇的姑子都拿到了补偿款，但是由于2006年村民代表换届之后，张夸梅与黄薛妹等当选代表以来，没有与村支书“站在一条线”上，因而村支书开始采取行动与她们这些“正义的”村民叫上板了。比如村里曾经打算截留两年的补偿款共计260万元来偿还村财政的欠款，而这一要求遭到了张夸梅等村民代表的坚决反对。在她们几个村民代表看来，村里的财务状况极其混乱，收支去向不明确，无记录，而这些补偿款是新村村民通过艰苦的群体性上访在省府门口“静坐”得来的，决不能允许有人随意处置。不难发现，“外嫁女”事件的发生发展其实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利益的纷争，而且也是一场潜藏于利益背后的地方权力之间的较量。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正式权力与新兴的村民代表、经济能人、上访精英等民间权力之间的冲突逐渐浮出水面。他们之间的较量不断地展现在村落政治的“剧场”舞台上，这又集中体现于村民代表的换届选举、“民选”村委等重大的村落仪式性场景中。

## 二、到市里“讨说法去”

由于距打架事件的发生已经一个月，而肇事的外嫁女依然“安然无恙”，处理结果也迟迟未能出来，因而在10月初，新村部分村民决定集体去市政府为张代表“讨个说法”。10月6日早上，张代表和丈夫、兄弟、儿子等亲属，以及新村村民五六十人冒雨来到武夷山市政府。笔者以观察者的身份亲历了整个上访过程。

那日武夷山的气温骤降，大雨滂沱。笔者随房东以及张代表等人坐上公交车前往市政府。下车后，我们看到市政府门口已经聚集着三三两两的新村村民，随后村民越来越多。有人打听到，按照上访的程序，她们要先去市信访办，然后再来市政府。市信访办的办公楼在市政府的对面，于是大家一起走向市信访办。今日接访的市镇领导包括某副市长、某镇领导等四位，按照信访制度的规定，张代表及其家属、肖晓雨、黄夸梅等七位村民代表其他前往的村民，与市镇领导进行面对面的交谈。笔者进入会场旁听了整场对话。双方的交锋持续近两



小时,讨论的主要话题包括张被打的经过、原委及处理意见等。

首先,张代表的亲属详细介绍了张被打的经过,指出张代表作为军人家属被打、被羞辱、被抢钱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希望公安机关尽快对那些肇事者采取必要行动。随后,张代表本人又一次讲述了其亲身经历,强调她是为村民的集体利益而招人殴打,并特别提到新村村支书的两个妹妹是整个打架事件的指使人和参与者,希望市政府能予以回应。其后,会议秘书首先代表市领导发言,指出通过法医鉴定张的伤势,判定该起打架事件并不构成刑事犯罪,而是一起社会治安事件。这一说法立即遭到村民代表的强烈抗议。经过双方激烈、紧张的话语交锋,最后接访的副市长依据事件的影响及民意的要求,提出市政府会尽快把这一事件转交至武夷山市公安局。张代表等人基本同意上述建议。从信访办出来,她们接着又去了武夷山市武装部。<sup>①</sup>

### 三、出乎意料的结果

事实上,新村部分村民为了张代表与外嫁女之间的冲突事情前后三次到过市政府反映情况,希望公安机关能介入此事。但是,事件的处理结果竟然是张代表在新村财务室领到5万余元包括误工费、医药费在内的补偿款。令人费解的是,这一笔补偿金竟然是出自村民上访而来的“世遗”补偿款,而那些外嫁女却分文未出。需要说明的是,在张代表被打期间,一些未能分到“世遗”补偿款的外嫁女以新村分配“世遗”补偿款不公为由曾向上级司法机关“状告”新村。外嫁女与新村之间一共进行了两场官司,为期三年,村长都有去应诉,但未专门请律师辩护。在官司进入南平地区法院“二审”的时候,法院判定新村向村里的外嫁女支付“世遗”补偿款。关于这样的处理结果,张代表等村民认为,这是村领导故意为之的结果,因为一是村主任做事没有主见,为人胆小怕事;二是那些外嫁女大多与村支书有着亲属关系。对于经过多番周折得来的处理结果,张代表等人愤愤不平。虽然拿到了一定的补偿金,但那些肇事者仍没有受到惩罚,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令那些上访积极分子意识到民间力量的弱势、村民目光的短浅、集体感与正义感的缺失,由此她们关注村务、参与村落政治的热情和信心受到

<sup>①</sup> 笔者田野调查资料,2008年10月6日。



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 四、影响

自“外嫁女”事件发生以后，村民对此颇有感慨。张代表为了村集体的利益招此祸端，但令人感伤的是没有村民敢站出来解围，也就是说，大部分村民虽然了解事件背后的原因，但过于畏惧强势。另外，从这一事件的处理结果来看，村支书及其外嫁的妹妹等人还是受到了特别保护，而上访积极分子虽已经为村集体谋取了诸多利益，但是其行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对此，黄夸梅说：“那以后如果继续为集体的事情去上访，去反映情况，去与村领导对着干，那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她的顾虑反映了大多数上访积极分子的心态，她们开始重新考虑为集体“出头”的事情。由此可见，新村的维权群体已经在思想上受到重创，不过这样的结果也许正是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值得一提的是，新村的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等民间力量虽然逐渐壮大，但是与村支书所代表的正式权威相比较而言，他们的力量及影响力仍相当有限。不过，力量上的悬殊并不影响民间力量对新村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发挥作用。民间力量与村两委之间的较量集中反映在新村三年一次的村民选举中。

### 第二节 村民选举中的权力展演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该组织法于1998年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我国农村的政治结构随之发生重大改变，集体化时代的生产队及其大队支部委员会所代表的一元化政治格局，逐渐被村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共同形成的政治结构所取代。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试图通过施行村民选举的方式来达到村民自治、村民民主的愿望，这一点也是村民们常说的，“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中央是真正在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从实际的操作层面来看，村民选举正在成为影响地方村落政治、村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动因，而其影响力的强弱与国家的经济政策、村民们的经济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易言之，村民选举并非从一开始就受到村民们的热捧，而是与村民的经济状况、村落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村民选举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背景下开始施行的。这一时期的经济生产以家户式的个体经济为主,土地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分到各家户,各家户则要缴纳农业税、“三提五统”等给国家。在此背景下,村两委的角色与作用有所改变,他们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村干部们由集体化时代与村民共同劳动、共享利益,演变为代表国家征收农业税等税收的干部,他们与村民们的关系则随之变为征收与被征收、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然而,对于村民们而言,村干部们的权威与影响力却在逐渐减弱。因为,自个体生产以来,各家户之间以及各家户与村集体之间的联系都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减轻农业负担、发展经济则成为各家户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此而论,对于村两委的选举,村民们认为“谁当都一样,反正搞好自家的生产才是最重要的”。不过,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税的废止,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增收成为可能,村民与村两委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村民们的自治意识与民主意识也在国家的“普法下乡”政策下得以强化,“选举自己喜欢的人当选村干部”成为今日村民们参与村民选举的主要心理,不过这种想法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具体到新村,除了上述宏观方面的经济背景以外,自80年代以来村民们对于村民选举的关注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实行村民选举的初期,村民们参与投票的热情较低;进入1998年以后,“世遗”拆迁所带来的得与失让村民开始意识到村干部的重要作用,在此后的选举中,他们对待选票的态度有所转变,由随意处理选票变为“选择自己喜欢的人”、“可以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的人”(前提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2006年与2009年的两次选举进一步说明村民自治意识与民主意识的增强,村落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迁已经成为新村在遗产运动背景下发生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表征。这种变化也阐明,遗产运动不仅引起了村民认知观念、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变化,也进一步影响到村落的内部结构关系及其应对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回应与调适。

### 一、2006年的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与村委选举的“台前幕后”

如第三章所述,新村是一个结构松散、文化多元的复姓村,其家族组织的特性不明显,民间力量弱小,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党



支部与村委会一直都是新村政治结构中的主要力量。不过,当新村在经历“世遗”拆迁、2004年的集体“闹事”、上访之后,新村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也随之发生改变。从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地方精英等民间力量正在以新的形态出现在新村的政治舞台上,并与村两委形成了某种“张力”。双方力量的协调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遗产运动嵌入地方社会后,村民生活的政治化倾向日趋明显,如村民之间的纠纷内容已经不再只是土地问题、水利灌溉等问题,而且还包括“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等,而解决纠纷的方式也由内部调节转向司法解决,上访成为“民告官”的常见形式等。由此观之,遗产地社会的人地和谐、“地方感”、集体记忆等日渐消弭于这场全球化的遗产运动中,散失于模式化的遗产保护模式与权力话语中,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缺失又在很大程度上使地方民众不得不去寻求新的途径来重新确认与重新建构他们的家园感、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

2006年新村的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及村民代表等迎来了三年一届的换届选举。一般而言,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及中央和省、市、区的有关规定,村支书首先在村内党员中进行初选,最后由上级党支部指派、任命。由村支书的产生方式来看,上级政府需要的是通过村支书的民选方式来寻找国家力量的代理人,实现对村落治理的目标。<sup>①</sup>因而村支书的人选最终需要经过上级党支部的确认和任命,由此,村支书也就成了国家权威在村落社会中的代表,并构成了村落治理中的权威力量。2006年新村的村支部选举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最后,自1998年“世遗”拆迁以来担任村长的范德西顺利当选为新一届的村支书,另外选举产生一名村支部副书记和一名组织委员。

依据上述组织法,主任是在村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不得任意改选、指派等。然而,事实上,在1998年“世遗”拆迁以前,新村村民对村民选举、村里的政务并不大关心,在他们的眼中,谁当村长、村支书都一样,因为只有靠自己才能发展经济,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国家的政策已经为他们的茶叶生产与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而村集体组织对他们的影响却十分有限。因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

<sup>①</sup>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第675页。

虽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但是村民们的参与意识并未加强,这集中表现在村民们对待选票的态度上。在新村,选民随意处置选票的事情随处可见。不过,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特别重视,村集体组织在村落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愈加凸显,而村民们对村集体组织的要求与期待也有所提高。

1998年,新村村民在“世遗”拆迁中一方面经历了搬离故土的痛楚,另一方面其利益也并未得到足够补偿,在不断发出“地方声音”的过程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村集体组织的重要作用。2004年以来新村村民进行了多次上访,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到,村支书的为人自私自利而且能力有限等,难以真正代表大多数村民的根本利益,难以以为村集体谋利,因而部分村民在换届选举到来之前,力推导游张某角逐村主任一职,希望张能代表民意,反映民心,并能与村支书的“霸权”相抗衡,以期对村支书的所作所为有所限制。2006年新村的村委会选举也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进行,虽然村民对于选票的处理仍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具体表现为一些村民的选票是交由他人代写或任意弃之(以至于部分随意处置选票的村民还受到一定的处罚),但总体而言村民们对选举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往届。正式选举的当天,镇政府部分领导以及公安干警来到新村的选举现场,既为维持秩序也为强化选举的严肃性。可以说,新村的村委会选举基本上实现了民选的形式,但是,形式上的公开、平等能否反映选举的实质呢?由于存在“贿选”和村支书的暗中帮忙,另一位在村支书安排下的林姓村民取得了村选的胜利,而张某及其背后支持的村民们未能如愿。在后来的村落政治中,村长的软弱性令村民感到失望和气愤,而其背后的村支书与村民之间的鸿沟也由此不断加深。

关于新村村支书范德西的其人其事,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范德西文化水平不高,能力有限,私心很重;其父曾是老北山大队的大队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从靠山的马头小组搬迁至靠近公路的梅岭小组,在范德西担任村支书以前,他曾长期在村里做电工,并被村民视为“电霸”;其后在1998年的“世遗”拆迁中,他通过主动靠拢景区管委会,以及与镇某领导的私人关系,很快成为新村的代理村长,并从搬迁过程中收获不少私利;随后他由代理村长转为正式村长,期间,他代表村民与市镇及世界遗产“拆迁指挥部”进行协商拆迁补偿等问题,并成



为第一批签字同意拆迁的村民，由此还获得拆迁补偿与奖励；很快他就当上了新村的村支书。<sup>①</sup>其二，范德西的协调能力好，能较好地处理新村陈姓村民、范姓村民及其他姓氏村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另外他与上级领导保持了较为紧密的联系，并能从中获得帮助。

由上所述，范德西的工作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双重特性。他首先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新村村民，与村里的其他村民相差无几，他家也是以茶叶的种植、加工与销售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产茶与卖茶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握有一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权威的村干部，是国家权力在新村的“代理人”。换言之，一方面，范德西已经兼具农民、茶商与村干部的特点，身份界限的模糊性使其性格也带有多重性与多变性；另一方面，村支书的权力与角色使其认为新村的上访村民是“刁民”，于是，他并没有正面支持村民上访，也未能给予上访村民经济资助，反而积极、及时地向上级反映上访等事件。以他为代表的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从2006年的选举来看，村民选举的程序、形式已经基本实现，但民选村长却未能达到真正的公平选举。事实上，在民选的背后潜藏着正式权力与民间权威之间的较量，而且，从民选的过程来看，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等民间权威的壮大，更是已经成为影响新村村落政治秩序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 二、2009年的村民选举：地方精英的“隐性”力量

自2006年村民选举以后的三年内，新村的村两委与民间权威之间的“张力”逐渐凸显，譬如对于村集体组织截留“世遗”补偿款的决定，村民代表、上访积极分子等并非置之不理、忍让退却，而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要求对村两委的“截留”决定进行全村“公投”。又如上文所述的村民代表被打事件也反映出新村两种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入2009年的夏天，新村新一轮的村民选举又一次展现了村落内部权力关系之间的此消彼长。

按照惯例，新村首先进行了村党支部的选举。其具体运作过程是，根据武夷镇党委的统一安排，9月5日在镇驻村干部的参加下，召开了村全体党员会议，当时到会党员为40余人，为全村党员的80%。

<sup>①</sup> 与新村村民肖晓雨、张夸梅、黄薛妹等的访谈，2009年3月8日。

首先由武夷镇驻村干部宣讲了党的组织纪律和镇党委对这次换届选举的要求和意图,然后与会党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支委的候选人名单。在经过镇党委确定候选人之后,接着以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举出3名党支部委员,投票结束后,由镇驻村干部和村老干组长当场公开清点和统计选票,并当场公布选票结果。一般来说,在镇党委确认选举结果之后,新的村党支部即可成立,其中有1人将被指定为村支书。新村村支部委员的3位候选人的票数都达到了半数以上,其中前任书记的选票为31票,比前任副书记的选票少8票,而两者都是村支书一职的有力角逐者。不过,依据惯例,村党支部书记的选举并非完全是按照选票的多寡来决定,事实上上级党委的决定直接影响着村支书一职的人选。因此,在村民的眼中,范德西之所以能够连任新村的村支书,完全是因为他与上级党委某领导的个人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更被村民们演绎成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和图式,诸如他们在“世遗”拆迁补偿中以土地进行的“互惠互利”,在出让新村集体农地时的“共谋”等等。

总之,从新村党支部的选举过程与结果来看,一方面,国家所大力推广与深化的村民自治、村民选举已经在地方社会得以普及,而且村民也越来越关注村里的大事,参与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国家事实上是在运用村民选举的权力手段来加强村民的自治意识与民主意识,并在此过程中强化国家力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因此村支部选举结果的决策方是代表国家力量的上级党委。换角度而言,对于村民选举,上级党委更为关注的是选择一个符合国家利益的村庄治理人,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虽是代表国家来管理地方社会,但并非总能表达国家利益,因此,在村支部的选举方面也可能体现的是个人意志、私人关系。

回到新村的村民选举,在新的村支部成立以后,村支委干部与驻村干部成立了选举领导小组,村支书任组长。村选举领导小组要求各组进行选民登记,之后在村办公楼前张榜公布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名单。一般而言,选民的最终确定需要经过3次张榜公示。接着,由3人组成的“流动票箱”进入各家各户来收取选票,然后他们再依据选票的多少来确定候选人。按照要求,一般需确定2位村主任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另外需确定3位村委会委员候选人,并从中选举产生2



位。易言之，第一轮为候选人的选举，一般要产生5位村委会候选人，他们将角逐下一轮的正式选举，其中3人将分别担任新一届村委会的村主任、文书、妇联主任兼计生专员等职务。

从表面来看，村主任的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来运行的，真正按照既定程序来操作的，那么程序上的公正是否意味着实质内容上的正义呢？新村于10月初进行了选举投票，当天，在上级（镇）派出的选举监督干部的组织和安排下，到场的村民都投下了神圣的选票。不过如许多中国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一般，新村的选举背后也发生了诸多故事。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意不在于“揭露”选举“黑幕”，而是通过对事件的描述与分析来展现各方力量之间的互动。

与上一届选举相比，这次的选举较为正规，村民对待选票的态度也更为严肃。从候选名单来看，有三股力量值得关注。其一，由村民代表推选出的陈木新，大专学历，26岁，其身后的“助选队”成员主要来自那些上访积极分子与村民代表。在上访群体的观念中，他们需要推选一个年轻有为、真正为村民办实事的村长，而陈木新的大专学历、务实态度等刚好符合标准。他们主张候选人要符合民意，反映民心，因而他们没有为候选人拉票或进行“贿选”。其二为村民陈玉树的小舅子韩清，小学文化。需要说明的是，陈玉树曾在90年代初担任过新村村支书，后因经济问题入狱而停职，不过他在新村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三系上任的村长林其才，也是小学文化，他在三年的任期内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村民对其颇有微词，但他深得上任村支书的支持。事实上，上述三股力量已经构成今日新村政治结构中的两种权威，亦即，前两者表现为上访能人、知识分子、经济能人等所代表的地方精英，不过地方精英也因诉求不同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后者指村干部所代表的官方权威。

在新村，传统的民间权威力量历来薄弱，族长、老人会之类的组织更是鲜有出现，而村两委所代表的官方行政组织则是政治结构中的主要力量。不过，在武夷山“申遗运动”的背景中，在“世遗”拆迁的影响下，新村出现了一些新的力量，诸如经济能人与上访积极分子的叠加或“合力”，年轻知识分子的参与、“民选”村民代表的出现等。其实，早在2006年的村民选举中，他们的力量就已崭露头角，当年的选举正是



在以他们为代表的民间权威与以村支书为代表的官方权威之间展开的激烈竞争。在2009年的选举过程中,各方力量之间的较量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且此次选举呈现出一个新的动向,即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以及新生代的知识分子等逐渐从村落政治舞台的“幕后”走上“台前”。

从陈木新的推选过程来看,他首先是通过小组提名,然后通过竞职演讲与村民代表的推荐得以成为村民推选的候选人,不过他并未进入最后的选举候选人名单内。关于陈的提前落选,梅岭小组的村民们很愕然,他们认为有些村民的目光较为短浅,只关心眼前利益而不去考虑今后的长远利益是陈落选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也与此相关,他们和陈木新都没有在村里进行“拉票”,没有花钱请人去投票。事实上,陈姓在新村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大姓,拥有众多的族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集体化时代,陈姓人曾担任过大队长,并在村里有所建业。但随着新村外来人口的增多,姓氏更加多元,而新村的陈姓也从未形成过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内部的联系较为松散。因此陈姓的后人并没有成为影响新村政治的主要力量。

另外两位候选人成了新村村主任一职的主要角逐者,而在他们身后的陈、范之间的较量则更为激烈。陈玉树运用其原有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为韩清铺平了选举的道路,比如发动亲属投票、购买选票等;而范德西也以其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林其才提供了诸多支持。前者竭力去打破原有的村落权力格局,而后者竭力在维持。关于双方之间的较量,村民们则大都是在旁“观战”,因为在他们看来,双方力量中不管谁当选,都不太可能为老百姓办实事,事实上他们已经预见到村长的软弱性,而其背后的那股强势力量才是影响他们日常生活与集体利益的主要因素。

在经过村选举领导小组、镇驻村干部、全村党员、各组组长及村民代表的统票、计票工作之后,选举的结果是,村委会其他候选人均过半数而当选,而角逐村主任的两位候选人的选票都未过半数。这样的结果虽极具“戏剧性”,但是与此类似的场景也曾经出现于三年之前的那场没有“硝烟”的选举中。因而这件事并未引起村民们过多的评论。借用村民代表黄薛妹的话:“他们谁当都一样,反正两个的能力都差不多,也不会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在经过上级的讨论后,决定村主任



的人选需另择日进行补充投票。在第二次的选举投票中，两人的选票均过半数，不过韩清的选票要比林其才的多出 100 余张。那么，依据村民选举的规则，韩清当选为新村新一任的村主任。

新村的选举过程之所以如此波折，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又如此激烈，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从新村的经济背景与经济结构来看，新村的土地、茶山、茶厂等大部分是由村集体所有，这一点从上文所述的“确权”过程即可看出。而且，村集体土地的转让、房屋出租等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构成新村财政收入的最为主要的部分。其次，长期以来，就像中国其他乡村社会，新村的村委会事实上也存在由“几个村主干说了算”的现象，也正是在村主干拥有对村集体财产的主导权的刺激下，对于村主干职位的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自 1998 年新村进行“世遗”拆迁以来更是如此。再次，在武夷山成功申报为世界双遗产地的背后，新村村民的贡献不可忽视。新村被授予“世界遗产特别贡献村”，而且为了嘉奖新村村民“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以及新村村委工作的突出表现，武夷山景区管委会还为新村的村主干每年每月发放一定额度的工资、奖金。也就是说，新村村主干的工资一部分是由武夷镇提供的财政工资，另外一部分就是来自武夷山景区管委会。而在村民眼里，那些看不见的“隐性”收入才是村主干们更为重要的经济来源，同时经济收入与外显的正式权威共同构成了村民选举激烈的主要原因。

最后，上文所述主要是关于选举的经济动因和利益诱因，除此以外，新村在遗产运动的背景中发生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变迁也是引起选举如此躁动的另一主要原因。自新村“世遗”拆迁以来，村民对乡村政治文化生活的关注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从集体“挖路”到景点拦票，至后来的数次大规模的上访，一系列的群体性行动把新村村民推上了乡村政治的舞台，在此过程中，村民们的政治热情被激发，对民主政治和村民自治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而参与村政的诉求也日益高涨。据笔者的问卷调查，在“世遗”搬迁以后，村民们才开始特别关注村里的大事如村民选举等，而目前他们对村民选举、村民会议等的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如表 5.1）。在完成的 70 份调查问卷中，对于“您现在是否关注村务”的提问，共有 58 名村民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村务，并积极参与村民选举、村民会议等，这部分人数占总数的 85.3%；

而仅有 10 名村民认为村里的事务与自己无多大关系。

表 5.1 是否关注村务

		频率	百分比 (%)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有效	是	58	82.9	85.3	85.3
	否	10	14.3	14.7	100.0
	合计	68	97.1	100.0	
缺失	系统	2	2.9		
合计		70	100.0		

资料来源:根据调查问卷分析整理而成。

与此同时,也是在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催生下,以一部分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纷纷出现于新村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以经济实力、集体感和正义感,带动了一批村政活跃分子,并试图通过推选新的村委干部来改变现有的村政格局与权力关系。2006 年村民选举中的张姓导游以及 2009 年的陈木新,均是在此背景中进入到新村特定的政治“场域”中的,由此而论,新村的地方精英正在成为影响新村内部权力关系的重要力量,而且他们与村干部之间的博弈,以及与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之间的互动,都将对武夷山遗产的保护、延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 小结 世界遗产的后续影响:村落内部关系的紧张与疏离

综上所述,武夷山的“申遗运动”仍在继续对新村产生影响,这些后续的影响正在以“世遗”补偿款、景区有偿使用费及景区遗产政策等形式进入新村,并对新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一,村落内部的利益分配给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组织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问题。如“外嫁女”事件所揭示的新村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继而开始转变为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集体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前述群体性上访事件相似的是,“外嫁女”事件又一次使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新村稳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方面,世



界遗产正在遭遇此类稳定问题的威胁，如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妥当，那么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就不可能顺利展开。另一方面，遗产运动的“后遗症”在持续“发酵”，新村内部的村民纠纷、补偿款分配、村民选举等纠纷性事件频出，反映出“世遗”遗留问题、遗产管理的理念及模式仍在继续影响村落治理的权力格局、村民的认知观念以及遗产地的社会稳定。

其二，新村近两次的村民选举竞争表现异常激烈，这一方面说明村民们对于村落治理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参与村政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村民选举也反映出新村村落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新动向，即经济能人、上访积极分子、村民代表等地方精英的力量正在壮大，并与村两委所代表的正式权威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张力”。与此同时，地方民众的“声音”也在两种力量的较量、互动中得以凸显。

其三，由上述分析来看，武夷山的“申遗”及遗产管理模式给新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外显的变化集中体现在新村村落空间、村民生产生活等方面，村民内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认知观念、价值理念等方面的改变。这些变化进一步延伸至新村，则表现在村民为景区内山林进行的“确权”，为守护家园等进行的“挖路”、群体性上访，以及“世遗”补偿款所引发的“外嫁女”事件、村落内部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等。简言之，武夷山的“申遗运动”及保护模式已经成为影响新村社会稳定、内部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值得深思和警醒。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新村的社会稳定与村民们的和谐共处，也将对世界遗产或者说人类遗产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进一步来讲，在遗产运动的特定场域中，遗产及其裹挟的话语、价值与权力等，已经使其成为影响国家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 第六章 总结与讨论

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指出,人类学的核心是民族志传统,而现今时代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表述方式的年代,那么当代人类学文化批评所要做的正是把异文化民族志与本土文化问题联系起来。<sup>①</sup>易言之,民族志作者应当“把研究兴趣回归到本土社会,并提出把其自身社会的成员视为与异文化的成员同样有问题的研究对象”<sup>②</sup>。这一点正是本书所力求实践的内容。勿庸讳言,遗产运动、遗产保护与开发、遗产旅游与地方民众的生存发展等都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是需要人类社会共同关注和亟待研究的课题。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遗产保护实践的开展以及遗产学研究的深化,世界遗产的保护模式与管理体制、世界遗产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方面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不过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我国当前的遗产研究不乏文本解读、理论阐释方面的研究,但从遗产运动的角度来探讨地方、遗产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尚属少见。

在人类学的村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历来是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与研究视角。但是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非必然是对立的、单一的、简单化的,实际上,它们之间更表现为一种多元的、动态的互动关系。受杜赞奇的“文化网络”概念的启发,在现代语境中看,遗产运动也可以被视为类似于一种“文化网络”的媒介,它不仅正在对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遗产本

---

① 黄淑鹄、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1 页。

②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 195 页。



身也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面临解构与重构的可能。

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来看，“遗产”概念在根本上是指向地方性的(local)，亦即地缘性人群共同体与土地之间的“捆绑”关系的表达，是特定人群区别“他群”、确定“我群”的情感纽带与符号表述。需要强调的是，“遗产”从一出现开始就成为构成民族国家“合法性”的依据之一，尤其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场景中，遗产已经超越某一个地方，而具有了“非地方性”(non-local)或者说“全球/地方感”，成为体现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权力话语等异质性特征的文化符号。由此，遗产具有了地方性与非地方性的双重特性，并成为联结地方与国家的重要媒介。另外，如前所述，在现代语境中，遗产已经成为一种集聚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行政权力等的特定“话语”权力。而这一点又最为集中地表现于“国家遗产”的管理以及地方政府的“申遗运动”。一言以蔽之，联合国的遗产话语、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正是随着遗产运动的发生发展进入地方社会的，并促使地方社会的政治结构、权力关系等发生变迁。

从这方面来看，现代遗产及遗产运动已经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地方社会通过遗产的申报、保护与管理而被纳入世界遗产和国家遗产体系的过程，也包括地方社会对现代遗产运动所做出的各种回应。也就是说，前者是指“自上而下”的遗产运动对地方社会和遗产本身的影响与冲击，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文化面临被消解的情形，而另有一些“传统”则可能被发明、被强化。后者的回应则涵盖地方民众对遗产管理模式的“群体抗争”、“传统”的接续、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遗产保护意识的变化等方面的内容。结果是，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加速了遗产地社会的变迁，同时，地方文化持有者在遭遇“被遗弃”之后，其保护意识反而变得“消极”，而且，在地方社会难以与官方政府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地方社会开始变得“躁动”。下文将对新村的“世遗”经历、村落政治文化的变迁、村民的回应等进行简略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家园遗产”的理念，对现行的遗产保护模式进行反思，并指出今后遗产保护应立足于遗产主体的文化自觉，并在地方社会、遗产机构与国家等“相关利益群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

## 第一节 缩放式回顾新村的“世遗”经历及变迁

从新村与武夷山遗产的关系来看,新村自建制以来就与武夷山文化景观、武夷茶文化等一同构成了武夷山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武夷山秀美怡人的自然风光与生态环境看来,村民们的繁衍生息、生产劳作一直以来与武夷山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譬如人口数量的增长一直处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村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早已暗含今日所言的“遗产保护”意识。同样,武夷山保存至今的文化遗迹与自然生态也说明了村民们与武夷山之间的良好关系。此外,从新村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结构来看,他们已经成为武夷茶文化当仁不让的传承主体和实践主体。就此而论,新村与武夷山遗产相互依存,互为整体。

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武夷山的“申遗运动”,使新村村民面临家园搬迁、村落空间的改变、生产生活的“设限”等问题。其中,村落拆迁又是“申遗运动”中的“大手笔”。之所以决定进行村落拆迁,地方政府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严格按照申报世界遗产的要求;二是借鉴其他世界遗产地的经验;三是进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现实需求。需要说明的是,在确定对景区内村落进行整体拆迁之时,村民对此知之甚少。这足以说明,遗产地村落的去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来决定的,村民有知情权,却没有自决权。不过,从新村的拆迁过程来看,一方面村民们在“为大家、舍小家”、“为国争光”的精神感召下,最终完成了整体搬迁;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官方政府的遗产政策心存顾虑。总之,从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及“世遗”保护的过程与影响来看,新村经历了诸多变化,主要表现如表6.1所示:

表 6.1 新村的“世遗”经历

时间(年)	主要事件	大致经过及影响
1998—1999	新村进行整体拆迁	拆除旧村、搭棚而入住安置区;遗留的拆迁补偿、房产权属、山林权属等问题。
2000—2003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生产距离拉远、成本增加、生活空间受限、运输事故频发等。



表 3

时间(年)	主要事件	大致经过及影响
2004-2007	挖路、拉票、上访、确权	新村针对遗产管理方进行了一系列群体性行动;争取到“世遗”补偿款、遗产景区有偿使用费、山林的确权等;同时,新村的稳定问题也给世界遗产的保护及世界遗产地的稳定、和谐带来了挑战。
2008-2009	村民代表被打、村民选举中的权力“展演”	围绕“世遗”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新村-村民代表被一群外嫁女殴打;村落内部权力关系发生改变,地方精英的力量不断壮大。

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调查整理而成。

从上表来看,新村所经历的巨变不仅在于村落空间形态的变化,而且还体现在新村村民的认知观念、价值理念、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迁与调适。这些变化既对新村村民及村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武夷山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带来了挑战。首先,2004年景区试运行封闭式管理前夕,新村村民在一张“政府令”的刺激下把通往景区的“茶路”横腰截断。这一“挖路”事件是世界遗产给地方社会带来的第一股冲击波,它不仅凸显了“世遗”拆迁安置所带来的诸多遗留问题,如拆迁补偿款、景区遗产地内山林的权属问题等,而且引发了村民与遗产管理方、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造成了村民们对待世界遗产的认知观念的改变。总之,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被遗弃”的境况。

其次,2004年9月伊始至2005年初,新村村民为了景区遗产地内的山林的确权,以及家园认同的重构等,村里众多女性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上访。数次上访行动再次使新村的稳定问题成为武夷山地方社会关注的焦点。虽然新村的上访并非直接由“世遗”拆迁所引起,但武夷山“世遗”拆迁的遗留问题,如征地补偿问题、山林权属问题等,以及景区施行的封闭式管理却是引发村民上访的主要动因。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访的过程中,新村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力量,即上访积极分子与经济能人“合力”构成的地方精英。而且,他们的力量不断显现在村民选举、村落治理等方面,并对新村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产生影响。

再次,前述上访、确权等群体性行动已经阐明,地方民众正在运用



国家预留给农民的诉愿机制、非正式的权力手段与方式来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往往被视为影响世界遗产地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这些声音的发出者则逐渐走到了地方政府、遗产管理方的“对立面”。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因为他们也会运用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来挖掘、发明或接续传统文化，既可以用之发展遗产旅游，也可在“发明的传统”中重构他们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新村所举办的“斗茶赛”即为一例。需要强调的是，在武夷山传统的“斗茶赛”中，新村村民不仅是参赛的主体，也是举办方，而随着“斗茶赛”规模与影响力的扩大，地方政府也参与其中，并成为“斗茶赛”的协办方。这种“主—客”关系的重新定位使新村人的文化认同、家园感等得以强化。在“遗产运动”的特定背景中，新村人的身份也经历了由外来移民的身份而力图“本地化”，再由遭遇“他者”质疑而重新建构家园认同、身份认同的过程。

总体来看，就世界遗产对新村的影响而言，一方面，世界遗产等现代文明已经对地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诸如村落因申报世界遗产进行的拆迁、村落空间形态的转变、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世遗”拆迁、遗产管理等带来的一系列利益纠纷、官民矛盾等等。而另一方面，世界遗产并没有完全割裂村落的传统文化，没有完全取代富有历史传统文化的村落社区，也没有打破村落自我的生存规律，比如，传统“斗茶赛”在新村的传承与延续，村民的生产方式仍以茶叶的种植、制作为主，村民的信仰民俗活动在拆迁以后并未中断等。从这些传统的接续、发明或重塑来看，村民们一方面在进行自我调适，另一方面则以其文化传统来与世界遗产进行互动，并在此过程中确认自身。值得注意的是，在遗产保护与管理的过程中，遗产地民众的情感与文化传统应当受到尊重，只有这样，他们所进行的文化调适才不至于与遗产背道而驰。概言之，在全球性的遗产运动中，村落社会已经难以避免地受其冲击与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已经造成地方社会的不稳定，民众之间、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等，由此，与地方社会紧密相关的遗产以及对遗产的保护和管理等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如何协调遗产与“地方”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了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 第二节 地方民众的回应与“文化自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村在世界遗产的影响下所经历的文化调适与遗产实践,至少呈现出两种现象:其一,遗产保护的“他者化”现象,或者说地方民众处于被言说、被表述的“失语”情状中。毋庸置疑,国家、市场(企业)以及民间社团、学者等都已成为当前遗产运动的推动者。一方面,国家在遗产申报过程中具有优先权,进而对遗产保护也享有遗产保护、规划与管理,以及旅游开发的优先权。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市场则成为国家推销、运营遗产的场域,遗产由此成为消费品,并逐渐发展成“遗产产业”。然而,另一方面,与遗产相伴而生的地方文化持有者却只能是国家资源配置和行政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是“遗产”这一商品的贩卖者。这一切都表现了当下遗产保护的“他者化”特征。<sup>①</sup>相关的事例比比皆是,诸如武夷山城村民俗文化村的规划开发、新村的整体拆迁等。总体来看,当下那些跃跃欲试在申报遗产的以及那些已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规定成功申报为世界遗产的遗产地,事实上都在重复着这样一种模式:由政府倡导、专业人士规划设计、行政机构执行落实,实行“自上而下”的操作和管理模式。诚然,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全社会的遗产保护意识,但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他者”的做法,使遗产的地方性主体面对自己的遗产可以“无所作为”。然而,任何遗产都与一定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更与其地方性主体形成了情感上的依附关系。

其二,如前所述,由于任何遗产都与一定的地方紧密相关,与地方民众建立了某种互证、互为的联系。那么,遗产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遗产地民众进行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的符号,是地方民众确认自身和构建家园的文化资本。所以当遗产与地方包括“地方性知识”、地方文化持有者、地方情感、家园意识等发生脱节时,地方民众势必会做出自己的回应。

新村村民所做出的回应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针对武夷山世界遗产的管理机构——景区管委会所进行的群体性行动,如2004年3

<sup>①</sup> 龚坚:《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视角》,《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月底的“挖路”,及其后到景区景点进行的“拦票”,自2004年9月开始的前后三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上访等。换角度来看,这些群体性事件都是发生在世界遗产的特定场景中,也可以说是现行遗产管理模式所引发的“不良反应”。这些后果与遗产运动一同延伸至新村内部,便引起了新村村民之间、村民与村两委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村落政治与权力关系的变迁。需要说明的是,村民关系的疏离、干群关系的紧张使遗产地社会的稳定问题得以凸显,而民间力量的壮大及其与村落正式权威之间的较量,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民自治、村民民主的意识,这些都体现在村民选举的场景中。因此,对于地方社会而言,世界遗产更似一把“双刃剑”。

二是运用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与文化资本等进行的传统的接续、发明,并在此过程中重构新村人与武夷山遗产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新村与武夷山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亲缘关系,但是,当武夷山在成为世界遗产地之后,新村村民面临被“遗弃”、被忽视的情形。在此背景中,一方面他们试图发出“声音”来维持他们与武夷山的历史联系,并以群体性事件等方式来进行自我表述。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主动地运用世界遗产的符号、资源、话语等来进行传统的接续和重构,从而使其文化认同和家园意识在接续或重构的“传统”中得以重新确认。换言之,新村村民已经意识到,只有当他们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与延续时,他们才能真正地参与到遗产保护实践中来,也只有当他们对武夷山遗产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时,他们才能与武夷山遗产融为一体,成为武夷山遗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回溯至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以前,新村村民保护武夷山遗产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在自为的,或者说是内化在其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村民们的保护行为并不具有前瞻性与规划性。随着“遗产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国家遗产”理念的推广,村民们被视为遗产地的“客人”,被整体迁移至遗产地之外,他们与遗产的关系也在“世界遗产”、“国家遗产”等特殊的“遗产话语”的表述中发生了转变,在此背景下,村民们保护遗产的态度由主动转为消极被动,甚至“无所作为”。需要强调的是,由新村的内在机制与群体性行动来看,在遗产运动下,武夷山世界遗产及其保护将始终如一地依赖于地方社会的传承与保护;而且,在“世界遗产”作为一种外来力量或者说“权力”样态进



人地方社会的过程中，地方民众不断被边缘化，从而使遗产保护主体严重地依托官方政府。<sup>①</sup>就此层面而言，强调与倡导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对于人类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将至为关键。

依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觉”是对“人文价值的重新思考”，是人们对“己文化”传统的欣赏，对“异文化”的了解，进而实现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平共处。<sup>②</sup>在遗产实践与遗产研究中，“文化自觉”的理念同样重要。从宏观层面来看，全人类的“文化自觉”对于遗产保护自然是好事，但其涵盖面显然过于宽泛；同样，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文化自觉”虽很重要，但也具有相当的有限性与“想象”的成分。

首先，文化自觉的实现要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这是“与以遗产为本”相对而言的。这里所言及的“以人为本”倾向于指以地方文化为主体的地方民众。从武夷山的遗产实践来看，当地政府、遗产管理方试图排除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干扰因素，如对遗产地进行重新规划与设计、外迁人口、封闭式管理等等，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遗产地村落社会的不稳定以及对遗产真实性的破坏等。毕竟，不论是自然遗产，还是文化遗产，地方民众都是遗产的传承者、保护者或创造者，只有当他们对自己文化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时，才能保护好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其次，地方民众的情感诉求与利益需求应当受到重视。如前所述，由于遗产地社会及地方民众处于一场以强势话语权力与国家权力为背景的全球性的“遗产运动”当中，那么，他们在当前的遗产保护实践中往往处于“失语”的情状之中。与此同时，遗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也随之发生了分离，遗产的主体发生了分层，遗产地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地方民众已然不可能成为现代遗产的唯一主体，他们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把“私义”的遗产扩大为“全人类”的遗产，以求在遗产保护中“被赋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一方面，“被赋权”的地方民众可以对他们的遗产家园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遗产管理方也可以通过地方民众参与遗产保护、分享遗产利益等方式来实现地方社会的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新村村民的“回应”至少反映出当前武夷山社会面临的

① 龚坚：《“世遗”的权力与地方的声音》，《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 费孝通：《论人类学和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两种分歧：一是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的归属权纷争问题；二是新村内部的利益纷争及关系疏离问题。自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以来，景区内山林的归属权问题一直就是新村村民与景区管委会之间和谐发展的羁绊。直到2008年4月，依据武夷山政府的要求以及其与村民之间的协商，景区管委会觉得从当年开始对景区内8万亩山林实行“两权分离”管理。至此，新村成为被社会认可的武夷山遗产的主体，村民们的家园感、地方感得以强化，同时，村民们也可以此参与遗产保护、分享遗产利益。

不过，当山林权属纷争基本解决后，村落内部的纷争却在愈演愈烈，原因有二：其一，在国家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背景下，村落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动不居，其中村民选举已经成为各方力量展演的“舞台”，而舞台背后的权力较量更因为有了来自村落外部包括地方政府、景区管委会的支持或参与而变得尤为激烈。而且，在遗产运动这一特定场域中，新村也在“遗产权力”、行政权力以及民间力量的相互交织下对村民们的认知观念、思想意识、价值观等产生影响。其二，新村村民所拥有的文化认同、集体记忆、社会凝聚力等共同的价值观，也因外来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而有所改变，正如前所述，新村的稳定问题已经成为遗产地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武夷山遗产旅游的继续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现代文明的深入影响，如新村的房地产大为升值，世遗补偿款逐年增加，回迁人口也在日渐增多等，由此，新村的社會问题也日趋凸显，如“世遗”遗留问题、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乡规民约的效力问题、外嫁女问题、村民纠纷、“贿选”等等，总之，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都直接影响新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

### 第三节 遗产运动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在遗产研究与遗产管理实践中，“地方”与“国家”是对遗产的传统与保护产生直接影响的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遗产根源于特定的地方、特定的人群共同体，遗产的管理需要地方主体的参与和自觉保护。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遗产从一开始就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国家不但是遗产政策的制定者与实践者，而且还被



确认为申报世界遗产的惟一的“合法性”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遗产”成了人类遗产最根本的表述单位。

从遗产与人类的关系看，地方无疑是遗产的落脚点与根本性表述单位。易言之，遗产必定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地方发生联系，其存在与延续有赖于“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就遗产的本义而言，遗产是指依据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来的财产与权利。<sup>①</sup>这说明“遗产”的传统最初发生在私人领域内，主要是指在家庭、族群或人群共同体内部的传承。就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村落是我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首先应该是个人、家族或村落共同体。又由于他们与其所居的地方村落联系紧密，对地方存有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sup>②</sup>，因此，遗产成了地缘性人群共同体与土地之间的“捆绑”关系的表达，成了地方情感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表述。由此看来，遗产的传统离不开地缘性人群共同体的自觉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地方”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地方”首先是指一定的地理方位和空间范围(地缘性)，以及涵盖超越“地方”之上的人群共同体。亦即，“地方”或者说“区位”(a specific location)、“场所”(locale)是相对稳定的，而地缘性人群共同体则是历史情境之中的文化载体。这说明，遗产与其所依存的地方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稳固的，并且，遗产作为特定人群的文化表征，承载着地方的独特文化与历史记忆。其二，如克瑞斯威尔在《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中所强调的，“地方”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从人与“地方”之间的种种关系，发现意义和经验的世界。<sup>③</sup>这表明，遗产所依附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区位、位置、场所的地理空间概念，而更是一种人们对历史记忆、文化认同、外部世界的理解方式。尤其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场景中，遗产已经超越某一个地方，而具有了“非地方性”(non-local)，成为体现国家认同、民族自豪感、行政权力等异

① R. Hewison,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avid L. Uzzell, ed.,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Belhaven Press, 1989, p. 15.

② 蒂姆·克雷斯威尔：《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③ 同上。

质性特征的文化符号。由此,遗产有了地方性与非地方性的双重特性,并成为联结地方与国家的重要媒介。

事实上,在现代语境中,“遗产”从一出现开始就不仅仅是“地方的”,而且还是构成民族国家“合法性”的依据之一。首先,回溯历史,遗产的发生发展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期欧洲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建构等密切相关,如法国的大革命催生了“国家遗产”的理念。其次,从遗产保护的初期开始,遗产就从私人领域扩展为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因素,并逐渐被建构为体现民族意识与政治权利的文化符号。再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架构的人类遗产体系及所制定的遗产规则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西方民族国家之间“角力”的结果。在此层面来看,遗产已经从某个特定人群及其依存的地方社会扩展至公共领域,成为国家建构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和政治表征。

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内,“民族”与“国家”是在利益、权力与现代技术,特别是印刷、传媒等合力作用下,才历史性地发生重叠,并被假定为具有重叠边界的“想象的共同体”<sup>①</sup>的。而且,由于“想象的共同体”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段与特殊的政治背景下,那么民族国家所表述的人类遗产也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表征与想象成分。<sup>②</sup>因此,在民族—国家的名义下,“国家遗产”成了人类遗产最根本的表述单位;在现代语境中,“国家遗产”已经涵盖了现行遗产的所有类型,并成为使遗产“合法化”、“正统化”的一种符号和标签。概而言之,“国家遗产”是“国家化”的遗产,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等推动而形成的,它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政治隐喻与话语权力的表达。

在“国家遗产”的强势表述下,遗产的地方性主体往往处于“失语”的境况;与此同时,遗产地的地方文化也面临新的挑战。这表现在:其一,遗产的地方性主体往往被排斥在遗产规划与管理之外,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很多遗产如建筑、人类遗址、古城、博物馆等都处于当地社区中,地方民众已经成为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有助于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吴叡人译),上海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增强遗产地的活力。其二,在遗产管理实践中,地方文化面临来自政府行为、市场经济、大众旅游、专家学者等力量的冲击,有些正在以“遗产化”的形式而被建构为一种新的人文资源,而有些正日渐消逝。在此层面来看,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对于遗产的保护与存续至关重要。换言之,遗产已经成了“国家”与“地方”互动的重要媒介。

在遗产保护与管理实践中,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

首先,在现行的国家制度中,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由于力量的悬殊而表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从当今遗产运动来看,遗产政策的制定与施行都严重地依托政府官方的行政权力,而与遗产密切相关的地方性主体却不断被“边缘化”,成为被言说、被拆迁、被限制的对象。不过,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并非全然的对峙,互不相让,而是互有沟通甚至妥协的。

其次,地方政府或(和)遗产地景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遗产管理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把遗产视为实现政绩和改善民生的社会资本,并由此采用资本化运作、市场化管理来对待遗产,致使遗产脱离于其赖以存在的地方社会和人文环境,从而面临“被制造”与“被发明”,以及出现“文化造假”、“伪民俗”等问题。与此同时,官方政府、专家学者、土地规划与开发者等外来力量成了遗产的事实主体,而遗产的地方性主体则从事实上的主人变成了名义上的主人。<sup>①</sup>在此层面上看,遗产权属的“隐性置换”或“变更”已经对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造成威胁。同时,遗产的管理实践一方面使地方对于“我文化”的认知与认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也使地方对于遗产管理方的认知和态度发生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对遗产的管理权和行政权究竟应有多大,其权限是否应该有所约束,以及地方社会的“被赋权”,进而分享遗产旅游发展带来的益处等,这些问题都需认真对待。

从武夷山的“申遗运动”及新村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来看,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多元性。

其一,在民族国家的场景中,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由于力量的悬

<sup>①</sup>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527页。



殊而表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从“申遗运动”的整个过程来看,遗产政策的制定与施行都是严重依托官方政府的行政权力,而与遗产密切相关的地方民众却不断被边缘化,成为被言说、被拆迁、被“设限”的对象。不过,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并非全然的对峙,互不相让,而是互有沟通甚至妥协。从武夷山“世遗”拆迁过程来看,起初新村村民们并不愿意外迁,表现为不配合、不搬迁,但是在“世遗整治建设指挥部”的思想动员下,以及一些地方干部运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之后,村民们最终顺利搬离了景区。值得注意的是,“世遗”拆迁的过程也出现过村民与拆迁方之间的矛盾纠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众缺乏沟通,少有互动,除了制度、机制上的天生缺陷与不足,还与政府官员的立场和认识偏差有关。<sup>①</sup>

其二,与城市拆迁不同的是,“世遗”拆迁不仅仅涉及征地拆迁补偿等问题,而且还与遗产的存续、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以及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家园感、文化认同等密切相关。那么,作为遗产的管理机构——基层政府及景区管委会就不仅要面对遗产地民众,还要面对文化、媒体与社会。结果,新村村民一方面运用国家预留给农民的诉愿机制进行上访维权,另一方面也在运用世界遗产的文化资本进行家园生态与文化认同的重建。他们的“声音”最终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并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遗产保护,分享遗产旅游带来的利益。

可以预见,世界遗产对新村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新村的自我表述足以说明遗产运动中的有些力量是有建设性的,如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利等。而有些力量对于村落的影响却是破坏性的,如新村拆迁后,世界遗产给村民、村委、景区管委会以及市政府遗留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包括确权问题、村集体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等等,这些可以从“挖路”、拦票、上访等事件中看出端倪。还有些力量是不可预知的,如新村的未来走向,村民与村委、景区管委会之间的关系将怎样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将对世界遗产保护实践造成何种影响?这些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sup>②</sup>

① 周建新:《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85页。

② 龚坚:《“世遗”的权力与地方的声音》,第122—125页。



#### 第四节 进一步讨论“家园遗产”的理想与人类遗产的实践

在刘魁立先生看来,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至少存在六个方面的悖论,即保护与发展的悖论;文化生态区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演变之间的悖论;解构式的保护与文化整体观之间的悖论;传承人的保护与生存适应问题;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问题;“标准化”保护与凸显地方特色之间的悖论等。<sup>①</sup>正是由于文化遗产保护存在诸多的现实与学理上的问题,所以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遗产的本质,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学理上挖掘文化遗产的深层内涵,将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回应。

事实上,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抑或景观遗产等都是人类遗产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共同反映了人(类)与遗产的互动关系。不过由上述诸多的悖论可以判断,今日的人类遗产实践已经出现众多问题,面临重大挑战。一般认为,人类遗产是由“全人类共同继承”的,那么其传承与延续就离不开人的保护与管理。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民族—国家的时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根本的表述单位,由此也成了人类遗产的表述主体。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遗产”与人类遗产并不等同,两者的边界虽具有一定的重叠,但内涵与外延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言及的人类遗产侧重于指全人类共同继承的所有遗产,而任何遗产都与一定的地方、家园发生联系,从这层意思来看,“家园遗产”可以说是人类遗产的最佳表述之一。

如果说遗产是由全人类共同继承的,那么其范围就涵盖全人类以及民族国家,从这层意义看来,“家园遗产”是维系人类和平的情感纽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的工作即在于促进人类和平,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和遗产。不过,从人类学的亲属制度与继嗣原则来看,“家园遗产”首先归属于个人、家族等人群共同体。弗里德曼(2000)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首次对家族的“公共财产”及其传袭进行了阐述,指出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里,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连带的、不可分

<sup>①</sup> 刘魁立、施爱东:《刘魁立先生访谈录》,《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离的,亦即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土地捆绑”(earthbound)关系。由此,土地与地缘性人群共同体一同构成了家园遗产的实在载体。以此而论,费孝通先生的“大家庭 社群”<sup>①</sup>则类似于我们所强调的“家园”。具体而言,我们用村落生态来强调人群与自然环境的状态以及亲属制度与遗产的内在纽带关系,用“文化地图”的图式展示“文化遗产/家园”的结构关系及其地方性表述。<sup>②</sup>

人类遗产的归属性历来是遗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样,“家园遗产”也特别强调遗产的归属性。首先,如上所述,“家园遗产”不仅涉及土地与地缘性人群共同体,而且还包含诸如时间、空间、方位、居所、家庭构造、财产、环境、地方感、“神龛化”等与家园生态、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内容。<sup>③</sup>其次,由于家或家园(home)不但具有地缘上的认同,而且其认同还可以超越地理边界,成为承载记忆与倾注情感的地方,因此“家园遗产”也成为人们追忆过去、确认自我的文化符号。再次,从“家园遗产”与地方的关系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特定人群的家园生态,而且还是一个地缘族群对自己文化表达忠诚的依归,一个不能任意被“异化”的实体。<sup>④</sup>

同时,“家园遗产”还强调遗产的真实性与整体性。毋庸置疑,遗产的生成背景离不开与生态环境的互动,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也无法与特定民族、族群和人群共同体的认知和认同分开。由此,遗产研究必须结合具体的地方性家园背景去理解和认识遗产。可以说,“遗产家园”是遗产的主体、遗产的责任、遗产的传承相互联系的共同体<sup>⑤</sup>,更是遗产保护的落脚点。

依据“家园遗产”的理念,文化传承与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特别强调“家园生态”的保护与重建,强调地方性主体的重要作用。从这层意思来看,保护文化遗产应当从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考察

① 所谓“大家庭”指“乡上社会中的基本社群”。“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参阅彭兆荣:《“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② 彭兆荣:《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

③ 彭兆荣:《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 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⑤ 同上。



文化事项之间的内部结构与关联机制,强调地方与地缘性人群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和生态纽带,以此实现人类遗产的有效传承与保护。值得一提的是,“家园遗产”的理念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家园遗产”明确指出遗产的归属感属于地方民众或家园共同体,以此驳斥了当前带有强烈政治隐喻与权力特征的“遗产运动”。另一方面“家园遗产”确认了地方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身份,从而有助于强化地方民众的家园自豪感和内部纽带,并激发地方民众在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总之,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引导地方文化持有者认识到遗产具有维系集体记忆与族群纽带的重要价值;同时,也需提醒政府在保护与开发过程中重视地方文化持有者的情感参与,在现代化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建立平衡关系。<sup>①</sup> 总体来看,我们需要改变政府原有的保护模式,重视地方文化持有者的保护实践,使我们对人类遗产的保护方法更丰富、更关注草根文化的力量。<sup>②</sup>

综上所述,在时下的遗产运动中,“家园遗产”的理念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家园生态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和谐,倡导地方文化持有者参与到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另一方面由于“家园遗产”较为抽象、不易于操作,而我国现行的遗产保护模式仍是囿于全球性的遗产保护体系中,且深受西方遗产理念与价值观念等影响,那么就有必要探索一套与我国国情、地方社会相适应、又具可操作性的遗产保护模式。实际上,我国学者在借鉴西方遗产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遗产保护模式,诸如民族生态博物馆<sup>③</sup>、民族文化生态村、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等。不过,随着民族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在我国的实践及深化,文化主体的边缘化问题、遗产的产业化问题以及遗产保护与民众生存发展的矛盾等问题依然突出,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对遗产的真实性与活态性造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在这

① 戴伦·J. 蒂莫西·斯蒂芬·W. 博伊德:《遗产旅游》,第125-126页。

② Mary Hufford,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 1.

③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基于“文化生态”的理念,对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保护的方法。这种遗产保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就地保护”的原则,促进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是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从实际情况看来,生态博物馆成了展演民族文化与出售特色文化商品的场所。由此,文化的真实性和活态性受到威胁。

样的背景下,从遗产地社会的内在机制及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则成了当前遗产保护研究的重要视角。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人群而不是物化的器物或遗存,那么首先,遗产保护要秉持“以人为本”、以地方文化为主体的保护理念。其次,规范地方政府与遗产管理方的行政权力成为当务之急。从我国现行的遗产保护模式来看,行政权力的泛滥与强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遗产主体的分层、遗产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遗产地社会的“躁动”等。此外,要重新重视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力量,一方面为他们的遗产保护实践“赋权”,并让他们参与到遗产保护与管理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另一方面可以村民代表会议为基础在村民与遗产管理方之间搭建一个对话、沟通的平台,进行文化遗产的“社区化保护”。总之,人类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将有赖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 附 录

### 附录 1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说明

根据武夷山市委、市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第九届全省文明城市总评工作的紧急通知,为了积极配合市文明办做好此次总评活动,景区管委会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安排部署,确保这次总评工作顺利完成。下面就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和保护工作情况做一说明。

#### 景区文化遗产概况

武夷山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劳动生息,逐步形成偏居中国隅的“古闽话”文化和其后的“闽越族”文化。反映这一文化特征的是武夷山“架壑船棺”、“虹桥板”及占地 48 万平方米闽越王所居的汉城遗址,是消逝三千多年的古文明和文化传统习俗的独特的实物见证。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影响远及东亚、东南亚、欧美诸国,他在武夷山从学著述、传教,并在武夷山创办“武夷精舍”成为当时有影响的书院。至今山中可辨认的唐宋以来摩崖石刻仍有 410 多处,武夷山茶文化底蕴深厚,武夷岩茶有 1000 多年历史,尤其茶王“大红袍”更是世间极品。武夷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及理学文物。景区目前有 1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5 处市级文化保护单位。

#### 景区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为进一步完善文化保护体制,抓好景区的文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景区成立了武夷山景区世界遗产保护局,下设文物宗教股和世遗监测中心,及景区基层的三个保护管理中队,负责与上级文化部门的



工作联系,负责提出与制定有关文物保护要求及文物利用与修缮的审批管理。目前,景区内初步形成相对稳定的文物保护机构。

#### 保护投入方面

一是投资 800 万元对福建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遇林亭窑址进行保护(其中国家文物局拨款 30 万元,省文化厅 7 万元,目前该窑址已成为“中国保护第一的窑址”)。二是投资 4.8 亿元,进行世界遗产保护一期、二期工程,搬迁 685 户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居民,对文化遗址和文化保护单位周边环境进行专项整治。对景区即将实行智能化管理,以更科学的管理来确保世界文化遗产和文物安全。三是投资 300 万元对朱熹创办的紫阳书院进行抢救性保护。四是每年从景区财政预算中列支 5 万元作为景区文化遗产的监测。

#### 保护管理、修缮方面

武夷山景区世遗保护局地文物保护管理方面,每年不定期地开展文化保护现状的调查,并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上报,同时积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避免这一珍稀的文化遗存不必要的损失,更好地展示武夷山的文化瑰宝。武夷山景区的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率均达到 100%。

保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宏伟大业,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期盼。坚决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永续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进一步加强武夷山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确保世界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利用,造福子孙后代。

武夷山风景名胜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2005 年 11 月 15 日



## 附录2 武夷山新村村民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填写这份调查问卷!我们进行此次问卷调查,旨在关注“世遗”拆迁前后村民们的工作和生活,并落实相关政策。

本调查问卷以匿名方式填写,不必填写姓名和工作单位,问卷中题目答案无正确、错误之分。问卷所涉资料绝对保密,并且最终均以统计资料的形式出现,不针对任何个人。

感谢您的合作!祝愿您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

### 填写说明:

请在每个问题之后补充答案,或在适合自己情况的答案序号上打“√”。

### 基本状况

- A1. 性别:\_\_\_\_ A2. 年龄:\_\_\_\_岁 A3. 出生地:\_\_\_\_村/镇/市
- A4. 婚姻状况:①已婚 ②未婚;
- A5. 您的文化程度:①小学②初中③高中④中专⑤大专⑥大学
- A6. 您会几种地方方言? ①本地话 ②江西话 ③闽南话 ④浙江话 ⑤其他(请注明)
- A7. 您的祖籍属于\_\_\_\_省(区)\_\_\_\_市(镇、村)。
- A8. 您祖辈迁入武夷山的大致年代\_\_\_\_,其主要原因:
- ①由于战乱②做茶工③当包头④政府统一移民⑤婚姻⑥其他(请注明)\_\_\_\_\_

### 生活状况

- C1. 世界遗产带给您的最大变化在于:①房屋拆迁②长距离生产③旅游业收入增加④茶叶市场更好⑤封闭管理使出入景区受限
- C2. 您在“世遗”拆迁前的主要经济来源:①茶叶行业②旅游业(导游、摆摊、餐饮等)③运输业④维修业⑤出租⑥医药行业⑦其他(请注明)\_\_\_\_\_
- C3. 搬迁以来您家每年总收入大概\_\_\_\_元,主要来源于以下哪些方面?
- ①茶叶生产与销售②旅游业(导游、餐饮、住宿)③出租房屋 ④其他



（请注明）

C4. 您对景区封闭管理的看法：①股份公司为了盈利②封闭造成我们生产不便③为了保护景区环境

C5. 您对目前“新村”的生产生活是否满意？①是②否③说不清楚

C6. 您何时开始关注村里的大事？①一直很关心②搬迁以前③搬迁以后

C7. 您目前关注或参与村里的大事吗，如参加选举、行政会议等？①是②否

### 附录3 武夷镇新村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十项优惠政策

一、由武夷山市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承担拆迁户的拆迁安置地的征地、规划、设计、“三通一平”、统一施工至基础部分的费用。

二、居住和生产用房的临时过渡补助费按被拆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平方米每月补助人民币2元,临时安置过渡费从签订协议日期起至1999年3月31日。

三、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在1998年11月31日前将房屋自行拆除完毕,按所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20元;1998年12月31日前自行拆除完毕的每平方米奖励10元。

四、为促进各村民小组早日完成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全组完成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签订的,按各组完成时间顺序选择安置地块。

凡在1998年10月31日前与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签订房屋拆迁协议书的各组前两名按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5万。

五、新村迁移后,新村的名称、建制、山权、林权、土地使用权不变,村民出入景区从事正常的生产活动不受限制。

六、新村集中建新村,景区管委会从1999年起至2003年每年补给新村委会基础建设基金10万元,五年合计50万元。

七、今后景区管委会招收环境保护、竹筏、花轿、环卫工作人员的政策不变,对新村应增加招工名额。

八、景区给予新村被拆迁户优先安置摊点位置,并根据发展可能增加摊位比例等诸项优惠。

九、对于在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房屋拆迁工作表现突出,带头拆迁的,今后景区招收用工时给予优先录用。

十、新村迁移新址后,村民子女就近入学,按当地村民子女就近入学同等待遇。

以上十条优惠政策应用解释权归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

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名录》整治建设指挥部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 附录4 武夷山市人民政府令(第1号)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封闭管理试运行暂行规定》已经2004年3月15日市人民政府第三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日

####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封闭管理试运行暂行规定(摘录)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管理,提升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国家建设部批准的《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订)》的精神,根据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实行封闭管理的区域(以下简称管理区)为:赤石主入口——兰汤卡口——上埔次入口——前兰卡口——江墩桥卡口——星村次入口——漫水桥卡口——黄柏卡口——赤石主入口范围内建设部批准的主景区。其中,前兰卡口——江墩桥卡口——星村次入口——漫水桥卡口——黄柏卡口路段及兰汤——武夷宫路段实行半封闭管理,其余为全封闭管理路段。

**第三条**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景区)封闭管理主要包括:遗产资源、生态环境、交通组织、旅游秩序。

**第四条** 管理区内道路作为景区旅游专用道路,由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景区管委会)管理、使用和维护。在专用道路上运行的交通工具,实行通行证管理制度。通行证由景区管委会核发。

**第五条** 本规定由景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景区管委会应坚持有利于加强遗产资源保护,有利于加快全市旅游业发展,有利于方便景区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因地制宜,统筹兼顾,分步实施,逐步完善,确保景区封闭管理顺利实施。

**第六条** 加强景区保护管理是全市人民的共同职责,乡(镇)、街道、农茶场、市直各部门以及驻武单位、各旅游企业应积极支持配合景区管委会逐步实现景区的封闭管理。

## **第二、三章 略**

## **第四章 住户通行管理**

**第十八条** 因农事活动使用车辆及用工需进入管理区的,由业主在主次路口或卡口登记,办理临时通行证后进出。

**其他 略**



## 附录5 新村村民写给福建省政府的报告

福建省人民政府：

我们是武夷山市某街道新村村民。武夷山市景区管委会于1998年申报世界遗产，如今又要施行全封闭管理，这是为提高武夷山的档次，提高武夷山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新村村民对此本着支持和拥护的态度。所以，我们积极配合政府的搬迁工作，在1998年我们从原来的住址搬迁出来。

房屋搬迁远离耕种，对于我们新村民来说是一次大变迁，面临一次生活的大改变，我们新村民一辈子辛辛苦苦所有的积蓄因为搬迁全部耗尽。我村90%以上的农户都向银行贷了款，村民因此负债累累，仅因为这次申报世遗搬迁，景区管委会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困难，加重了农户的负担，我们广大村民强烈要求人民政府针对世遗拆迁所遗留下的各种问题尽快做出解决，以安民心。

申报世遗和封闭管理的宗旨，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武夷山的整体素质，提高武夷山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无故地加重农民的负担，对农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控管。景区管委会颁发的《景区智能化管理暂行规定》第17-20条是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其严重侵害了我村民的生产生活自由权，这种垄断性经营、垄断性管理给我们村民造成各种生活不便，带来各种无法言喻的困难。

下面，我们阐明几项有关封闭管理给村民带来实际困难的问题：

### 1. 我们搬迁出来，远离耕种，交通费用问题

历史以来，我们祖辈都居住在景区，生产、工作、制作武夷岩茶费用原本较低，武夷岩茶质量上乘，驰名中外，村民的生活过得安稳。而我们现在为了配合政府申报世界遗产，搬迁到远离耕种往返30多里的A与B两地落户。远离耕种，在制作武夷岩茶的过程中造成的品质下降，价格严重下跌，其原因是运输路程太远，茶青闷在青篓里的时间过长，茶青的鲜艳感被破坏。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费用加大，增加工人，增加运输力度，少挑快跑，才能保持茶青的鲜艳感。加之这几年的制茶成本大大提高，柴炭燃料各方面价格猛涨，生产费用和以前相比增加十倍以上，所制茶的开支大大超过了收入，我们的生活陷入困境，而90%以上的村民都在银行贷了款，根本无法偿还。所以，我们要求政府给予经济补偿。

## 2. 关于封闭管理,村民交通出入自由问题

这是一项直接影响到我们生产、生活的切身问题,由于我们整个村民生产生活来源全部都在景区内,我们每人随时都要进入景区进行劳作、管理茶山地,但是武夷山的景点又分散,我们茶山地也分布在各景点内,村民随时都要进入各景点作业,我们的村民进入景区劳动多次受到管委会工作人员的阻挠,干扰了村民的正常生产秩序,与我村民多次产生纠纷(1998年世遗拆迁指挥部给新村村民颁布了十项优惠政策,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新村拆迁后,新村的村建制不变,新村的山权、林权、土地使用权不变,属新村集体所有,村民生产、生活、出入不受限制。”)。既定此条款,为何又不能执行?请问这样的管理合理吗?难道景区管委会可以独霸武夷山吗?所谓的我们村民出入自由从何谈起?封闭前尚且如此,封闭后我们的人身安全更无法得到保障。

## 3. 关于1998年申报世界遗产村民建房的房产证问题

拆迁指挥部当时在拆迁我们村民房屋的过程中有向我村承诺以证换证,不收任何费用,所以我们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顺利进行,但是并没想到政府也会欺骗村民,等我们房子拆掉之后,以证换证的承诺就成了一句空话,更恶劣地变本加厉地收取不合理费用,村民办理房产的问题上每户村民增加负担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不合理费用。我们现在要求政府要退还这笔不合理的收费,我们只付办证工本费。

## 4. 关于利益分配问题

武夷山景区管委会进行垄断性经营,也就是独霸经营,我们认为不合理,要想管理好武夷山的旅游产业,只有在互助互利的原则下共同来管理,武夷山大部分旅游景点的山权、林权、土地使用权是属于我们新村集体所有的。武夷山至今有这样完好无损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都是我们新村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成果。现在,景区管委会要封闭、要垄断,整个武夷山就变成了他们独家所有,我们要问难道新村村民只有维护的义务,而无受益的权力吗?我们认为,只有在共同维护、共同受益的原则下进行分配才是合理的。新华都公司投资2800万就占35%的利润,在武夷山得利的还有很多股东:如万春园,每年可得120万;御茶园建一个茶楼一年也可分利420万,星村蛇园也从每张竹筏票中提取5元抽成,武夷碑林也可以从每张统票中抽成5元。那么,我们新村56000亩山权、林权、使用权应该获得多少分配利



润呢？

我们提出以上几点依据，是想提出一个疑问，难道我们新村 56000 亩山权和林权全属新村集体所有，不能合理地提出利益分配吗？因此鉴于以上资料参考我们新村集体可以正当、合理地提出按每张统票 10 元的抽成分配给村民。当然，根据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人数递增，抽成也随之递增；应实行永久性终生制。只有这种合理分配原则，才能促进村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才能更好地配合管理好武夷山。

根据上述所提出的几项实际问题，我新村村民经过多次反映，屡次请求解决，多层次地进行谈判，效果甚微（并且在 9 月间全体村民前往省政府上访过一次），相反遭到当地政府的层层阻碍、威胁，更恶劣的是当地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对我村民进行恐吓，甚至连我们上访的权利都被限制。正因为当地政府不帮村民解决实际困难，我们只好采取合法渠道向上级反映，他们针对群众上访采取各种手段阻碍和威胁，这种做法侵害了我们的公民权。我们的人身自由权，我们认为群众上访是通过正当的合法程序来讨回公道，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然而当地政府一些领导为什么怕我村民上省级政府上访，对上访的群众恨之入骨？可想而知，这明显体现有严重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不可告人的秘密。与中央“三个代表”的伟大方针背道而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极力阻止群众上访？我们迫切请求上级政府派人深入民间做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为盼。特此报告。

新村全体村民签字：略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 附录6 景区实施畅通工程涉及新村存在问题的汇报

新村于8月11日上午组织村民代表召开会议,就景区实施畅通工程之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经村民代表进行讨论,具体汇报如下:

1. 景区需进行封闭式管理或启动畅通工程要到新村协调达成共识后才能启动。

2. 新村民进入景区生产、生活不受限制。

3. 关于山林权确权问题,请市政府尽快对新村在景区内的山权、林权、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登记并办证。

4. 景区实行一票制起需付给我村10万元要尽快到位。

5. 景区今后的用工要优先招用新村村民。

6. 景区属新村辖区内景点的摄影人员需全部使用新村村民。

7. 新村人口自然增长、茶叶产量增加需要建房,要求政府在景区周边征用一块安置地并给予优惠政策给村民建房。

8. 景区内现存经营网点,由新村村民参与招投标经营。

9. 景区有使用到各小组的土地要尽快补偿到位。

10. 景区今后在景点增设和景点建设时使用到新村的山林、土地,需到新村办理相关手续。

11. 由于新村为“世遗”作出贡献,要求尽快启动旅游村项目,请政府协助旅游局将游客引到新村。

12. 有部分村民安置房的“两证”尚未办理,要求市政府尽快按优惠为村民办理。

13. 景区有租用北山小组土地,原合同条款是永久租用,需改为有年限租用。

14. 景区内还有3个自然村未拆迁,要给予政策照顾。

新村村委会

二〇〇六年九月十日



## 参考文献

### 中文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 巴莫曲布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 蔡靖泉：《“文化遗产”析义》，《中华文化遗产》2007年第2期。
- 崔延虎：《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大卫·吉诺特：《历史与他者结构——以中国鄂西伍家沟歌师为例》，《中国人类学评论》2007年第4期。
- 戴伦·J.蒂莫西·斯蒂芬·W.博伊德：《遗产旅游》（程尽能等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 蒂姆·克雷斯特维尔：《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
- 董国强：《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读〈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学海》2004年第6期。
- 董天工：《武夷山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影印道光廿五年刊本，1974年版。
- 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明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范可：《“再地方化”与象征资本——一个闽南回族社区近年来的若干建筑表现》，《开发时代》2005年第2期。
-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范文正公集》。



方李莉：《遗产：实践与经验》，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费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费孝通：《论人类学和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福建省崇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 年。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 2004 年版。

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3 期。

费坚：《“世遗”的权力与地方的声音》，《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 年第 2 期。

费坚：《当前人类学视野中遗产研究的三种范式》，《东南文化》2010 年第 5 期。

费坚：《世界遗产保护的地方视角》，《东南文化》2009 年第 6 期。

巩志：《中国贡茶》，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 年版。

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

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韩俊芳：《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2 期。

郝苏民：《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学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学研究》2005 年第 4 期。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淑婷、费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贤度：《佳茗飘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金少萍：《“中西部山区民族原生态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思想战线》2004 年第 6 期。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李斌：《“寺”“庙”之争：民俗精神符号再造》，《中国研究》（2005 年春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春霞：《世界遗产：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

李春霞：《遗产：源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 李德瑞:《模糊的边界与多元的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政治研究的总体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 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九七效应: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 李智君:《武夷山历史景观意象研究——基于游客诗词、游记和景观图的分析》,载《闽文化与武夷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林璧属等:《武夷山封闭式管理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研究》,《旅游学刊》2006年第7期。
- 林剑华:《明清时期福建省内再次移民及动因探析》,《东南学术》2006年第1期。
- 林其铨、吕良弼:《互缘文化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 林姪婧:《论遗产与旅游》,《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 刘朝晖:《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 刘红雲、王健民:《世界遗产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版。
- 刘魁立、施爱东:《刘魁立先生访谈录》,《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 刘魁立:《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当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 刘晓春:《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的原生态现象分析》,《学术研究》2008年第2期。
- 流心:《自我的他性》(常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 陆益龙:《嵌入型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吕俊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化倾向及原因分析》,《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 罗佳明:《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孟华:《中国山岳型“世界自然—文化遗产”的人地和谐论》,河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4月。
-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纳尔逊·格雷本:《人类学与旅游时代》(赵红梅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彭顺生:《世界遗产旅游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
- 彭兆荣、林亚端等:《遗产的解释》,《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 彭兆荣:《“第四世界”的文化遗产:一个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文艺研究》2006年第4期。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

彭兆荣：《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思想战线》2005 年第 6 期。

彭兆荣：《遗产：反思与阐释》，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彭兆荣：《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一种后现代的讨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彭兆荣：《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 1 期。

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文艺研究》2008 年第 2 期。

彭兆荣：《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

彭兆荣：《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国家遗产的属性与限度》，《贵州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J.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孙克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概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 B 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2000 年版。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 2000 年。

陶伟、岑倩华：《国外遗产旅游研究 17 年——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反映的学术态势》，《城市规划汇刊》2004 年第 1 期。

田青：《我们拥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吗——对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中国文化报》2010 年 2 月 22 日。

瓦伦·L. 史密斯主编：《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张晓萍、何昌邑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汪宁生：《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第二版），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汪小红：《乡村精英格局演变的启示》，《中国社会导刊》2006 年第 16 期。

王凤武、张文：《核心景区居民外迁与小城镇建设》，《城乡建设》2004 年第 9 期。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稻乡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翁毅：《崇安县武夷乡地名志》（未刊稿），1989 年。

吴春明:《2004年度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报告》,载《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与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吴家洋、卓建武编撰:《闽北概貌》,建阳地委政研室编印1985年版。

吴晓鹭:《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困境研究》,《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向岚麟:《近22年世界遗产地研究进展——基于13种中文期刊的考察》,《旅游学刊》2009年第4期。

向云驹:《论“文化空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向云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项继权:《从乡村研究乡村——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开放时代》2002年第4期。

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中国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徐嵩龄:《中国的世界遗产管理之路》(上),《旅游学刊》2002年第6期。

徐秀英、马天乐、刘俊昌:《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研究》,《林业科学》2006年第8期。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费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颜醒华、曾武英:《武夷山社区文化变迁探析》,《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内刊》1999年第10期。

杨东浦:《中国古代茶学全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杨效忠、路林:《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世界遗产(地)研究述评》,《人文地理》2006年第4期。

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人类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佚名:《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山资讯》2007年第1期。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尤林:《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何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于海广、王巨山:《中国文化遗产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 年第 2 期。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尔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詹姆斯·C.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6 年版。

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张成渝：《〈世界遗产公约〉中两个重要概念的解析与引申》，《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张华侨：《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乡村的抗争》，《中国社会导刊》2006 年第 3 期。

张建光：《Hello, 武夷山！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艰难历程》，《走向世界的武夷山（内刊）》2001 年。

张千帆：《拆迁条例》不是悲剧根源，载《2010 中国时评年选》，花城出版社 2011 年版。

张松：《世界遗产保护的理论问题研究》，《建筑师》2000 年第 6 期。

张晓、钱慧红：《自然文化遗产对当地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旅游学刊》2006 年第 2 期。

赵红梅：《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展演与族群认同——以丽江白沙乡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8 年 5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崇安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世界遗产公约自然·文化遗产 中国武夷山》（申报文本），1998 年。

袁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周大鸣等：《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周建新：《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周亮工：《闽茶曲》，转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崇安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崇安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84 年。

诸葛仁等：《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农村生态环



境》2000年第1期。

庄孔韶:《人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 外文文献

Ashworth, G. and J. E. Turnbridge, *The Tourist Historic City*,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0.

Chambers, E., *Thailand's Tourism Paradox: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as Factors in Tourism*, 1994.

Crew, et al., "Locating Authenticity", in I. Karp and S.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Hall, C. M.,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 Place, Power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Values in the urban Context", in P. E. Murphy, ed., *Quality Management in Urban Tourism*, Wiley, Chichester, 1997.

Hall, C. M., "Tour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Australia", in R. W. Butler and S. W. Boyd, eds., *Tourism and National Park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Wiley, Chichester, 2000.

Hewison, R.,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avid L. Uzzell, ed.,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Belhaven Press, 1989.

Howard, Peter, *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Hufford, Mary, *Conserving Culture: A New Discourse on Heritag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Kaplan, Flora S., *Museums and the Making of "Ourselves": The Role of Objects in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New York: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Lowenthal, D., *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leuvre, *Museum Memories: History, Technology, 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ori, Keelan N., "Heritage: Visitor Manag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in C. M.



- Hall and S. Mcarthur, eds., *Heritage Management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Vistor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and Marketing*, Auck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arks, Rafael,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The Contradictions and Ambiguities of Tourism in the Stone Town of Zanzibar",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 20, No. 2, 1996.
- Moore, Willard B.,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Reflection upon Interpretation in Folklife Museum", in P. Hall and C. Seemann, eds., *Folklife and Museum*, 1986.
- Nuryanti, Wiendu, "Heritage and Postmodern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3, 1996.
- Svetlana, Alpers, "The Museum as a Way of Seeing", in I. Karp and S. Lavine, eds., *Exhibiting Culture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 Synnestovedt, A., "Who Wants to Visit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in A. Russell, ed.,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Heritage*, New York: Springer, 2006.
- Teo, Peggy and Brend S. A. Yeohd, "Remaking Local Heritage for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4, No. 1, 1997.
- Tunbridge, J. E., and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Chichester, New York, Brisbane, Toronto, Singapore: J. Wiley, 1996.
- Valerie, Casey, "The Museum Effect: Gazing From Object to Perform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History Museum", paper in Digital Culture and Heritage: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CHIM 2003-New Medias, New Scenographies, 2003.
- Wang, Ning, "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Tourism Experienc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No. 2, 1999.
- World Heritage Centre, "Heritage: A Gift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 *World Heritage Information Kit*, 2005.

## 后 记

本书付梓之际,首先想到的是感谢。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师长和友人。

近年来,遗产(地)备受社会的关注。本书以此为背景,考虑的问题是:遗产(运动)如何进入地方社会?遗产地社会做出了怎样的回应?显然,遗产地村落正是这一研究的落脚点。

所以,特别感谢导师彭兆荣教授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从人类学的基础理论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到遗产学的最前沿研究,彭师为传统村落与现代遗产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彭师的治学态度,使我受益颇多。

感谢武夷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世界遗产保护中心的俞建安主任,他和他的同事们为我了解地方政府与遗产保护运动的关联提供了最初的经验。在他的引见下,“新村”进入了我的学术视野。从遗产地村落研究来看,对于遗产运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研究来说,新村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场所。

因此特别感谢新村人,他们的热情、坦诚、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肖裁玉家人、黄雪梅家人、余盛良及驻村干部等村人的大力帮助,我得以顺利地展开田野调查,并通过他们许许多多的“细小叙事”,进而观照到遗产保护的时代话题。

还要感谢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和老师们的授业之恩。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刘朝晖博士时常为我的遗产地村落研究提供宝贵的意见,感谢四川大学李春霞博士对我的鼓励和帮助,感谢肇庆学院袁穗琴老师对本书的校稿,感谢同窗好友的一路相伴。



此外，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编辑部，感谢你们细致认真的编辑工作，本书的出版还获得“肇庆学院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金”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长期以来，家人的鼓励和支持鞭策着我前行。感谢哥嫂对父母的照顾，感谢公婆为我免去家务。感谢丈夫刘黎明，他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校稿、查漏错字、提出修改建议，每每都让我受益匪浅。谢谢你的支持与包容！

本书的完成仅是一个阶段的结束，我深感自己的研究还有不少错漏，研究中难免有偏颇甚至不妥之处，还请谅解和指正。

龚坚

2012年8月于砚都肇庆